

#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① 全国文明城市
- ②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③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④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⑤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⑥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⑦ 中国市场名城
- ⑧ 中国地热城
- ⑨ 中国书法名城
- ⑩ 国家园林城市
- ⑪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 ⑫ 国家卫生城市
- ⑬ 国家森林公园城市
- ⑭ 东夷文化发祥地
- ⑮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编委主任：常红军  
编委副主任：周俊献 刘志强  
编委委员：段 洪 唐少清 于 芹  
            王卫东 王友存 朱洪厂  
            祁桂菊 朱文江 陈永亮  
            高仲平 刘相尚 巩祥军  
            刘 露 公 鑫 张玉杰  
            崔 平 杨晓莉 肖功江  
            徐田宁 杜 帅 徐希冕  
            张艳华  
主 编：刘志强  
副 主 编：段 洪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美术编辑：胡拙安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1310012号

# 目 录

## 【本期特载】

父亲萧华在山东抗日根据地  
萧 雨/口述 孙 云/整理 04

## 【峥嵘岁月】

我的抗战回忆 朱兆山 08  
罗国范的潜伏生涯 李萌萌 亓军华 11  
长沙头村无战事 王宗富 16  
铁军大帐追歌行（六）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20

## 【名人素描】

经学大师郑玄 于岸青 27  
三朝贵戚唐初宰相萧瑀 邹逸俊 34

## 【文化掇英】

苏静与战争时期的华东摄影工作 康矛召 38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五）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41

## 【蒙山沂水】

羽山殛鲧觅遗闻 吴成芳 44

## 【古城旧事】

记忆中的老建筑——城门 本 编 47

## 【探索发现】

“一等民兵英雄”张秀海 高 雷 48  
山东战工会委任状 红色文献 53

### 【诗画赏析】

- 东汉刻石“吕义冢葬地”记 叶克勤 54  
抗战歌曲选——《天快明了》 本 编 55

### 【文史论坛】

- 立规守矩 提升素质  
全面开创史志工作的新局面 刘志强 57

### 【影像沂蒙】

- 沂蒙根据地反“扫荡”（下） 本 编 63

### 【百家渊流】

- 姓氏百家漫谈——朱姓（四） 赵丹峰 65

### 【沂蒙名医】

- “相傅”之救危之星（上）  
——记宋文采 刘凤才 71

### 【沂蒙乡亲】

- 王文兴：让雨滴来讲述“降魔”故事 王延斌 77

### 【史志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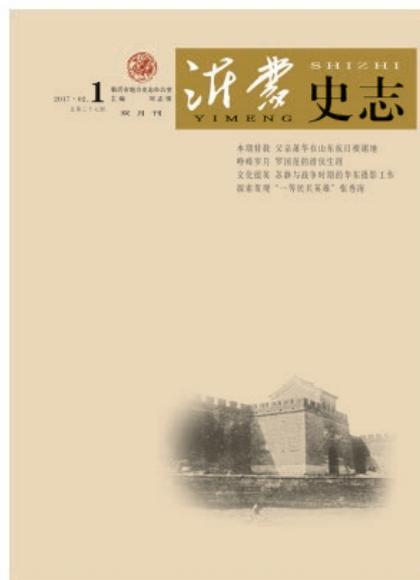
80

封面：城门

（详见本期《记忆中的老建筑——城门》）

封底：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

临沂出土之《孙子兵法·兵势》 胡石/书



地 址：临沂市北京路17号  
行政服务中心655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2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 父亲萧华在山东抗日根据地

萧雨/口述 孙云/整理



我对山东、对沂蒙老区有着特殊的情缘。那里不但是我的出生地，更是我父亲（萧华）和他的战友们共同打击侵略者、智斗反动派的战场。今年（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的思绪又定格在70余年前烽火狼烟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不禁心潮激荡、思潮翻滚……

## 三打灯明寺 挫敌扬军威

1938年初夏，为壮大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中央军委决定抽调一支八路军主力部队组成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赴津浦路以东的冀鲁边区。父亲被任命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8月，他率部从山西孝义出发，经过一个多月风雨兼程，9月27日来到冀鲁边区的中心乐陵县，在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

22岁的父亲成了冀鲁边区集党、政、军一把手于一身的领导人。父亲领衔挂帅，根据冀鲁边区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巩固津南，发展鲁北”的方针。在冀鲁边区，父亲率部打了许多胜仗，挫败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其中，一场三打灯明寺的战斗经历跌宕起伏。

灯明寺是东光县的一个重镇，也是冀鲁边区主要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939年1月26日，东光日军联队长滕井带领200多名日军、100多名伪军，出动十几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和一些建筑材料，到灯明寺修建据点。父亲和参谋长邓克明、五支队长曾国华率部连夜冒雪急行军40多华里，赶到灯明寺以北3华里处的一片洼地，进入战前准备。夜间11时，尖刀班悄悄摸进村子，干掉哨兵，进入日伪军宿营的几家客店院墙，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日军还没清醒过来就有不少伤亡，伪军早已抱头鼠窜。此战，日军伤亡60余人。

此时刚去枣庄围困河北国民党军张国基部的滕井听说后，马上带队分乘十几辆卡车，回援灯明寺。滕井此举，正中父亲计策。埋伏在两侧的八路军一起杀出，鬼子胡乱开枪还击，直到拂晓方才发现八路军早已撤走，滕井连忙下令停止射击。进村后，滕井清点发现，这一战，日军又死伤几十人，滕井带着残兵败将仓皇逃回东光城。

几天后，滕井又带300多名日军、200多名伪军和200多名抓来的民夫，再次占领了灯明寺。父亲和邓克明得知后，决定先派民兵骚扰、麻痹敌人。滕井为了早日修好据点，命令日伪军也和民夫一起施工。夜里，疲惫不堪的日伪军刚入睡，村外突然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日伪军则慌慌张张地朝村外开枪放炮。过了一会儿，村外的枪声、号声停止了。日伪军心惊胆战地等了好久，见村外没了动静，以为八路军撤走了，都抱着枪睡着了。这时，村外又突然响起了军号声、枪声和呐喊声……就这样，一夜反复几次，如此连续两天，敌人未能睡觉，十分疲乏。

第三天深夜11时，父亲和邓克明率部队踏着冰雪来到灯明寺。东光县大队在村北和村西北佯攻，五支队趁机从村南悄悄地摸进村子，将伪军住的8个院子分割包围起来。打得伪军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也乖乖当了俘虏。接着，部队又向日军驻地杀去，很快消灭了一批敌人。

滕井指挥剩下的两个日军中队凭借高大砖房作掩护，拼命顽抗。父亲见敌人火力凶猛，便与邓克明商定撤出战斗。八路军刚出村，灯明寺突然火光冲天。父亲意识到这是滕井的诡计：一是两次失利后纵火报复；二是引八路军回村救火，背后偷袭。父亲决定来个将计就计，一方面带一部分人回村救火，另一方面则让邓克明带一连人埋伏村外，等待时机攻敌背后。



1938年9月，萧华率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东进途中，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南宫，和徐向前（左一）、符竹庭（左二）、宋任穷（左三）

滕井见八路军回村救火，以为八路军中计，带着隐蔽在道沟里的日军兵分两路杀进村。父亲指挥战士迅速还击，邓克明也带着一个连呐喊着冲进村来。日军遭到前后夹击，不到一小时伤亡大半，剩下的十几个日军不敢再战，跟着滕井逃回东光城。

### 亲赴惠民谈判 斗争有勇有谋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父亲一直注意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打击无心抗日的反动势力毫不手软。

刚到达乐陵县时，父亲就通过朱集镇大常村村长常浩天，与进步人士、县长牟宜之取得联系，共商抗战大计，促成牟宜之对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限制、刁难八路军，尤其在军饷、粮食、服装上不予供给”要求不为所动。

沈鸿烈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不久，他与国民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策划组织“冀鲁联防”，试图以软硬兼施、南北夹攻的方式，把八路军赶出冀鲁边区。为瓦解“冀鲁联防”，做好统战工作，父亲轻车简从，去惠民县城与沈鸿烈谈判。

沈鸿烈曾当过张作霖的舰队司令、青岛市市长，当得知来谈判的八路军司令只有22岁，很是不屑。大家十分气愤，都想打道回府，父亲却化被动为主动，把《给惠民各界的慰问信》花钱油印出来，亲自上街头散发，又去医院慰问。一时间惠民纸贵，城里纷纷传颂八路军的司令年轻有为，深明大义。

沈鸿烈吃了“哑巴亏”，赶紧安排会晤。三小时的谈判结束后，沈鸿烈送出父亲，竟掩饰不住惊讶、钦佩之情，要请父亲吃饭。

后来，为阻止我党领导的抗日势力向北发展，被称为“摩擦专家”的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收买了反动民团头子孙仲文，给他提供枪支弹药，对付冀南挺纵部队。1938年10月，孙仲文派兵包围了盐山五区抗日民主政府，并将机枪架到区政府门口，要我区政府制册交印，并声称一切都要听从孙司令的指挥。他们还在大赵村、丁村一带，扣押挺纵过往人员，活埋抗日干部，屡屡向我挑衅。父亲派驻防在盐山旧县一带的我冀南第六督察公署专员、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杨靖远找孙仲文交涉，劝其停止反共的破坏活动。然而，孙仲文依靠鹿钟麟的支持，猖獗至极，欲当场扣押杨靖远，杨靖远机智逃脱，孙仲文却又在后面的交战中射伤杨靖远，割下其头颅挂在寨门上示威。

父亲悲痛万分，含泪写下挽联：“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水吊英灵”。11月14日，经父亲同意，六支队的周贯五率部拔掉这颗钉子，将孙仲文一群乌合之众全部拿下，并建立了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给鹿钟麟以有力回击。为打击鹿钟麟的反动气焰，我军继续向北推进。收回新海县，建立新海县抗日民主政府，沈鸿烈和鹿钟麟的“冀鲁联防”彻底破产了。

### 危急出兵施救 将领率部起义

1938年12月中旬，蒋介石从鲁南山区调石友三、高树勋为首的第十军团插入冀南地区，配合鹿钟麟制造摩擦。高树勋是河北当地人，比较倾向于抗战，因而与其顶头上司石友三貌合神离，隔阂很深。蒋介石派他来，是想利用他以乡土情谊笼络人心，孤立、排挤八路军，但又怕他与八路军接近，特地委派鲁北国民党党部主任、鲁北保安部队政治处主任、CC派分子马皋如任暂编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监视高的行动。

高部抵达时，八路军挺纵机关为高树勋召开了欢迎大会，父亲代表边区抗日军民致欢迎词，并委托六支队司令员邢仁甫宴请高树勋，希望他多做对抗战有利的事，之后多次与邓克明等前往高树勋部驻地，交换对抗日形势的看法，宣传中国共产党

的抗日主张。刘伯承专门写信由父亲转交高树勋，劝诫高树勋认清形势，以民族利益为重。在有理有节地与高部中反动势力斗争的同时，父亲还率部驰援，救了高树勋一次，让他彻底认清了形势。

1939年6月初，高树勋部与日军激战9小时获胜。6月28日，日军宫津文雄带400日伪军侵占乐陵城，7月11日又集中1000余日伪军夜袭高树勋部队防地宁寨村。当时高树勋手下只有李春克一个旅和周树一个团约6000余人，因日军来势凶猛，武器精良，鏖战一天后渐渐不支，被日军困住。

7月12日拂晓，日军发起进攻。高部警卫连依靠丈高土围子拼死抵抗，驻扎附近的所属部队想来救援，但均被日军打垮。高树勋下令两次突围，均未成功，一面下令死守，一面向国民党地方武装张国基、曹振东发报求援。张、曹为保存实力，袖手旁观。高树勋无奈，只得向八路军求援。接电当晚，父亲带部队连夜赶去，凌晨2时发起进攻，与高部里应外合，使得日军撤围。战后清点战果，仅八路军就消灭日军60多人、伪军100多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200支和其他部分军用物资，俘虏两名日军军官。从此，高树勋看清了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对抗日友军真诚相待，也认识到搞反共摩擦没有出路。不久，高树勋主动率部撤离冀鲁边区，其附属的“二政权”随之垮台。

抗战胜利后，高树勋委托中共地下党员王定南主动找到刘伯承和邓小平，希望与我军建立联系。经过反复工作，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部起义，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第一人。

**作者介绍：**萧雨，萧华上将之女。1944年7月出生于沂蒙抗日根据地。1967年7月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退休前曾任海军装备部助理员，型办副主任兼军事总代表等职，大校军衔。



1964年萧华、王新兰全家合影，前排右二为萧雨。

# 我的抗战回忆

朱兆山

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已经70多年了，我常常在回忆亲历的抗战往事，心情很不平静，因此写了以下小文。

—

1938年初，日寇铁蹄踏入沂蒙山区，而最艰苦的岁月是1940年至1943年。在此期间，几乎所有的县城都被占领，各县又设有十几处据点，每年都要进行几次大扫荡（多在麦收前后和秋冬季节），每次扫荡都实施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

我家的房屋就是在1942年初冬被烧毁的，屋内的衣物、粮食、家什等全被烧掉了。这年的冬天可真难熬啊，既无住处也无食物。为了活命，母亲在乡亲们帮助下临时搭了个草棚，冬天的夜里一家人都穿着棉衣挤在一起睡。由于天气寒冷加上虱子咬，很难入睡；而到了夏天，炎热难当，加上蚊子、臭虫、跳蚤等叮咬，下雨天草棚又漏雨，每夜睡着都会被多次咬醒或者为躲雨被叫醒。而最大的问题是吃饭问题，因为粮食都被日寇抢光烧光，只能把地瓜叶、地瓜蔓、野菜树叶等东西当主食充饥，如果搞到点高粱面或者地瓜面一类的粮食，只能在做饭时放上极少的一点点，当时叫粮食引路。那段时间真正体会到度日如年的滋味了。

那几年由于日寇多次疯狂扫荡，好多地方连片几个村庄不见人影，看不到炊烟，有的人家成了狼窝，野狼甚至在里面生小狼。那时临朐的九山、米山，沂源的悦庄等都成了无人区。

当时我村是一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村，村里被鬼子打伤的就有八九人，其中就包括我母亲。有一次鬼子扫荡中，一个鬼子和一个汉奸闯进我家屋内，当时我正在患伤寒病，躺在床上。鬼子指着我叫“死了死了的”，那个汉奸就抓起一根木棍向我头部打来，我母亲急忙护我，用胳膊挡住了木棍，这一棍打在她的胳膊上，汉奸再次扬起木棍向我头部打来时，突然外面响起了紧急集合哨声，他们急忙走了。如果第二棍打在我头上，恐怕我就一命呜呼了。

## 二

就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沂蒙山人没有向敌人低头。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下，为了抗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物的出物，抗日气氛很浓。首先党组织发展很快，几乎村村有党员，大村有党支部，我姐姐朱兆兰（现名朱智勋）14岁（1942年）入党，随即参政参军。

当时各县、区（现为乡镇）都成立了青抗先、各救会、妇救会和民兵等组织，这些组织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活动，有时是明的，有时是暗的。类似“红嫂”救伤员的事迹，在沂蒙山区有几百人，据统计，仅沂南县就达近百人。

当时送子参军、送夫（多为未婚夫）参军的和自告奋勇参军的各村都有。如朱家里庄杨次章先后送三个儿子参军，其中有两个壮烈牺牲，一个负重伤。

在沂蒙山区长期坚持与日寇作战的有八路军的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当时由于敌强我弱，故多采取游击战术，但也打了几个硬仗。如1940年由山东纵队打的沂南孙祖战斗，徐向前坐镇指挥，孙继先亲临战场指挥，打得很顽强很激烈。为与敌人争夺一门迫击炮，整个炮身全是鲜血。在战斗中许多群众到前线送饭送水，抢救伤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叫殷桂兰的缠足妇女，她冒着枪林弹雨自发到前线送水，感动了在场的指战员，更激起了他们奋勇杀敌的劲头。战士们为这位大娘编了一首歌，其中有两句歌词是“满坡的青苗发了芽，西高庄大娘前线来送茶……”此歌被传唱至今。

1944年在沂水葛庄打的伏击战，也是孙继先指挥的，打得很漂亮，连同孙祖战斗，在我国军史和地方史志均有记载。

在沂蒙山长期坚持与日作战的还有老四团（特务团）。

1944年冬和1945年春攻打被日寇占领的沂水城和蒙阴城。这两个战役的参战者除了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各一部分外，还有大量的民兵和民夫，战绩辉煌。打沂水城被编成了话剧，打蒙阴城被编成了快板书和山东快书。

在沂蒙山区还有积极坚持抗日的国民党部队。例如1938年2月第五战区的抗日游击队，其司令刘震东。是年二月，日寇进犯莒县城，刘震东部队在守城，以“与城共存亡”的口号与敌决战，打得很激烈、很顽强，刘震东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爱国司令，莒县曾改为震东县。

1938年初，国民党的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和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在临沂城及周边也打了几个硬仗。张（自忠）部随后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打得很顽强。



八路军战士在孙祖伏击中

当时，地方武装部队和民兵也不示弱，县里有县大队，区里有区中队，我村朱亦楷、朱寿年曾担任过县大队负责人。区中队和各村民兵的活动，完全根据当时敌情而行动，多采用敌疲我打、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

1940年初冬，打铜井就是以地方部队为主打的。此役由于敌我武器装备悬殊，我方指挥不利以及里应外合失策，我方损失惨重。战后为纪念此役牺牲的烈士们，在铜井街修了八角塔和烈士墓。这批地方武装部队以后加入了山东纵队四支队。

1944年麦收前日寇扫荡中，依汶区中队被日寇包围，根据情况只能立即突围，在突围中有一民兵负伤不能走动，队长王守刚虽已突出包围圈，他见此情立刻返回去救这位伤员。王队长背着伤员没走几步，敌人赶到，王与敌人摔了几个跟头，但还是被捕。敌人见王长得五大三粗，有个派头，可以利用，就劝他投降说“你跟我们干，你的前途大大的”，又指着汉奸头子说“他的职务由你来代替”，那个汉奸头子附和说“我听皇军的”，又对王说“老弟，跟着皇军干吧”。王向汉奸吐了一口吐沫说“呸，孬种”。之后不管敌人怎么问，他什么都不说。敌人见劝降无望，就向他连捅了几刺刀，王壮烈牺牲。就在此次扫荡中，我与本村民兵朱兆诚、朱兆海（笔者胞兄）在我村东南方向的丹子山山顶上活动，忽见汶河对面鬼子汉奸追捕逃难的百姓，我们就向敌人打了几枪，敌人立即停止追捕，我们马上转移。因有一河之隔，敌人未能找到我们，当时我心里感到很痛快。

1945年麦收前是日寇的最后一次扫荡，敌人进驻了依汶庄。还是我们三人，到了依汶东山（象山）山顶上，看到鬼子汉奸在依汶一块菜地里嘻嘻哈哈抢拔水萝卜，我们向敌人打了几枪，敌人立刻都躲了起来，我们也随即下山转移了。可就在我们下山的途中，附近村的民兵向我们打了几枪，子弹从我们耳边嗖嗖地飞过。后来才知道，他们误认为我们是鬼子派出的奸细。这也是我少年时遇到的最惊险的一幕，令人难忘。

还有一次，日寇也是采用的拉网式扫荡。当时各处都有枪声，唯有我村东山还未听到枪声。我随本村的付东海及胞兄朱兆海向东山（凤凰山）奔去，刚到山顶，看见三个鬼子怀抱着机枪半躺着在打盹，我们立即向回跑。鬼子听到声音，就向我们摆手喊话，意思是叫我们过去。我们不从，赶紧散奔，我急得跳了光崖（很陡的峭壁），头部和腿部都受了伤，鬼子向我打了几枪，虽未打中，但子弹打在石头上，碎石崩在我脸上身上，这也是我侥幸逃生的难忘的一幕。

抗战八年，我党的统战工作是最好的，真正做到了有人的出人，有钱有物的出钱出物，齐心协力打日本。现仅举沂南三例：

一是大地主大官僚出身的刘佛缘，他把自家的百多亩地卖掉，为八路军购买枪支弹药和有关物资，动员他的亲友、佃户参军。他的全家三代先后都参加了革命工作。

二是地主出身的马月如、马保甫兄弟俩。在抗日期间沂南岸堤被称作小延安，因为当时的山东省委和八路军的一一五师、山东纵队以及抗大一分校都先后或同时驻在此地及周围村庄。当时我军政人员所需给养等物资，主要以马月如（时任岸堤区长）为主筹划和操办的，其弟马保甫是积极参与者。马保甫也是沂南供销社创办人之一，他二人及他们的子女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

三是沂南傅旺庄傅清源，此人虽是地主出身，但他思想开明，积极投入抗日活动，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家曾同时救养了我方两位伤员。他们把伤员藏在村后山洞里，傅的两位夫人轮流到山洞为伤员送饭、服药等（此事至今鲜为人知），傅还腾出自家的住房开办抗日小学（从范老师家转移到傅家）。

# 罗国范的潜伏生涯

李萌萌 亓军华



罗国范，原名郭善堂，1919年生，今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石棚村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化名“林洪洲”，在日军特务机关潜伏近4年，日本投降后回到军区，改回本名郭善堂。解放战争时期两次荣立一等功，新中国成立后经组织批准改名罗国范，离休前任北京军区联络部部长。

2014年11月29日，我们在北京见到了罗国范老先生，说明来意后，罗老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是莱芜人民把我养大的，我有义务把过去的事情向人民作个汇报。”这是采访中罗老说的第一句话。他的一生，有过很多传奇经历，其中最传奇的是抗战期间他在日军特务机关潜伏的4年。

## 头脑机灵，被派遣潜伏到敌占区

“我是1919年出生的，在家族内排行老四，小时候因为长得英俊，聪明机灵，家人给我取的乳名叫‘四喜子’。因为家境不错，得到莱芜县立师范读书。在学校当老师的姐夫对我要求严格，我却不领情，还用猪尿泡吹起来扮鬼吓唬过姐夫，这件事遭到了县教育局的通报。”

抗战爆发后，郭善堂听说徂徕山有军队，他想参军。了解到徂徕山的部队是八路军，父亲说：“穷党的军队没有根，参军也要参加国民党的中

央军。”然而听说徂徕山的部队打鬼子，郭善堂毅然前去投奔。徂徕山起义后建立的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以下简称四支队），一团一营三连连长是武中奇，因为郭善堂没带枪故意拒绝了他。郭善堂便采取放跑堂哥家牛，引堂哥去追赶牛的“调虎离山”之计设法从堂哥家里弄到一支土枪。再次见到武中奇，“行啊，你小子挺有办法，你就在这里干吧。”武中奇说。从此，郭善堂成为四支队的战士。3个月后，连长看他特别机灵，让他当司务长负责伙食。后来他又成为四支队的募集队长。

这期间，郭善堂在一次筹粮过程中被日军抓住，在当地老百姓和村长的帮助下，他凭机智最终得以逃脱。

罗国范说：“我曾以《老百姓一句话救了我的命》记录了这段经历。八路军和老百姓是鱼水关系，离开老百姓我们一天也不能活。”

1941年底，鲁中军区准备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和优秀战士组成特工组，深入到游击区和敌占区开展工作。敌工部部长王芳（新泰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部长）看中了他，说：“郭善堂这小子机灵，他在敌占区有办法。”

当时，军区司令员、政治部主任、敌工部长、组织部长四人同郭善堂谈话，罗舜初司令员说：“小郭，组织决定调你到敌占区工作，说穿了就是让你去演魔鬼。演好了，老百姓骂你打你，八路军也要杀你。演不好，小鬼子要杀你。你考虑考虑，党组织决定让你去，不能讲价钱！”“首长，打鬼子我不怕，但是到敌人那里我害怕，电灯我都没见过。”“党委已决定了，必须服从。你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那边情况复杂，金钱美女诱惑很多，不能变质。第二，危险性相当大，要有牺牲准备。第三，这段历史不留档案，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战争结束后，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能证明。”郭善堂后来还想找罗司令员说说，司令员说：“你别啰嗦了，记住一句话：那个地方金钱美女很多，不要湿了裤子，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党相信你！”

### 左右逢源，他成了日本特务机关的“香饽饽”

敌工部长王芳布置任务，让郭善堂设法打入泰安、济南的日本特务组织，长期潜伏下来，设法搞敌人的情报，并提供了几位联络人。郭善堂接受任务后，坚定地出发了。他通过在莱城日本浅石洋行的联络人办理了良民证，改名林洪洲。

林洪洲进入浅石洋行后，因工作成绩出色得到浅石的赏识和信任，被推荐到济南的日军山东部队参谋部，获得山田参谋长的赏识。后来又陆续获得济南日本宪兵队和日军在济南的四家特务机关（泺源公馆、梅花公馆、鲁仁公馆、南新公馆）的工作证明书，他们都想让林洪洲为其提供情报。

“你是通过什么让鬼子信任自己的呢？”

“我向鬼子提供的情报，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最重要的是不能对根据地造成危害。有些本来要公之于众的事情，我根据王芳的指示，提前向日军作了透露。如1942年，根据地军民为了战胜日寇‘扫荡’造成的困难，在党和各级政府领导下开展大生产运动，我把这一情况作为战略情报报告了山田参谋长和一家特务机关。他们非常重视。过了几天，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正式公布在《大众日报》，我又把报纸送给他们。他们都觉得我提供的情报及时而准确。

后来，林洪洲陆续发展人员组成特工小组，建立党支部。应付这些特务机关并非易事，虽然一个情报可以多处投送，但又不能完全一样，必须稍加变化，加以区别，这样最后汇总到日本高级特务机关才不被识破是出自一人之手。“干情报工

作，你不能当首长，拿官架子。什么都得亲自干，到处结交朋友。”林洪洲善于结交，很多任务的完成都与其结交面广有关。

### 敢打日本军官，他混成了众人皆知的“大特务”

虽然在日军特务机关工作，但是林洪洲并没有卑躬屈膝，而是巧妙借助各种势力，在完成的同时，为自己赢得生存空间。

1943年，林洪洲有一次到济南一家澡堂洗澡，突然走进来一个日军大尉和他的朝鲜翻译。看到林洪洲休息的位置有个位子，非常霸道地让其让位，林洪洲并不示弱：“干什么？”日军大尉一怒之下，打了林洪洲几巴掌。看到对方两个人，身上带着枪，林洪洲好汉不吃眼前亏，出门叫了辆黄包车，到日本宪兵队向山本队长报告，路上他把宪兵队发给他的证明书用脚踩了。山本问起来，林洪洲说被一日本军官打了，“我受点委屈倒没什么，最大的问题是我把你们发的证明书给他看，他不承认，还用脚踩了，这是对宪兵队最大的侮辱。”“混蛋！”山本队长命令把这个人抓来。

宪兵队一名军曹带着士兵来到澡堂，军曹喊：“凡是日本人统统出来！”打林洪洲的日军大尉等都出来了，他们都害怕宪兵队。林洪洲指认后，宪兵军曹打了日军大尉四巴掌，林洪洲狠狠打了翻译。整个澡堂都非常紧张。大伙说：“这个林先生这么厉害，把宪兵队都搬来了。”从此，林洪洲敢打日本人，在济南名声更大了。到了宪兵队，日军大尉只承认打人，不承认踩了证明书。宪兵队继续打，打得日军大尉最终承认了。后来这位日军大尉被关押到监狱，罪名是侮辱太君。“在那种情况下，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不能软弱。越软弱，在鬼子面前低三下四，越给中国人丢脸。我堂堂正正打了日本鬼子。老百姓你传我我传你，这是一种正气。”罗国范说。

### 超强自制力，他经受住了考验

混成了“大汉奸”后，林洪洲每天面临各种诱惑。潜伏期间，追求林洪洲的女人很多，鬼子想给他找个女人，但他坚决拒绝。山本队长问起来，他以“身体那方面有问题”应付。

鬼子宪兵队有个叫秦伯恒的汉奸，日本人很信任他。秦伯恒向山本队长打报告说：“林洪洲这个人可能和共产党有联系。他不打麻将、不抽大烟、不嫖女人，有两次我们到会馆去，问他看中哪个姑娘，他总推说身体有病走了，这样的人在特务中间太少了。”

这引起了山本的怀疑，派人把林洪洲带到了济南，关进监狱。在山本亲自审问时，林洪洲以攻为守：“我姓林的不敲诈，不嫖女人，有点特殊。你们得了解我，我忠心耿耿为你们效劳，报告了很多情报。为什么我能了解共产党那么多事情，就是因为我不敲诈勒索，老百姓愿意接近我。想用林洪洲，你们就得保护我！”很快，林洪洲被释放。后来，为了打消敌人的念头，组织派人把他在老家的妻子接了过去。

说起这一段，罗国范说：“我现在想想也高兴。我当了日本特务后，很多人想找我当后台，金条元宝有的是，我要是贪污受贿，稍有不坚定拿钱的话，解放后在济南工作时，老百姓就会来检举了，闹不好也掉脑袋了。这是个严重的教训！”

当然，林洪洲也犯过错误。有一次，林洪洲缴获了国民党的电台，并因此立功

受奖。他一高兴，喝醉了酒。酒后林洪洲有些控制不住自己，被日本警察拿着警棍捅了一下。林洪洲大骂，对方说自己是日本人，林洪洲说：“什么他妈的日本人，打你个王八蛋！”还追着打了两枪。山本队长听说此事后训斥了他。向组织汇报后，王芳严厉地批评了他：“你这是违反党的秘密工作纪律，绝对不能喝醉酒。”他向组织作出了保证。罗国范说：“我这个人一经表态的事就绝对不再干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喝醉过酒。”

### 心思缜密，行为坚决，完成任务却不暴露自己

潜伏在敌人内部，保护自我是首要任务。

潜伏期间每一步工作的进展，林洪洲都及时向王芳汇报。联络员是新泰东都镇春风酒馆的掌柜王春风，他是王芳的哥哥。“王春风后来为张家庄煤矿搞炸药时被敌人发现，最终被鬼子残忍地电死了，他至死没有透露秘密。”

做地下工作最怕出现叛徒。林洪洲在大汶口工作期间，得知王芳部长的警卫员刘寿山出走并可能叛变这个消息。王芳指示，如果发现他投降敌人，要坚决除掉。

林洪洲有一天在日本特务公馆与刘寿山不期而遇。刘寿山对林洪洲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林洪洲首先迷惑刘寿山，得知其叛变后，便想办法除掉他。他制定了三套方案，却几次都没有得手。刘寿山看上一个女人，想要借结婚敛财，主动向林洪洲求助。林洪洲抓住机会，让刘寿山去找当地的商会会长，“你就说自己是大大汶口的保安队长宾野的朋友，是我林洪洲的表弟，让会长帮你向各家商号发喜帖。”刘寿山照做了。商会会长问起时，林洪洲却说不认识刘寿山，让其赶紧向宾野汇报。痛恨敲诈勒索的宾野听说有人打着自己的名号敲诈，立即派人把他杀了。

所谓“留情不出手，出手不留情”，这是林洪洲面临的一次巨大考验，最终他巧妙除掉叛徒，还得到了敌人的信任。

抗战期间在八路军的反“扫荡”斗争中，林洪洲送出了几次关键情报。“鬼子保密观念相当强，想弄点东西非常困难。但时间长了，鬼子需要利用我，我就有机会了解他们的行动，再通过实地观察，综合分析，得出敌人的作战意图。”在日军合围泰宁军分区机关时，通过“敌人一有行动，就要抓民夫”的习惯，他提前一天向组织汇报；鬼子部署合击鲁中军区的马牧池战斗，林洪洲得到消息后及时报告，为两次反“扫荡”胜利立下头功。

林洪洲在4年时间里，挫败了日特务机关意图用假币破坏我根据地经济的图谋，发现了一再表示要参加反战联盟、潜入抗日根据地的间谍松井，巧妙营救共产党员武中奇的弟弟武思平，等等。他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却没有暴露自己。

### 被视为“大汉奸”，多次死里逃生

林洪洲在日军特务机关潜伏期间，因汉奸秦伯恒在日本宪兵队山本队长面前说他“不打麻将、不抽大烟、不嫖女人，很特殊，可能和共产党有联系”而被捕。林洪洲被释放后，山本为了进一步考验他，故意派他到新泰执行任务。

执行任务过程中，一天晚上，东都百姓王老倔不知怎么发现了林洪洲，知道他是个“大特务”。王老倔那天偷偷摸到林洪洲跟前，使尽浑身力气，用铁粪叉子朝着林洪洲的脑袋砸了下去……王老倔事后连夜投奔到八路军独立营，向营长报告说：“我打死了大特务林洪洲。”营长非常高兴。但事情传到王芳那里，王芳大吃一惊，亲自找到王老倔了解情况。王老倔说：“两粪叉子打下去，脑袋开了瓢。我

看到他一动不动，才走的。肯定被我打死了。我要是有把刀子，就会把他脑袋割下来。”王芳又气又急，但也不能说什么。

林洪洲被打昏，后来醒过来，爬了400多米到了王春风家中，经过治疗后被送到日军军营。山本派去监视林洪洲的宪兵把其遇害经过向山本汇报，山本指示认真抢救，经过抢救，林洪洲最终恢复了。

新中国成立后，罗国范见到王老倔说起此事，王老倔很后悔。罗国范对他说：“你打的是敌人，你如果知道我是共产党那性质就不一样了。你这一粪叉子还救了我的命。”

林洪洲被打后，山本有些愧疚，很快把秦伯恒找来质问：“你说林洪洲和王芳有来往，王芳为什么派人杀他？”秦伯恒最终以诬告罪被流放到东北做了劳工。

同时，不知道林洪洲是我党忠诚的情报人员的各级组织和干部群众，非常痛恨这个在日本人面前红得发紫的“大特务”“大汉奸”，都想寻机杀掉他。一次，根据地泰西区公安局局长韩格非本打算争取林洪洲，但是觉得困难，便趁着林洪洲和日本人一块打牌时派人送信给他，想借日本人的手杀掉林洪洲，万幸当时鬼子没有检查这封信，林洪洲才死里逃生。

林洪洲一次次躲过劫难，但是他的部下却不都这么幸运。莱芜苗山共产党员李庆亭，是林洪洲的特工小组成员。李庆亭有一次跟随日军行动，发现日军携带假币在根据地边缘地区使用，企图破坏根据地经济。他立即借故离开回根据地汇报，结果半路遭到八路军鲁中泰山专区公安队伏击，当场中弹牺牲。

公安队欢庆胜利，为民除害。他们却不知道，打死的是自己的革命同志。鉴于这种血的教训，为了保护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人员，军区根据王芳的建议，正式下发通知，对重要的汉奸特务，今后不要随便捕杀，如需处置的，应上报军区批准。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军区这样做的苦衷。

日本投降时，罗国范还在泰安大汶口。军区敌工部一位姓曲的干事通知他们全部撤出来，罗国范非常兴奋地撤到了莱芜。但没想到曲干事误传了上级指示，组织上本打算让罗国范继续隐蔽在敌占区，为蒋介石挑起的内战做准备。

首长让罗国范回去，罗国范只得执行命令。被送到济南市郊时，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张北华告诉他：“济南城国民党到处贴了逮捕大汉奸、特务林洪洲的通缉令，你回不去了。”

回到莱芜，罗国范急于回家看望多年未见的父母，当时村上正在召开群众大会，人们得知“林洪洲”回来了，愤怒地高喊“打倒汉奸特务林洪洲”，拳头劈头盖脸地向他打来，罗国范被打得鼻青脸肿。他大声喊：“老乡们，你们别打了，你们也判不了我死罪，要枪毙、杀头让政府来判。”于是，他被五花大绑送到县政府。县政府秘书打通了王芳的电话，得知实情后，告诉乡亲们：“由政府来处理，你们回去吧！”

在回军区的路上，军区此前下达的命令并未撤销，公安局又执行军区的命令把罗国范绑了起来。在送往军区的路上，他先后遭遇挨饿、在屋里当着众人的面大便等窘迫遭遇。直到送到军区后，才被松绑。

罗国范老家的亲人，因为家里出了他这个“汉奸特务”也遭到过清算。谈到这些，罗国范坦然地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没有贪污，没有受贿，没干坏事。工作上有没有缺点？有，但是投机倒把的事从来没干过。”

# 长沙头村无战事

王宗富

这个村子不大，抗日战争时期只有80多户人家，360多口人，但名字却很响亮，叫长沙头，比大城市长沙只多一个字。长沙头村位于沭河南岸，村后有一大片梨园，村东有一大片杏林，村南是苏鲁两省交界处颇有名气的九顶茂隆山了，村子便依偎在陡峭的九顶茂隆山的北坡下。村子不大，却是交通要道，从南面、东面和从东南面来的商旅或行人，要到沭河北岸去，必须要经过村北的长沙头渡口过河。

旧时这一段沭河上没有桥，上下二三十里，仅有这么一个渡口，足见这个小村子位置的重要了。

长沙头村区划上几经变动，清代属于郯城县，抗战时至解放后由临沭县管辖，上个世纪70年代又划归江苏省东海县。就是这个村子，抗战时名声在外，在滨海区几乎无人不晓……

## 一、借路

1940年秋天，正是收晒春花生的时候，从东面白塔埠（现属东海县）来的一队鬼子，大约有100多人，还有80多名伪军在前面带路，他们翻越九顶茂隆山后，来到长沙头村口，计划穿过村子，从长沙头渡口渡河北上。

在村口，翻译官向带队的鬼子军官说：“队长，我刚才向几位老百姓打听过了，这个村的村名，不太顺口，叫他妈的什么长沙头！”

“什么？”骑在马上留着仁丹胡子的鬼子中队长立刻跳下了马，叫翻译再说一遍。

“长沙（杀）头！”

“中国人的，大大的坏了的，为什么起这么晦气这么难听的名字？”

翻译急忙解释，“这个村，村子太小，地图上没有标示出来。这儿紧靠沭河，可能由于风沙多，因沙常年堆积在村子的后面，形成一个高地，如一只虎头，故名长沙头。”

当时太阳已经偏西，鬼子队长原是想在这儿开饭的，他早就瞅到了，村里有鸡有鸭，有猪有羊……。可现在他倒是犹豫了。

翻译进言，“到渡口，别无它路，只有经过这个村子的中心大街。”

见队长摇头，翻译又说：“按此地的风俗，虽此村名不佳，叫人不痛快，但我们可以借路。一借解百忧。”

“你的说法，大大的好主意，如何借法才能避开‘长沙头’这个大大的坏名字？”

听村里一位90多岁的叫王西古的老人讲，那天，鬼子、伪军在村里捉了只大黑狗，在村口杀了，祷告一番。伪军中有此地人，说黑狗血能避邪气，逢凶化吉，又放了几挂鞭炮，焚香叩首，向村神、路神借路，以求放行、保护，平安经过。借路仪式完毕，鬼子大队人马便放心地直奔渡口而去。

长沙头渡口的两只渡船满载着鬼子、伪军，一趟接一趟，直往对岸驶去。鬼子队长自以为摆脱了晦风、邪气，又借了路，平安无事了，便站在渡口码头上，蛮横地有些豪气地说道：“不是怕这么个地方，日本人勇气大大的，要征服中国。就是这个村名的大大的不好，令人听了不舒服。日本人的，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没有过不去的地方……”谁知到最后两船时，却出了问题。船到河中间，剧烈地颠簸起来，在迎头的浪花的飞溅中，不知不觉间“呼呼”地进水了，在鬼子的大呼小叫声中，在鬼子慌乱无主中，船猛烈地晃动着，往一侧倾斜、倾斜，竟在瞬间来了个大翻身，底朝天了……

那位90多岁的王西古老人笑着说，那是天意，也是人为。鬼子在村口耽误了时间，沭河武工队趁此机会作好准备，在船上作了手脚，并且开船的4个老大也换上了武工队的人。那天风急浪高，加上河面足有3里路那么宽，那两只船上足足淹死了21个鬼子、18个伪军。有十几个水性好的鬼子、伪军慌不择路，顺风游到南岸时，又被武工队抓了个正着。没响一枪一炮，没费一枪一弹。王西古老人讲到这里，竟忍不住爽朗地开怀大笑了。

1942年夏天，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萧华来到这儿，听到了这个故事，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没想到东洋鬼子还信咱这沭河两岸的老风俗，还戏称长沙头是没有硝烟的村庄。



## 二、听戏

长沙头村村小，但群众逢年过节听戏的兴趣却不小。至今村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都能哼出几出柳琴戏的片段。那时在村子东面的树林中有一个专门用青砖铺设的大戏台，中秋节前后，春节前后，村里除了自己的戏班子之外，还会请外地的戏班来村里演出，那段时间，往往便成了长沙头村最为喜庆的日子。

1941年的中秋节，村里请的是附近北辰村（现属东海县）的戏班子，唱的是京戏《武家坡》。长沙头村及附近十里八乡的观众在戏台前坐了满满一大片，正在兴头上，正在精彩处，此时谁也没有留意，从东南方向的九顶茂隆山的东侧传来了隐隐约约的“轰轰”声，及至声音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响了，越来越刺耳了，人们才不情愿地吃惊地抬起头来，往天上望去。这一望不要紧，人们立刻蹦起来，吆喝开了，戏台前顿时大乱了。原来天上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大家伙，飞得很低，几乎要刮倒树梢了，那个家伙吼叫着像莽牛一样直压过来。有些见识的人便大喊道：

“快跑，这是飞艇（那时人们把飞机叫做飞艇），是日本人的，这东西会下蛋，快跑啊！”幸亏戏台周围全是树林，观众及戏台上那些穿红着绿的演员，那些弹奏乐器的艺人，见势不好，四散奔逃，往林中奔去。可戏台前还有一些人没走，他们假装镇静，人模狗样地叫大家不要乱，不要跑，说这是皇军的，没有什么，我们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原来这是一小队鬼子和一个排的伪军，前来九顶茂隆山上察看地形的，见这儿鼓乐齐鸣，正在唱戏，便也来看个热闹，并想借机打探一下九顶茂隆山一带有无八路军来过。这伙人一来，听戏的人见势不好，便要走。为首的鬼子便说，“中日共荣大大的，谁的走了，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大大的不友善，我们一起看戏，大大的好！”因而听戏的人慑于鬼子的淫威想走而又不肯走。此时，那个为首的鬼子用枪上的刺刀挑着一面膏药旗跳到戏台上，谁知刚摇了两下，飞机就轰鸣着过去了。那个鬼子以为联络成功，便得意地在戏台上踱起步来。可飞机在沭河上空盘旋了一圈之后又绕了回来，竟出人意料地在戏台上空扔下了两颗炸弹。瞬间，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轰响，继而掀起了冲天的有几十亩地那么大的烟尘，遮蔽了当头的太阳。

那天，观众及演员并无大碍，因为他们早就躲到树林里去了，可鬼子、伪军却倒了霉，被炸死炸伤一大片。有人嘲笑，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至今村里还流传着这样的几句话，“戏台演戏，鬼子听戏，飞机不信戏，鬼子完了戏。这不是出戏，其实也是戏。人生大戏台，其中总有谜”。

但从那以后，长沙头村便很少演戏了，鬼子伪军更是闻其名而退避三舍了，谁还愿再光顾这么个不祥之地呢！

## 三、炮楼

长沙头村鬼子不想去，不愿去，但鬼子并不是想放弃这个地方。1941年底，鬼子想在村南的九顶茂隆山头上的大路一侧建一座炮楼，扼经山顶而通往长沙头渡口的大道，并能封锁渡口。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老四团得知消息后，便派沭河武工队的人员和本地入伍的战士，化装成民夫，参加修筑炮楼。他们利用到山坡推石头、到山下运砖的机会分别把几个炸药包也运了进去，偷偷地砌在了炮楼的墙根中。炮楼建得很顺利，监工的鬼子、伪军也很高兴，完工之后便把这些民夫放了回去。长沙头村的李二奎也是民夫，在修建炮楼期间鬼子小队长听说他会炒菜，便叫他做饭，

一是做大锅饭，给抓来修炮楼的民夫吃。二是为他们服务。李二奎厨艺不错，加上能说会道，办事周全，很受鬼子赏识，炮楼建好后，便把他留在炮楼里当伙夫。谁知这李二奎却是一名武工队员。他趁到附近集市上买菜的机会，把导火索、雷管带了进来。除夕之夜，炮楼内一片欢腾，鬼子、伪军大鱼大肉，喝得耳热酒酣，猜拳划令，不亦乐乎。李二奎还给在炮楼顶上站岗的伪军拿来酒、菜，叫他们坐下来喝个痛快，说大年三十，八路军、武工队也是人，也想过年那。这山顶上有大炮楼，卡着路口，哪个敢来啊！暗地里却在炮楼外侧自己早就记准了的那几个位置上动了手，轻车熟路地用铁丝钩子勾开墙缝，露出了用油纸包裹安放在墙体中间的那几包炸药，装好雷管和导火索……鬼子、伪军频频举杯，一直喝到夜半，正在迷迷糊糊之中，炮楼在连续的爆炸声中哆嗦着坍塌下来。山下村里过年的鞭炮响了，山上石头、瓦片、木棒乱飞，鬼哭狼嚎，而埋伏在四周的老四团的一个排及沭河武工队此时冲了进来，当场抓了20多个没被炸死的俘虏。

以后鬼子再也没有在这个地方重建炮楼，长沙头村里一些老人至今还能依稀地辨识出当年那个大炮楼的遗址。

八年抗战，长沙头村无战事，长沙头村外却战火连绵，这个小小的名不见经传的村子，一时在沭河两岸被传得神乎其神。以致1987年，当年八路军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将军重返滨海区，来到沭河岸边时，还提到这个村子，笑着说：“那个会杀头的村子当年令鬼子不知所措，不寒而栗呀！”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抗战时曾在山东分局工作（1941年至1943年初，任山东分局秘书处主任），后来曾到过长沙头村，他说：“长沙头村无战事，是这个村子的光荣，当年在滨海区令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村子还不少呢！”

而今，经过县民政局的同意，长沙头村已更名为兴辰村（兴是兴盛，辰是因长沙头村属于南辰乡），告别了那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从清代沿袭而来的老村名。



# 铁军大帐追歌行 (六)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云岭军部种墨园的早晨

## 泾县云岭——三年生死情

(1938年8月2日——1941年1月4日)

云岭新四军军部位于安徽省泾县云岭镇。1938年8月2日，叶挺率新四军军部机关进驻此处，这是军部选定、并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同意，为新四军军部划定的最新驻地。

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军直各机关与单位包括司令部、政治部、教导总队、战地服务团、修械所等，分别住在山冲中的罗里、南堡、中村等13个自然村里，分布的路线长、面积广，但是村距都很近，道路较平整，交通甚便利，联系很方便，很适宜于一个大的军事机关驻扎，也适宜于设置后方。云岭成为新四军在华中抗日的领导与指挥中心。

新四军军部司令部位于罗里村，旧址原为两座地主庄园。一叫“种墨园”，是罗里村地主陈冠群的宅院，3进47间，包括一座沿街小楼和一处后花园，总面积1638平方米。一叫“大夫第”，

是罗里村地主陈福记的宅院，总面积2000多平方米，新四军军部借住了三分之一，共20多间平房。叶挺、项英、周子昆、李一氓等分别在这两个宅院办公居住，同时还有参谋处、秘书处、作战科、机要科、通讯科、文印、摄影等机构。1939年2月，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云岭视察，即住在“种墨园”内。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新四军军部期间，就住在叶挺住所的二层阁楼上。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比新四军军部晚数月，于1938年11月迁至云岭，设于云岭山麓丁家山村。东南分局原属于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同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

新四军军部在云岭近3年时间，是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关键、重要时期。在军部领导下，新四军将士活跃在大江南北，英勇抗敌，浴血奋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创建了众多的抗日根据地，谱写了光辉的抗战篇章。北有太行，东有沂蒙，南有云岭，云岭成为新四军光荣而骄傲的地域性标志，也成为培育呵护军部的一片红色沃土。第一任军部立足发展于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绞杀之下，最后也不幸歿没于此。军部乃至全军，都与云岭结下了难割难舍的生死之情，永不磨灭的刻骨铭心。

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于1962年筹建，1963年7月，陈毅元帅敬题“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馆名。

## 一、叶挺无奈离军部，周公力劝回云岭

1938年8月2日，叶挺率新四军军部司令部机关进驻云岭罗里村。或许是缘分，抑或是天意，当然肯定是巧合：罗里村背后的青山，名字就叫“叶子山”；村东一箭地有一条四季不涸、流水潺潺的小河，名字就叫“叶子河”。算天时观地利，这里似乎就应当是叶挺大将军立足发达之地。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叶挺在叶子山下、叶子河畔仅仅住了两个月，便舍弃了军长之职，只身离开了军部，一路去了广东。

叶挺的出走，引起了方方面面的极大震动，激起了喜忧截然的强烈反响。人们都在猜测分析叶挺出走的原因，一时众说纷纭。



云岭军部大夫第

从新四军成立以来，军部一直四处转移，没有相对固定住所。到达云岭后，无论从云岭自然环境、战略位置、战局态势与上峰意图上分析，可能要长住下来。叶挺与司令部的住处“种墨园”，是当地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处地主庄园，办公居住相当宽裕，不仅各部、处、科、室及工作人员各得其所，叶挺还有了作为军长应当享有的条件，办公室、会客室、卧室、餐厅一应俱全，在餐厅后面，竟然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后花园，园内有清水池、碎石径、百花圃，既可以在这里安静地踱步，思考大事，也可以在这里晨练健身，当然随时都可以观花赏月。这个“种墨园”，确实是个居住休憩、修身养性的好去处。

但是，这一切不但没有让叶挺“不亦乐乎”“乐不思蜀”，心情反而更加郁闷起来。早在6月初军部还驻扎在土塘时，叶挺就专程到武汉找到周恩来，反映了自己的境况，并提出在军部建立一个“新四军委员会”，吸收自己参加，以便让他这个军长能够名正言顺地参与一些军事问题的研究与决策。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毛泽东都作了答复，同意成立这个委员会，但项英却拖着不办。7月底，项英去延安参加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叶挺率军部进驻云岭。军部各项工作越来越走上正轨，叶挺却越来越觉得自己更加成了一个“影子军长”。军部的一切重大问题包括军事问题，实际上仍然都由去了延安的项英遥控指挥。军部的各位军事、政治首长都是中共党员，叶挺作为“非党”，既无权力、也无底气向他们发号施令。项英人不在军部反而更像无时不在，叶挺人在军部反而更像不存在，这让叶挺更加尴尬。一心抗日却有力使不出，名为军长却形同摆设。叶挺心中委屈日甚，愈积愈深。

就在此时，军直单位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让叶挺受到了很大刺激。军部特务营营长叶道志、徐长胜等3人，是从延安抗大随袁国平调到新四军的。他们在红四军时曾任过师、团级干部，到新四军后被接连降级使用，本人思想都想不通。于是，3个人带着武器，以看地形为由开了小差，准备仍然回到八路军去。如此重大的问题，当时军部特别是司令部的几位负责人早已知晓，而且他们天天就与叶挺在一个院里办公、住宿，竟然没有一个人向叶挺及时汇报，也没有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但是纸里包不住火，何况叶道志是特务营营长，怎么能长时间瞒得过军长？叶挺得知了此事，并且得知了他们携带走的3支崭新的驳克枪和每枪的120发子弹，就是自己的夫人李秀文费尽气力从香港募捐购买来的。气、恼、火一下涌上心头，叶挺责问副参谋长周子昆：“跑了3个军官为何不向我报告？”周子昆支支吾吾，无言以对。叶挺更为生气，命令：“限期给我把这3人抓回来，否则军法从事！”周子昆急



云岭中共中央东南局旧址

忙派人去追赶，一直追到景德镇的山区才找到3人，叶道志被抓回，徐长胜在逃跑中被击毙，另一人逃脱去了八路军（建国后晋升为中将）。

叶道志被捉回后，叶挺坚持认为他是犯了携枪逃跑罪，上报了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顾祝同。顾随即作出批示：叶道志为“投敌叛变罪”，由军部军法处对其执行了枪决。

198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叶道志、徐长胜的问题进行了甄别，认为他们的目的不是投降敌人、叛变革命，主要是对任职偏低有意见，想回八路军。因此，其性质是违反纪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平反。但是，当时对这件事，尤其是军部几位负责人竟然知情不报，让叶挺感到难以容忍。如果自己是中共党员，他们几位敢不向他报告吗？连自己属下都不把自己的权威放在眼中，他这个军长还怎么当？

与此同时，新四军面临的形势也开始变得更加严峻。由于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广泛出击，沉重地打击了日军，日寇开始频繁地对新四军发动了“扫荡”“清剿”；盘踞在华中的国民党顽固派又怕新四军抢夺了他们的地盘，也开始对我军不断袭击。一时间，新四军面临着日伪顽多方面围攻。这种复杂严重困难的局面，让叶挺深深感觉到，莫说自己这个有职无权的影子军长难以应对，就是有职有权，也是独木难撑。如不及时排危解难，叶挺又生怕新四军刚刚开辟的大好局面半途而废，正在发展壮大新四军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无实权而又难辞其咎，叶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进退两难。

思来想去，叶挺于8月下旬致电中共长江局，提出辞去新四军军长之职。

8月28日，长江局王明、周恩来、博古复电叶挺，表示挽留：“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安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正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到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长江局对叶挺的态度还是相当诚恳与实在的。

但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情况，让叶挺对今后不抱什么希望。他去意已决，遂于9月30日给中共长江局又发一封急电，并请转发给远在延安的项英：“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力所能处理……你离部之期已远逾去时之约，恳即从速南归……我拟于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湘赣观察各方情形。你何日归，盼即告之。”

电报发出后不久，没等项英回电，叶挺便于10月上旬离开了云岭军部。叶挺出走，不是盲无目标、回避斗争，他的心思还是时刻拴在抗战上。当时日军正对广东大举进攻，并于10月21日占领了广州。掌管广州军政大权的国民党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率部撤退到了粤北的韶关。为了保住自己在广东的地盘，余汉谋正在准备成立一支“东江游击纵队”，仿效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牵制日军，只是苦于无有良将出马担纲。叶挺闻讯，随即赶到韶关，向余汉谋表示了意在广东带队伍打鬼子的想法。余汉谋如同见到救星一般，随即任命叶挺为“东江游击总指挥”。

当一个人的命运已经注定与民族、国家、历史联接在一起时，他是根本无法自己左右与选择的。

叶挺的出走在国共双方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蒋介石高兴得眉飞色舞：共产党连叶挺都容不下，还说搞什么统一战线？连叶挺都不再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将无人与共产党合作。叶挺不当军长，又正好借此机会，派别人去收编了新四军。他向中共明确表示，既然叶挺已经离开新四军，新四军的问题必须重新解决。当然，他也



周恩来、叶挺在  
去云岭途中

大骂了广东的余汉谋一通：“你太蠢！这不等于让共产党在华南地区又建立起了一支新四军？”余汉谋吓得胆战心惊，赶紧下令撤销了对叶挺的任命，让叶挺离开东江。

中共方面更是难隐焦虑：叶挺出走，不是他个人的事情，关系到我党的政治、社会影响与新四军的未来。中央命令项英，不要等到六届六中全会闭幕，立即赶回军部。同时急电周恩来等人：坚决反对蒋介石另派军长。要认真做好工作，迅速动员叶挺回新四军，并“彻底解决其在新四军的工作问题。”但是项英却对叶挺的离去表现出了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他致电党中央和周恩来说：“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四军问题应由周与蒋解决继任人。以后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之办法。”11月2日，周恩来复电项英，否定了他另换军长的意见，认为“为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希叶回部工作是有利的。”

周恩来立即通过各种渠道，与叶挺取得了联系，并请他到重庆面谈。叶挺尊重与服从周恩来，立即放下正在筹备的东江游击纵队的工作，辗转到达重庆。两人一见面，周恩来就主动抢先上前，紧紧握住叶挺的双手，坦诚而真切地说：“我代表毛泽东同志向你道歉！项英给你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真对不起你！”

几句话，说得叶挺热泪盈眶，满腔委屈瞬间化解了一半。但是此后几次长谈，叶挺对回新四军，主要是项英对他的态度能否转变，两人能否和衷共济，仍然心存顾虑。他对周恩来说：“可不可以让我到八路军中去带兵打仗，不论到哪个师，担任何种职务，我都愿意。”

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道：“党中央认为，华中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留在华中，比去八路军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何况你任新四军军长是国共两党商定的，不好随意变动。为了处理好你和项英的关系，党中央不仅要求抓紧成立新四军委员会，而且已于1939年1月10日决定，改由你担任委员会主任，项英任副主任，要求军事工作主要由你来负责办理，项英同志实际履行政委的职责，还要求对全军进行一次再教育，以确立你的军长权威。”

周恩来的诚恳温暖，党中央的周密考虑，彻底感动了叶挺。他终于表示，还是听从党的指示，回新四军工作。周恩来如释重负，十分高兴，并表示：“到时候我们一起动身，我送你回云岭。”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叶挺还去面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还想拿这件事做文章，别有用心地问叶挺：“你在新四军里自由不自由？书信电报受不受检查？共产党有没有叫你恢复党籍？”同时老话重提，恐吓叶挺：“他们都是共产党，你不是共产党，将来你会有生命危险，我很为你担心。你还是离开新四军，到国民党中来做事。”

叶挺对蒋介石的离间计早已习以为常，明确地表示，他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不日将启程返回云岭军部。

本来以为有机可乘的蒋介石，又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对叶挺下了逐客令。

1939年2月15日，正值新春佳节前夕，周恩来带领叶挺等，由重庆转路去云岭。他此行，对外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名义到前线视察，对内则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到新四军检查指导工作。中途，叶挺先行一步，提前回到云岭准备迎接周恩来。

2月23日，周恩来一行到达云岭。

叶挺出走后，正在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项英按照中央指示，提前离会，于1938年10月22日回到了云岭。但是，项英对导致叶挺出走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没有处理好与叶挺的关系，似乎还没有自觉认识，甚至对叶挺的出走持批评与不满的态度。他对叶挺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对他的离开可能对新四军、对统战工作产生的重大影响，估计很不足。因此，当周恩来与叶挺来到军部时，项英仍然处处一副“一家之长”的样子，抢在叶挺前面。

当天晚上，在军部为周恩来举行的小型宴会上，项英又不向叶挺打任何招呼，以新四军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与口吻，第一个举起酒杯：“我代表东南局、军分会和军部向周副主席表示热烈的欢迎！”

当大家都响应项英的提议，举起酒杯时，却发现周恩来似乎根本没有听见项英的话，也不正视项英一眼，双手抱臂，端坐不动。

周恩来的神态，让项英十分尴尬，满脸窘态，其他同志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场上的气氛一下凝固了。叶挺为了缓和气氛，维护项英的面子，赶紧站立起来，举起酒杯：“我和项英同志代表新四军全体指战员，欢迎恩来同志前来指导工作！”

周恩来这才破嗔为笑，转愠为喜，高兴地举起酒杯，一边连声道谢，一边与大家一一碰杯，一饮而尽。

为了表示与叶挺的亲密无间与尊重，周恩来此次云岭之行，就在“种墨园”军部司令部叶挺卧室一侧的小会客室中，搭起床板，做了一张简易床铺，与叶挺时时促膝谈心。

处理叶、项关系，解决叶、项矛盾，是周恩来这次云岭之行的首要任务。周恩来首先在军部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叶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强调了叶挺军长的地位与权威。之后，周恩来与项英专门进行了多次深入交谈。事已至此，周恩来也不再讲究工作方法，对项英进行了直截了当、开门见山的批评。尽管项英再三为自己辩解和超脱，但是总让人觉得于情、于理、于实际都不合。最后，项英干脆对周恩来说出了隐藏于心底的、从一开始就对叶挺存在的成见：

第一、叶挺在困难时候不坚定，脱离了党的领导。原则性极强的项英，认为叶挺经不住考验，这是最突出最根本的问题。

第二、项英看不惯叶挺生活细节上的一些表现，比如讲究、场面等。这些也与我们共产党人的传统与作风格格不入。

这两条，一个是政治立场问题，一个是作风问题，都是原则问题。项英觉得在



周恩来、叶挺、  
项英在云岭合影

原则问题上，自己不能让步。

项英终于说出了心结，周恩来就耐心地为她一一解开“死扣”：

第一，叶挺在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主要原因是因为党内极“左”负责人对叶挺的无端责难与惩办主义所导致，叶挺是冤枉的。党内的极“左”思想是错误的，后来也得到了纠正，叶挺的冤枉早晚在党内也要得到纠正。叶挺虽然受了冤枉，但在他脱党10年中，政治上一直是好的，他的心始终向着共产党。决不能因为他现在不是共产党员，就不信任他。蒋介石多次让叶挺重新加入国民党，却遭到了叶挺的坚决拒绝；而他却曾多次向党中央提出重新加入共产党。这还不证明他的政治立场吗？只是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包括我认为叶挺暂时不重新加入共产党为宜，这对国共合作更为有利。如不考虑这一点，叶挺同志的党籍很容易解决。早在叶挺去延安时，他对毛主席第一件要求，就是说：“现在我已是新四军军长，共产党党籍问题能不能恢复？即便不能公开地恢复党籍，秘密地恢复也行。”毛主席说：“你不当共产党比当共产党的作用更大。当了共产党你就不能当军长了，许多话和要求也不好说了。不是你叶挺不能当共产党员，而是你不当共产党员对开展工作更有利。”叶挺虽然很有些遗憾，但是还是服从了中央的决定。

第二，对叶挺同志不能只从表面上、做派上看待，不能只从生活细节上衡量与要求，他目前的地位与环境，讲究一些完全可以理解，应当接受。如果不从主要的、本质上看待，你只能觉得问题越看越严重。

周恩来的话，态度明确，入理入情，项英不得不认真掂量，仔细考虑。最后，他向周恩来表示，自己对待叶挺确有不当之处，愿意向叶挺做自我批评。叶挺对项英并无其他苛求，见在他面前一向高高在上的项英竟然向自己认错，感动莫名，立即表示了谅解。此后，两人的关系似乎融洽了许多。

# 经学大师郑玄

于岸青



郑玄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流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一、家世与童年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省高密县）人。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年），卒于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

郑玄的家世本来比较显赫。其远祖名叫郑国，字子徒，是孔子的弟子，其后世封为胸山侯。郑玄的八世祖郑崇，字子游。为高密大族，西汉哀帝时官至尚书仆射，《汉书》中有传。郑崇为人刚直不阿，很受哀帝的信任和重用，常与宦官、幸臣等作斗争，后来佞臣诬陷，惨死狱中。到了郑玄出生时，郑氏家族已经败落了，他的祖父郑明、父亲郑谨，都没有出仕，只在乡间务农，家中生活也比较贫寒。

郑玄自幼天资聪颖，又性喜读书，勤奋好学。他从小学习书数之学，到八九岁时就精通加减乘除的算术，不但一般的大人比不过他，即便是读书人，不专门学习书数者也赶不上他。到了十二三岁，他就能诵读和讲述

《诗》《书》《易》《礼记》《春秋》这儒家“五经”了。同时，他还喜欢钻研天文学，并掌握了“占候”“风角”“隐术”等一些以气象、风向的变化而推测吉凶的方术。

郑玄自少年时就一心向学，确立了学习经学的志向，终日沉湎于书卷中，孜孜以求。他不尚虚荣，天性务实，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十一二岁的时候，他曾随母亲到外祖家做客，当时客人很多，在座的十多位客人都衣着华美，打扮一新，一个个言语清爽，夸夸其谈，显得很有地位和派头。唯独郑玄默默地坐在一旁，似乎身份和才学都赶不上人家。其母见状，感到面上无光，便私下教导他，出头露面的场合要显露点才华，表现点阔绰和神气。郑玄却不以为然，说这些庸俗的场面“非我所志，不在所愿也”（《太平广记·玄别传》）。

郑玄16岁的时候，不但精通儒家经典，详熟古代典制，而且通晓谶纬方术之学，还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当地声名远播，被称为神童。当时朝廷的统治者相信灾异、符瑞之说，把各种自然灾害视为上天对人类的惩罚和警告；而把自然界罕见的一些现象，如禾生双穗、珍禽异兽出现等，看作上天对人们的奖励和对“政治清明”的赞赏。为了证明统治者的行为符合天意，朝廷便鼓励地方官府将“符瑞”逐级上报，借以神化和歌颂封建统治，麻痹人民。但当时的吏治已经坏透了，州、县官吏大都是白丁，写文章也难以象个样子。这一年民间有人献瑞，不同的两棵秧长到一起结了一个瓜，称为“嘉瓜”；一枝禾稻结了两个稻穗，谓之“嘉禾”。县里要讨好上级，就将“符瑞”的情况写成公文并加上颂辞上报，无奈官吏鄙陋无文，写的东西实在拿不出手，只好请神童郑玄来改写。郑玄改写好了公文，又写了两篇颂辞，备受县吏的赏识。郡守认为郑玄是少有的奇才，不愧神童之名，后来亲自为他主持了冠礼（男子20岁时为表示成年而举行的加冠典礼）。

郑玄对术数之学的研究很有心得，成名很早。据《玄别传》记载，郑玄17岁时，有一天正在家读书，忽见刮起了大风，他根据自己掌握的一些方术来推算，预测到某日、某时、某地将要发生火灾。于是，他立即到县府去报告，让政府早做准备。到了某日某时，某地果然发生了火灾，但由于早有准备，并没酿成大害。这件事不胫而走，郑玄又被当地视为“异人”。

## 二、不乐为史 折节向学

伴随着知识和学问的增长，郑玄步入了青年时代。他虽然立志于潜心钻研经学，并已具有了一定的经学造诣，但由于家境贫寒，生活困苦，已没有条件继续专门攻读了，父母兄弟迫于生计问题，也都不允许他再不事产业而长年读书了。18岁那年，他不得不出仕，充任乡啬夫之职。汉代地方政府实行郡、县二级制，县以下设乡、亭、里、什、伍等，一般是五户为伍，十户为什，百户为里，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啬夫是乡一级地方小吏，掌管诉讼和税收等事。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郑玄勤勤恳恳，十分认真，抚恤孤苦，甚得乡里的好评，不久便晋级而成为乡佐（大约相当于现在副乡长的职位）。

虽然上司器重，乡亲拥护，但郑玄却不安于乡吏的工作，不愿为吏以谋生，而一心向往研究学术。因此，他在做乡吏的同时，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刻苦学习，每逢休假日也不回家，而到学校中向先生请教各种学术问题。他的父亲对此极为反对，一再督责和训斥他。但这改变不了他的志向，他仍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到21岁时，已经具有了深厚的经学功底，并精于历数图纬之学，兼精算术，成了一位满腹才学的年轻学者了。

当时有一位名士名叫杜密，与大胆反对宦官的“天下名士”李膺齐名，人称“李杜”。杜密升任泰山太守、北海相，到高密县巡视时见到郑玄，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把他升调到郡里为吏录，使他得到学习和深造的机会。从此，郑玄便结束了他的乡吏生涯。

到了北海郡不久，郑玄又辞去吏职，入太学受业。他的老师名叫第五元先，曾任兖州刺史，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经学博士。郑玄从师第五元先，先后学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俱达到了通晓的程度。其中《京氏易》是西汉京房写的，《公羊春秋》是战国公羊高传述、西汉初成书的，这两部书都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三统历》是西汉刘歆写的历法，《九章算术》则传说是西周周公著的，这两部书都属历数之学的重要著述。

此后10年左右，皆为郑玄折节求学的时代。他师第五元先后，又从东郡张恭祖学习了《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其中除《礼记》和《韩诗》外，均为古文经学的重要典籍。

郑玄向第五元先和张恭祖学习了今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重要经籍后，不以此为满足，又从陈球受业，学习了《律令》。在此期间，他还以明经学、表节操为目的，游学于幽、并、兖、豫各地（相当于今山东、河北、河南一带），遍访名儒，转益多师，虚心向他们学习，共同探讨学术问题。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辞劳苦，孜孜求道，郑玄的青年时代，就是这样匆忙而充实地过去了。

到了而立之年后，郑玄已经成了一名有着较深造诣的经学家。他的学问在山东（指的山以东，今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已经可以说首屈一指、无出其右者了。

### 三、壮年去国 游学关西

郑玄虽然已经学富五车，但他自己并不满足，学无止境，越学反越觉得知识不够用。当他感到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学者已经无人再可请教的时候，便通过友人卢植的关系，离开故国，千里迢迢西入关中，拜扶风马融为师，以求进一步深造。这一年，郑玄是33岁。

马融是扶风茂陵（今属陕西兴平）人，为当时最著名的经学大师，学问十分渊博。他遍注儒家经典，使古文经学达到了成熟的境地。他的门徒上千，长年追随在身边的就有400余人，其中优秀者亦达50人以上。其为人比较骄贵和讲究，虽然门徒众多，但他只亲自面授少数高材生，其余学生则由这些高材生转相授业。郑玄投学门下后，三年不为马融所看重，甚至一直没能见到他的面，只能听其高足弟子们的讲授。但郑玄并未因此而放松学习，仍旧日夜寻究诵读，毫无怠倦。

有一次，马融和他的一些高足弟子在一起演算浑天（古代一种天文学）问题，遇到了疑难而不能自解。有人说郑玄精于数学，于是就把他召去相见。郑玄当场很快就圆满地解决了问题，使马融与在场的弟子们都惊叹不已。马融对卢植说：“我和你都不如他呀！”自此以后，马融对郑玄十分看重，郑玄便把平时学习中发现而未解决的疑难问题一一向马融求教，对于典籍的奥旨寻微探幽，无不精研，终得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了7年，因父母老迈需要归养，就向马融告辞回山东故里。马融此时已经感到郑玄是个了不起的人才，甚至会超过自己，他深有感慨地对弟子们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说，由他承传的儒家学术思想，一定会由于郑玄的传播而在关东发扬光大。

#### 四、党锢之祸与隐修经业

从马融那里学成回乡后，郑玄已经40多岁了，这时他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精通今古文经学的大师了，百家之学无所不通。于是远近有数百上千人投到他的门下，拜他为师，听他讲学。当时他家里还很贫穷，便“客耕东莱”，一面种田维持生计，一面教授门徒。东莱在今山东即墨县东南不其城南山下，环境十分优美，山上有古井不竭，井边生有一种细而长的草，和薤一样一尺多长，很有韧性，时人称之为书带草，因郑玄被人叫做康成书带。郑玄与弟子们隐居于此，过着清贫而安谧的生活。

本来，像郑玄这样学问好名声大的经师，是会被推荐或征召入朝为官的，他本人也未尝不是这样打算的。但谁知正在此时，却发生了“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是东汉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宦官、外戚两派长期斗争的产物。外戚当权，即杀戮和罢免一大批宦官，而提拔重用他们的同党；反之，宦官掌权，则大杀外戚集团，罢免和压制外党。桓帝时，一批比较正直的士家豪族和“名士”出身的封建官僚，联合3万多大学生，一起反对宦官集团。宦官则控制了桓帝，捏造罪状进行反击，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陈实、杜密等200余人，并对逃亡者悬赏追捕。这就是发生于延熹九年（166年）的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来，由于外戚集团的支持，桓帝下令开放李膺等200人。不久，外戚与党人联合起来计议诛杀宦官，泄秘后反被宦官先发制人，阴谋陷害，将李膺、杜密等200余人一并下狱处死。之后，又在全国各地陆续逮捕“党人”。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下诏各州郡查究党人，凡“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现居官位者，一概免职禁锢，这就是所谓第二次党锢之祸。所谓“党锢”，也就是视为党人而予以禁锢，绝其仕进之路，永远不许为官。郑玄曾为杜密故吏，又曾受杜密的赏识与提携，所以也被视为党人，于建宁四年（171年）和同郡孙嵩等40余人俱被禁锢。这一年，郑玄45岁。

郑玄被禁锢后，绝了仕进之路，便闭门不出，隐修经业，集中全部精力来进行遍注群经的工作。郑学的主要成就，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秦始皇焚书后，汉代有一些老儒生凭记忆背诵出来一些经文，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即今文）记录并整理出来，叫做“今文经”。西汉成、哀之世，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发现了一部用古籀文字书写的《春秋左氏传》，再加上由孔壁所得的《逸礼》《古文尚书》，和当时尚未立于学官的《毛诗》，便成了古文经的主要经典。研习今文经的，叫今文学派，修读古文经的，叫古文学派。今古文经不仅经文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解说和观点差异甚大。两派各按自己的观点注经立说和收徒讲学，渐成水火不相容之势，发展到相互指责、论辩，相攻如仇。后来，古文经也被立于学官，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两派的斗争更加经常和激烈了。到东汉时，今古文经并行，古文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郑玄进入经学界，正是处于今古经学派激烈斗争的形势之下。

今古文经学派的相互攻击，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进步意义，虽然两派都各自有一些长处。经学讲究“师法”和“家法”：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叫做师法；同一经师的不同学生又各自为家，故师法之下又讲家法，在遵从师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一家之言。所以，师法是追溯渊源的，家法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如此“疏不破注”，叠床架屋，致使一经就有数家，一家又有若干说，各讲各的一套，谬误百出，使后学者不知所从。繁琐、支离、教条，成了经学的突出弊病。

郑玄起初从第五元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后来他又跟张恭祖学习《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这是属于古文经学派

的。可见他并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而是博学多师，兼收并蓄。他在马融门下受业多年，而马融乃是古文经学大师，总的看，他是倾向于古文经学一派的。但是，郑玄并不遵守当时经学中师法、家法那一套，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遍注古文经，注中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今文经学家的解释。即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

在受禁锢的14年中，郑玄遍注群经。郑注出现以后，原来各守门户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便逐渐不再为人们所遵从了。他在当时不仅集古文经学之大成，而且使古文今文融为一炉，独创了一个新的学派——郑学。人们转而崇尚郑学，使之逐渐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例如，郑玄所注的古文经学费氏《易》流行，而今文经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废止了；郑注《古文尚书》流传，而今文经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散失了；郑玄笺注了古文经的《毛诗》，而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的《诗》也就不显了。郑学的出现，使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皮锡瑞《经学历史》）。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当时有位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名叫何休，他用17年的时间写成了《公羊春秋解诂》一书，对《公羊》一书的内容多所发明。从他的《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三文可见，他认为《春秋》三传中只有《公羊》义理深远，象墨子的城防一样无懈可击。而《左氏》与《谷梁》二传则存在严重的缺点，根本不值得研究。郑玄乃针对他的观点，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驳斥之。他认为三传各有其优缺点，《公羊》并非十全十美。何休读了郑玄的文章，也带着叹服的口气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意思是说郑玄能从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用他自相矛盾的说法来驳倒他的立论。由于郑玄对何休的批驳十分有力，使经师和学者们十分惊服。据说当时京师之人称何休为“学海”，而称郑玄为“经神”，郑的声望远超过何。当时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郑玄门下者甚众，他的徒党遍天下。

总之，郑玄从45岁被禁锢，到了58岁（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蒙赦令，前后长达14年。在此期间，他打破了经学的家法，注释与著书“几百余万言”，创立了郑学，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 五、守节不仕与隐居授徒

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东汉王朝为了平息地主阶级内部的纷争一致镇压农民起义，大赦党人，这时已58岁的郑玄才获得自由。

郑玄曾先后游学十几年，走遍了各地。他著述丰赡，又弟子众多，在当时是有相当大声望的。解除党禁后，朝廷当政者于是争相聘请他入朝担任要职。但郑玄求名而不求官，羞与外戚闭寺为伍，绝不愿涉足仕途，乃屡拒征辟，一心一意从事著书讲学的工作。

灵帝中平二年（185年），执掌朝廷权柄的外戚大将军何进为了笼络人心，首先征辟郑玄入朝为官。州郡官吏胁迫起行，郑玄不得已，只好入朝去见何进。何进为表示礼贤下士，对郑玄礼敬有加，设几、杖之礼以待之。郑玄为保其名士节操，拒不穿朝服，只穿普通儒者的便服与何进相见。仅隔了一夜，未等授予官职就逃走了。

灵帝中平四年（187年），三司府曾先后两次征辟郑玄，但他都借故婉言谢绝了。第二年，郑玄与荀爽、申屠蟠、襄楷、韩融、陈纪等14人并被征为博士，他因父丧而未去。后将军袁隗表举郑玄为侍中，他仍以居丧为理由而拒绝出仕。中平六

## 名人素描

年（189年），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不久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迁都于长安。这时，公卿们又举郑玄为赵王干之相，但因战乱道路不通，仍没有受召。

郑玄屡拒征辟，其间除避乱于南城外，大抵是在家乡隐居，聚徒讲学，专心经术，著书立说。他的弟子遍于天下，多有人自远方而投至门下，如河内赵商、崔琰、公孙方、王基、国渊、郗虑等即为其间著名者。他的学生超过千人，为一时之盛。

献帝建安二年（197年），袁绍为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为北中国最大的割据势力。一次他大宴宾客，郑玄应邀出席，在席上对一些所谓“豪俊”的提问进行了一一的答对，语惊四座，使宾客无不折服。袁绍乃举郑玄为茂才，并表请郑玄为左中郎将，但郑玄却毫不为之所动，予以婉拒。

献帝建安三年（198年），献帝征郑玄为大司农，这是位列九卿的高官，给安车一乘，所过郡县长吏送迎。郑玄在家拜受后，便乘安车至许昌，但马上又借口有病，请求告老还乡。他虽然并未到任就职，但已经拜受此命，故世人称他为郑司农。

总的看，郑玄解禁后被州辟、举贤良方正、茂才等共有14次，皆拒不受。公车征左中郎、博士、赵相、侍中、大司农，也都没有就职。在汉末黑暗的社会情况下，郑玄有意保持其名士的清节，不肯与他所鄙视的那些外戚、宦官及唯名利是图的假名士们为伍，而一心在学术上发挥自己的才智。以布衣而雄视世人，不愧为真名士。

## 六、颠沛流离的晚年生活

郑玄不受征召，最初是领着学生们隐居在不其城南山里，进行注经和讲学活动。由于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后来终至粮食断绝，无法维持下去了，只好与学生们痛哭一场，分手各奔前程了。



平邑郑城观音山，郑玄衣冠冢在此山下

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黄巾军攻占青州，郑玄在高密也待不下去了，便逃到徐州南城（今平邑郑城）避乱。徐州牧陶谦曾大破黄巾军，境内比较安定，他听得郑玄到来，极为欢迎，以师友之礼相接待。郑玄把自己安顿在南城之山栖迟岩下的一所石屋里，很少出头露面，仍然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经典，注释《孝经》。

郑玄在南城住了五六年，当时孔融为北海相，对郑玄特别尊崇，他一面为郑玄修葺庭院，一面再三派人敦请郑玄回郡。建安元年（196年），郑玄便从徐州返回高密。据《后汉书》本传记载，郑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大批黄巾军，但他们却对郑玄十分尊重：“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黄巾军尊重士人，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而郑玄是一位真正的名士，在颠沛流离中非礼不动，也是他能够获得黄巾军尊重的原因。据《后汉纪·献纪》，高密一县，竟未受黄巾抄掠，郑玄以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保护了乡梓。

回到高密后，孔融待之甚厚，告诉手下僚属称之为郑君，不得直呼其名。这样，郑玄在70岁时算是结束了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活，他老当益壮，仍终日精研经典，博稽六艺，并时常睹览秘书纬术。可就在这一年，他竟又惨遭人伦大变，经受了老年丧子之痛。他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益恩，23岁时被北海相孔融举为孝廉。这一年春夏之间，袁绍之子袁谭率黄巾降兵攻北海，围孔融于都昌（今山东昌邑），情势万分紧急。益忍受父命率家兵前去营救，结果反被围杀，时年仅27岁。益恩死后，生有遗腹子，郑玄因其手文与自己相似，取名叫小同。

献帝建安五年（200年），郑玄已经74岁了，饱经沧桑，身体常觉不适。这年春天，他梦见孔子对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己。”（《后汉书》本传）这一年是农历庚辰年，即龙年，而来年是辛巳年，也就是蛇年，旧说龙、蛇之年对圣贤不利。所以他醒来后很不高兴，认为自己当不久于人世了。这一年，袁绍与曹操的大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会战。袁绍为壮声势，争取民心 and 士望，叫袁谭逼迫郑玄随军，郑玄无奈，只好抱病而行。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境），病势加重，不能再走了，同年六月病逝于此。病重和临危之时，他还在注释《周易》。

郑玄死时正处于大战乱之际，所以葬礼从简，但自郡守以下的官员和受业弟子也有一千多人裹经（披麻戴孝）送葬。最初葬于剧东（今山东益都境内），后又归葬于高密县西北50里刘宗山下的厉阜。现在此地仍存有唐代墓碑和郑玄祠庙，距此不远，则是孔融当年给他立的“郑公乡”。

郑玄的学生们十分敬仰这位老师，为了纪念恩师的教诲，他们像孔门弟子为纪念孔子而编辑《论语》一样，也把郑玄平时和弟子们问答五经的言论编辑为《郑志》，共有8篇。

# 三朝贵戚唐初宰相萧瑀

邹逸俊



萧瑀（575年—648年），字时文，祖籍兰陵，南朝梁明帝萧岿第七子，梁末帝萧琮异母弟，萧皇后之弟。萧瑀从小以讲孝道闻名天下，善于学习和书写，个性正直，为人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并且深刻精通佛法道理。

萧瑀初封新安郡王，西梁灭亡后随其姐萧皇后进入长安，因为是萧皇后之弟的缘故担任内史侍郎，不久被免官贬为河池太守，随后又降唐受封宋国公，任光禄大夫。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五次担任宰相，又因故五次被罢免，严重时甚至被削爵贬出京城。贞观十七年二月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第九位。

贞观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萧瑀因其姐姐萧皇后去世受到沉重打击，再加上当时又身染重病，被李世民召往玉华宫后不久便去世了，时年74岁，卒赠司空、荆州都督，谥曰贞褊公。

## 出身皇家

萧瑀出生于后梁帝王之家，高祖父是南朝梁武帝萧衍，曾祖父是昭明太

子萧统，祖父萧督，是后梁宣帝，父亲名岿，是后梁明帝，萧瑀九岁那年，被封为新安郡王，姐姐是隋朝晋王杨广的妃，后跟随其姐进入长安。

### 留任长安

作为皇子，萧瑀在无比优越的皇城江陵成长，九岁被封为新安王。开皇七年，萧瑀随兄长萧琮入隋，之后便定居长安。后来，萧瑀以皇后之弟的缘故，被隋炀帝委以机要事务，任内史侍郎，即中书侍郎。独孤皇后还把她娘家兄弟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萧瑀，这样萧瑀与隋皇室更增加了一层关系。

### 贬居河池

萧瑀秉性耿直刚烈，对隋炀帝的骄奢无道，屡次劝谏，炀帝对此大为恼火。

大业十一年（615年）八月，炀帝巡行北部边塞，突厥始毕可汗侦得此事，便亲率几十万精锐骑兵图谋袭击炀帝。隋文帝时以皇室宗女身份嫁给突厥可汗的义成公主暗暗派快使将此消息报告炀帝，炀帝赶忙避入雁门关内坚守。突厥大军层层包围雁门关，形势十分危急。萧瑀劝谏炀帝，赦免高丽。可突厥大军撤走后，隋炀帝懊悔听取萧瑀公开宣布赦免高丽的建议，当即免去萧瑀内史侍郎之职，贬任河池（今陕西凤县东北）太守，并且要他立即赴任。

### 国舅归唐

萧瑀的妻子是独孤皇后的娘家侄女。李渊是独孤皇后的亲外甥，李渊与萧瑀之妻是姑舅表兄妹关系。当年两人同在隋朝做官时交情也很好。李世民带兵进攻薛举，萧瑀和妻子独孤氏设家宴款待。席间，李世民恭敬地说：“表姑、姑父，小侄离京时父王特备家书一封，请姑父母赴京共商朝政。”说着将信取出，交给萧瑀。萧瑀拆信一看，只见李渊说道：“……瑀弟胸怀万机，才智过人……请速来京师，



共辅社稷……”萧瑀放下书信，对李世民说道：“社稷危之，明主有出。表哥相召，怎敢违命……”

家宴一结束，萧瑀当即写信派人快马送往长安，说自己随后就到。接着收拾行囊，立即启程。河池所有兵马均交给李世民。李渊见萧瑀夫妇来到，十分高兴，立刻授萧瑀为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为民部尚书(即户部尚书)。

## 五遭罢相

玄武门之变后，李渊退位当太上皇，李世民即皇帝位，年号“贞观”。前朝宰相，只有萧瑀一人直到贞观二十年还始终在权力中心活动。但也五起五落，即五次拜相，五次被罢相，甚至削去爵位，被贬出京。

萧瑀处事严厉刻板，刚直不阿，上朝言事言词简括直率，屡次逆忤圣意。一次，当朝论事，萧瑀与陈叔达意见不合，在朝堂上愤怒地争论，太宗几次都制止不住，满朝文武乱作一团。唐太宗初登帝位，有树威震慑大臣的心理。二人如此放肆，顿时怒不可遏，推倒御案，拂袖而去，随即传出一道圣旨：“萧瑀、陈叔达身居相位，然言语失态，皆有对皇上不恭之罪，一并罢免所有官职，回家闭门思过。”这是萧瑀在唐太宗贞观年间第一次被罢相。

萧瑀本来心高气傲，为唐朝筹划多年，殊多建树，罢官回家，越想越气，悲伤不已，竟然大病不起。太宗闻知，也觉得自己有些过激，想到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社稷江山，当即传下圣旨，任命萧瑀为太子少师。萧瑀病情好转，入宫谢恩，唐太宗也好言宽慰，又把女儿许配萧瑀之子萧锐。皇帝和大臣成了儿女亲家。

贞观元年(627年)六月，尚书右仆射封伦病故，萧瑀被罢尚书左仆射之后，此位也一直空着。至此，尚书省二仆射之位皆虚，百官无首。太宗诏任萧瑀恢复尚书左仆射。这是萧瑀在贞观年间第二次出任当朝首相。

萧瑀严厉清正，不肯容人之短，不善处理人际关系。贞观元年十一月末，复出后未及五个月就再度罢相。原因是唐俭出使突厥，萧瑀请他捎封家书给避难突厥的姐姐萧皇后。唐俭走后，嫉恨萧瑀的人告发萧瑀私通书信于亡隋皇后。

查明情况后，萧瑀又第三次出任宰相。

兵部尚书李靖带兵征讨突厥杀了突厥颉利可汗的妻子、隋室的义成公主。萧后



李靖征突厥

感念她的恩情，悲痛不止。萧瑀上奏弹劾李靖。有人乘机进言，说萧瑀弹劾李靖不当。贞观四年七月，太宗任命萧瑀为太子少傅，免去御史大夫，不再参议朝政，萧瑀第三次被罢相。

贞观八年，太上皇李渊中风，于第二年五月去世。李渊的丧事办完后，李世民颁诏，起用萧瑀“特进”，参与政事。这是萧瑀第四次拜相。萧瑀第四次出任宰相一年以后，因急躁、偏狭再次被罢相，并且贬出京城，出任歧州刺史。这是第四次罢相。

贞观十七年四月，太子李承乾谋反。李世民命长孙无忌、萧瑀、李世绩等审理此案。李承乾被废为庶人，册立晋王李治为新太子。以萧瑀、李世绩为相。这是萧瑀第五次拜相。贞观二十年，萧瑀与同僚多不合，关系紧张，并且屡屡逆忤圣意，李世民极为怨愤。因念他忠诚耿直，不忍再度废黜他，希望他能自动辞职，以保全面子。最终因惹怒了李世民，李世民亲写诏书罢免了他的相位和全部封爵、封邑并且贬出京城，这是萧瑀第五次罢相。

### 凌烟功臣

萧瑀在太宗期间为宰相时，曾以历史上分封子弟贵戚为藩屏的得失，建议太宗分封子弟为王而被采纳。

萧瑀不贪财好利。他为隋臣时，田宅很多，后这些田宅被唐高祖李渊分赐给功臣。萧瑀归唐后，李渊将田宅归还给他，他却将其全部分给宗族，自己只留下宗庙一座，以作祭祀。

贞观十七年二月，唐太宗李世民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众位功臣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萧瑀位列第九。

### 病重离世

萧瑀被贬出京，他的姐姐萧皇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她已是风烛残年80多岁的老人了，竟然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74岁的萧瑀送走了最后一位同胞、从小就相依为命的姐姐萧皇后之后感到无比孤苦和寂寞。虽然这时候，皇上已恢复了他的宋国公封爵，还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又加“特进”，这是授予公侯中有特殊地位者，可萧瑀仍然十分消沉。这时李世民身体也不好，住在玉华宫，他传召萧瑀到玉华宫休养。萧瑀奉召到玉华宫。谁知萧瑀被送到玉华宫，病情突然加重。不几天便去世了，这是贞观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终年74岁。时离萧皇后去世仅三个月。

# 苏静与战争时期的华东摄影工作

康矛召



山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摄影工作起步较晚，1943年受到晋察冀地区先进的摄影工作的影响，因而加强了摄影工作的领导和建设，从此有了较大的发展。

由于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早期的摄影工作局限在少数有照相机的同志中，而缺乏软片又使这些照相机也难以发挥作用。当时在胶东和清河地区的抗日政权和部队中都有摄影爱好者，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点滴的工作。在山东军区和一一五师领导机关经常活动的鲁南、鲁中和滨海地区，有一位早在中国工农红军中从事业余摄影并做出重大贡献的摄影家——苏静同志。他于1939年随一一五师辗转进入山东。

苏静同志原名苏孝顺，青年时曾侨居缅甸，在仰光一家华侨小学执教，1930年学习摄影，1932年回国后在福建漳州参加红军，在红一军团担任参谋。他用缴获敌人的照相机拍摄过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照片。长征后到达陕北，他拍摄过红军领导人的集会，红军体育活动和东渡黄河等活动照片。抗战初期，他拍摄过平型关战斗、正太路作战、晋西午城等战斗，并在大后方的报纸上发表过医治被俘日军的照片。苏静同志因工作之便拍摄过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并善于利用摄影开展工作。1939年进入山东时，他任一一五师司令部秘书长，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而参加了由我军主持的“泰西军政会议”，并为参加该会的友军和地方政府代表准备了留作纪念的会议纪

要和与会人员的合影。苏静同志还拍摄过山东的反“扫荡”和军民合作生产劳动的照片。苏静同志以后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因领导工作日益繁重而不便多参加摄影活动了。

1943年山东军区政治部出版了《山东画报》。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在太行山区向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汇报工作时见到晋察冀军区出版的画报。受到摄影画报形象生动的图片感染，萧华认为画报是政治工作中最容易达到教育部队、激励士气、形象感人的宣传媒介。他交待随行的同志，“回山东后一定要办摄影画报”。1943年8月《山东画报》曾要求所属各部队政治机关，设置专职（或兼职）的摄影人员，提供摄影器材，进行业务培训，并经常向《山东画报》投稿。

《山东画报》原定为月刊，后因工厂经常因备战停工，难以定期出版而改为不定期。刊物的形式也从32开的画册逐渐改为16开的双页或单页，篇幅减少但刊期缩短。《山东画报》在编辑上强调宣传革命英雄主义，鼓励军民的抗日热情，坚定必胜的信心。画报突出军事宣传，既表扬在战斗中出现的英雄模范人物和集体，又反映人民拥军、参军、生产、支前的爱国热情。像射击英雄魏来国和打死刘黑七的郝荣贵的事迹图片都上了画报。我被任命为首任主编，那狄为副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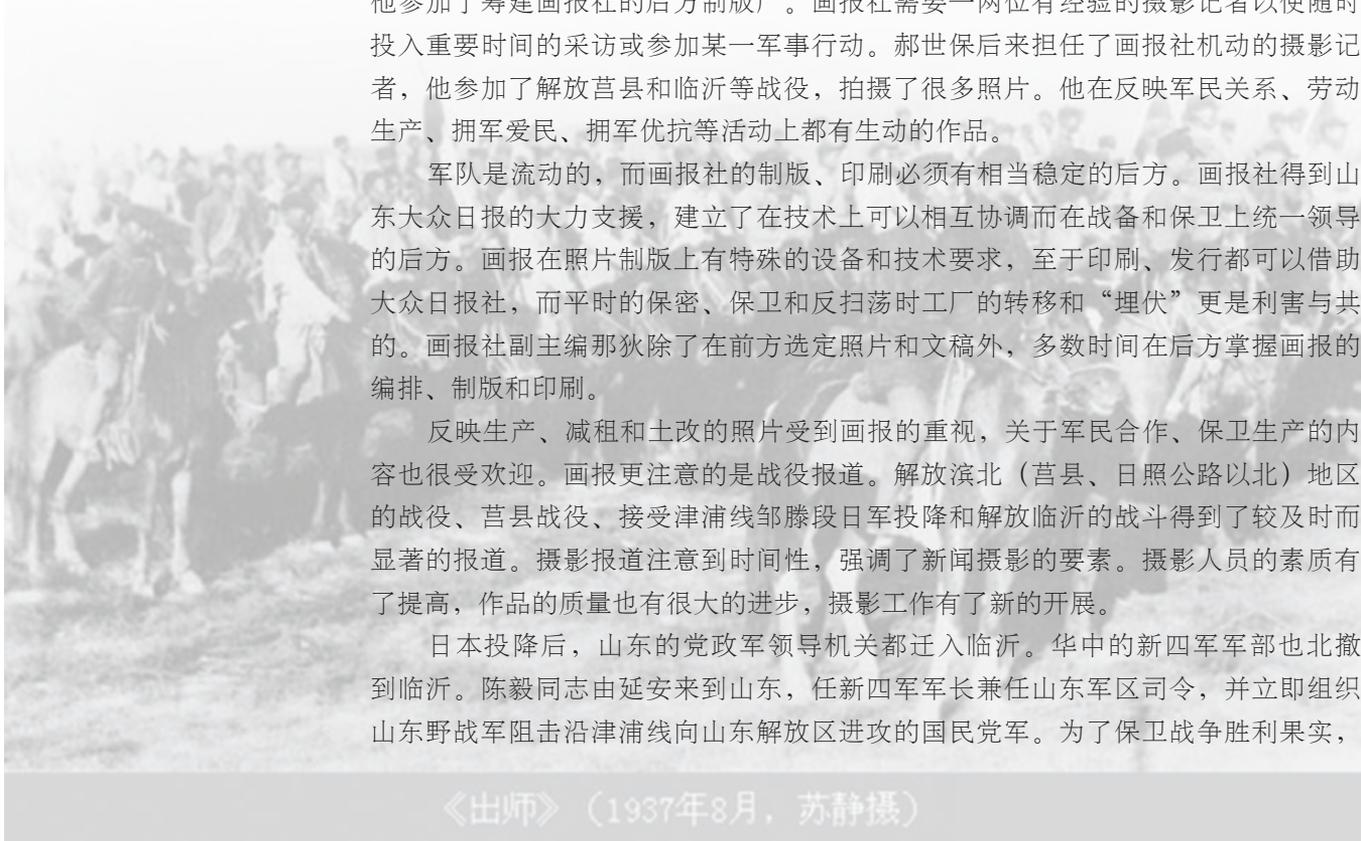
画报社的编辑多为美术工作者，他们在绘画、木刻上各有造诣，只是对摄影尚无接触或少实践。军区政治部的曹秉衡和朱异羽被特约担任摄影教员。朱异羽受过专门的航空测量训练，对摄影的知识既深且专，但他缺乏在地面上进行新闻摄影的经验。曹秉衡在这方面则略有所长。学习摄影的同志在教员的指导下都先后掌握了这门技术。如鲁岩、龙实、王建础等后来都有可观的造诣。画报社还帮助各地区培训摄影员，先后组织过三期训练班，使较多的同志得到了必要的理论知识和摄影采访的实践。

苏静同志的助手郝世保被调到画报社工作。郝世保1938年就在苏静主持的摄影训练班学习，以后又长期辅助苏静摄影，积累了较全面的摄影和暗室工作经验。他参加了筹建画报社的后方制版厂。画报社需要一两位有经验的摄影记者以便随时投入重要时间的采访或参加某一军事行动。郝世保后来担任了画报社机动的摄影记者，他参加了解放莒县和临沂等战役，拍摄了很多照片。他在反映军民关系、劳动生产、拥军爱民、拥军优抗等活动上都有生动的作品。

军队是流动的，而画报社的制版、印刷必须有相当稳定的后方。画报社得到山东大众日报的大力支援，建立了在技术上可以相互协调而在战备和保卫上统一领导的后方。画报在照片制版上有特殊的设备和技术要求，至于印刷、发行都可以借助大众日报社，而平时的保密、保卫和反扫荡时工厂的转移和“埋伏”更是利害与共的。画报社副主编那狄除了在前方选定照片和文稿外，多数时间在后方掌握画报的编排、制版和印刷。

反映生产、减租和土改的照片受到画报的重视，关于军民合作、保卫生产的内容也很受欢迎。画报更注意的是战役报道。解放滨北（莒县、日照公路以北）地区的战役、莒县战役、接受津浦线邹滕段日军投降和解放临沂的战斗得到了较及时而显著的报道。摄影报道注意到时间性，强调了新闻摄影的要素。摄影人员的素质有了提高，作品的质量也有很大的进步，摄影工作有了新的开展。

日本投降后，山东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都迁入临沂。华中的新四军军部也北撤到临沂。陈毅同志由延安来到山东，任新四军军长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并立即组织山东野战军阻击沿津浦线向山东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为了保卫战争胜利果实，



《出师》（1937年8月，苏静摄）

各解放区对国民党的进攻进行了自卫反击，并赢得了一段短暂的“停战”和“和平”。国民党的“停战”是虚假的，“和平”的面具掩饰着发动内战的阴谋。我们既利用军调部三人小组在各地的活动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停战，也趁摄影记者进入济南、平、津的机会买到了一批摄影器材。名摄影家郑景康来到山东，主持了一期摄影训练班。另一位名摄影家吴印咸也来到临沂。他们对山东的摄影工作起到鼓舞、指导和推动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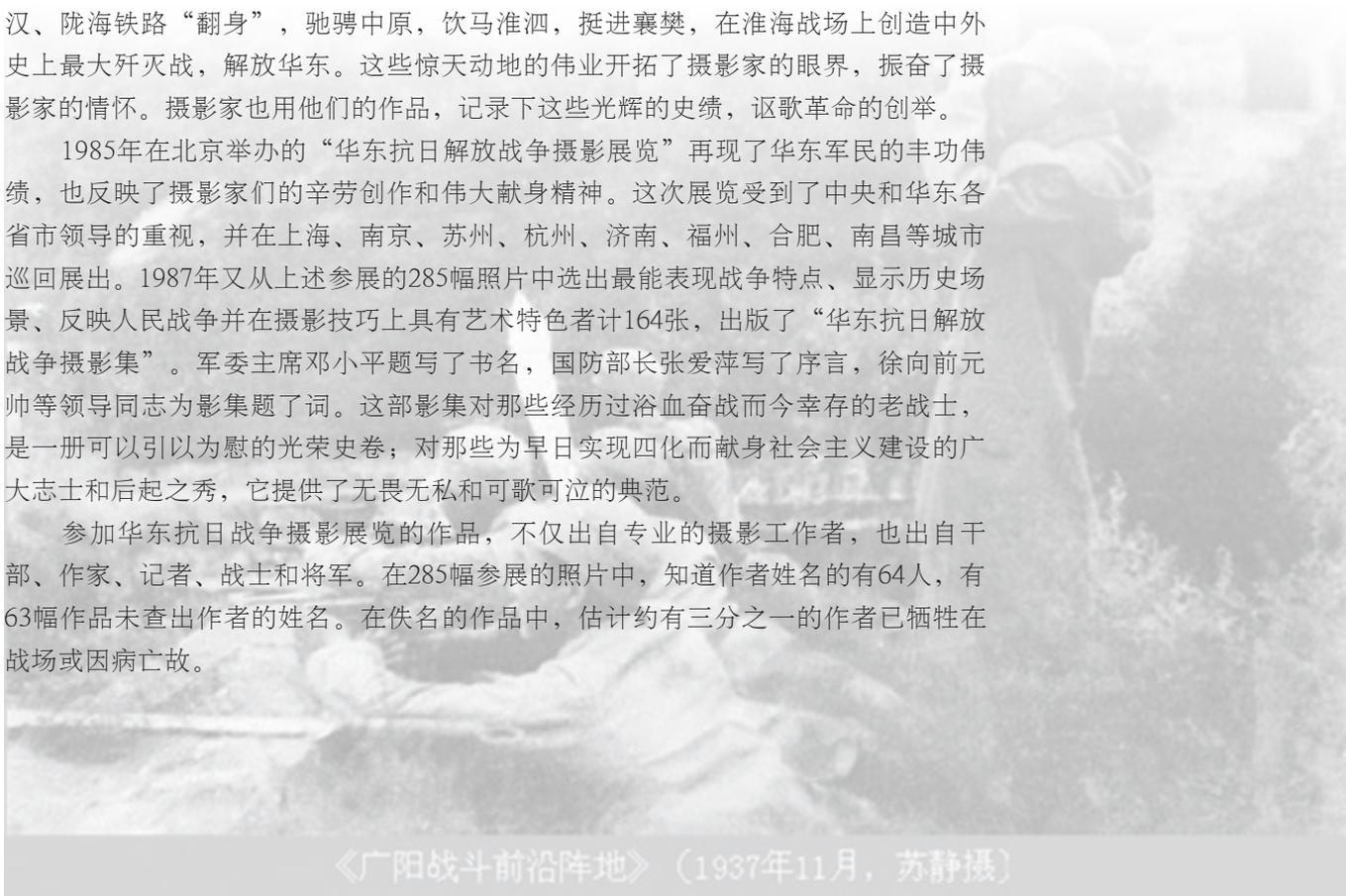
这时山东军区改为华东军区，《山东画报》也改为《华东画报》。摄影工作者又有了新的阵容，活动的范围也不限于山东了。原在新四军工作的一批摄影工作者加强了这一阵容，邹健东就是其中最具有经验的摄影家。他少年时代在一家照相馆当学徒。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新四军，曾拍摄过一些照片。以后调任华东画报作摄影记者，采访临沂地区的土改，以后在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随军转战，拍摄了历次重大战役，从山东内线作战直到把红旗插到南京总统府。邹健东和郝世保是活跃在华东解放战场上的两位得力的摄影记者，他们为华东的军事摄影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摄影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并随着战争的演变而扩展于鲁、苏、豫、皖。新华社山东前线分社于1946年7月山东和华中两大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时，也被改称华东前线分社，统一领导各纵队的新华支社和野战军采访的所有文字和摄影记者。为加强摄影工作，前线分社设置了摄影组，各支社、野战军后勤和俘管处也设有摄影人员。前线分社提倡所有记者兼学摄影，成为又能写又能摄影的多面手。

战争局势的发展为摄影家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兰陵道上，蒋军的快速纵队全军覆没，莱芜城北，突围的5万余众无路逃生；孟良崮上，十几万援兵救不了蒋家御林军的灭亡。从内线作战转入外线出击后，连取古都许昌、洛阳、开封，将平汉、陇海铁路“翻身”，驰骋中原，饮马淮泗，挺进襄樊，在淮海战场上创造中外史上最大歼灭战，解放华东。这些惊天动地的伟业开拓了摄影家的眼界，振奋了摄影家的情怀。摄影家也用他们的作品，记录下这些光辉的史绩，讴歌革命的创举。

1985年在北京举办的“华东抗日解放战争摄影展览”再现了华东军民的丰功伟绩，也反映了摄影家们的辛劳创作和伟大献身精神。这次展览受到了中央和华东各省市领导的重视，并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济南、福州、合肥、南昌等城市巡回展出。1987年又从上述参展的285幅照片中选出最能表现战争特点、显示历史场景、反映人民战争并在摄影技巧上具有艺术特色者计164张，出版了“华东抗日解放战争摄影集”。军委主席邓小平题写了书名，国防部长张爱萍写了序言，徐向前元帅等领导同志为影集题了词。这部影集对那些经历过浴血奋战而今幸存的老战士，是一册可以引以为慰的光荣史卷；对那些为早日实现四化而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志士和后起之秀，它提供了无畏无私和可歌可泣的典范。

参加华东抗日战争摄影展览的作品，不仅出自专业的摄影工作者，也出自干部、作家、记者、战士和将军。在285幅参展的照片中，知道作者姓名的有64人，有63幅作品未查出作者的姓名。在佚名的作品中，估计约有三分之一的作者已牺牲在战场或因病亡故。



《广阳战斗前沿阵地》（1937年11月，苏静摄）

#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 (五)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 师恩难忘

徐悲鸿先生是我国近现代一位受人尊敬的艺术大师，是我国杰出的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者、开拓者。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倾毕生精力和心血发展我国美术事业，培育美术人才，他的艺术成就和艺术教育的业绩永载史册。

1949年9月至1951年夏，之先有幸在中央美术学院深造，曾多次聆听徐悲鸿院长的教诲与指导。老师丰富的文化学养，高深的艺术造诣，严谨的治学态度，忘我的工作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都给之先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谓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当时，徐悲鸿是文化艺术界名人，身兼数职，除当院长以外，还任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因此社会活动很多，公务十分繁忙。但他再忙，也不放松他视为第二生命的教学育人的工作，仍坚持经常到学校去，讲课或者看望学生，批改作业。他经常穿着蓝布衫，拄着手杖，面带微笑出现在教师和学生的面前，和大家亲切交谈，一点也没有名人的架子。



与师母廖静文

之先所在的班不同于青年学生考取的普通班，它是由华北大学美术系部分学生和在职的美术干部、美院教师的子女组成的，大都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因此受到了徐悲鸿院长的特别关注，经常亲临教室指导和参与学生作业的评分。他对学生很少批评，总是以表扬为主，循循善诱，进行启发。比如一张素描，即使画得不太好，他也总是从中找到优点，鼓励学生注意观察研究对象，强调一定要练好素描基本功。当时，之先刚刚入校不久，还摸不到素描的规律。当徐悲鸿院长到教室巡视时，指出皮之先那张人像的素描嘴角部分的质感不错，富有弹性。之先听后，好像有一股暖流通过全身，深知这是徐院长对自己的鼓励。从此以后，之先注意纠正只顾局部、忽略整体的毛病，作画要从整体布局出发。这对于之先后来从事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都有深远影响。

名师才能出高徒。徐悲鸿院长为了让学生领略大师的风采，亲自坐车去请齐白石老人，为之先所在的班上上课，并陪着一起听课。齐白石老人作画示范时，之先亲眼目睹了老人大气磅礴、出神入化的用笔、用墨，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在以后搞写意的花鸟或山水时，有意无意地融入了白石老人的笔法、墨法。

由于之先谨遵师教，刻苦努力，经过二年的学习，之先成为班里的高材生，因此被文化部艺术处处长蔡若虹看中，参加了建国后新连环画的创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临毕业时，在徐悲鸿院长的授意下，在毕业生登记表上，给之先写下这样的鉴定：该生重于美术专业学习，成绩优良，而且有创作能力与编画报的经验。希望今后让其搞创作工作。这样好的评语，为之先以后就业，能担任全国三大报刊之一《中国工人》的美编，铺下了平坦而又顺利的道路。

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之后，之先虽然离开了恩师，但是师恩难忘，他决心踏着恩师的足迹，沿着他开创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1961年，当国家号召机关工作人员支援老少边穷地区时，之先本来是分配到兰州的，但是他却选择了沂蒙地区。其原因就是恩师徐悲鸿曾在1951年来过临沂，在国家重点工程改造沂沭河工地上体验过生活，画了许多素描速写，准备创作一幅新《愚公移山》，可惜因为生病没有完成。之先愿重走老师走过的路，用老师交给的笔重画美好的蒙山沂水，重塑淳朴、善良、勤劳勇敢的沂蒙人的英雄形象。从之先一生的创作实践和取得的卓著成果来看，他没有辜负老师的厚望，他实现了自己的宏愿。

1995年6月，正值徐悲鸿诞辰100周年之际，之先接到了文化部、北京市政府、徐悲鸿纪念馆联合发的邀请函，请他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徐悲鸿诞辰100周年大会和国际徐悲鸿艺术研讨会。之先决定写一篇恩师来临沂写生的文章，作为向大会的献礼，也可以填补美术史上的一段空白。为此，之先访问了水利部门的领导和参加过导沭整沂的民工们，并亲自到当年工地处踏勘。撰写了《徐悲鸿的沂蒙之行》一文（发表于《美术》1995年8月）。此文再现了徐悲鸿当年来临沂写生的真实情景：

1951年春，徐悲鸿来到山东革命老区——沂蒙山区的导沭整沂水利工程现场。当时正值春寒料峭，风沙时起，民工们住着极其简陋的工棚，吃着粗粮煎饼，用的工具也是极原始的锨镢、抬筐、小木推车等。但人们的情绪是高涨的，工地上到处是龙腾虎跃、争先恐后的动人景象。徐悲鸿被这惊天动地的壮阔场面所吸引、所感动。他坚持同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坚持在工地现场深入生活和观察。他感到精神振奋，创作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为涌现出的劳模、干部画出了不少素描头像。大家为得到他的画而感到荣幸与自豪。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徐悲鸿先生的足迹遍布了整个沂沭河水利的工地，因此积累了大量的写生素材。每画完一张头像时，在场观看的群众便欢呼起来。不少人翘起了大拇指说：“画得真棒，纸上的人活起来了，那眼珠子还在转动看着人哩！”徐悲鸿先生还应《导沭报》编辑之请，

特为其报题了词，画了不少插图，还为报纸合订本画了封面。徐先生对沂蒙老区人民产生了极其深厚的感情，他计划回京之后创作一幅新的《愚公移山》油画。遗憾的是因其患脑溢血住院抢救，没能实现画巨幅新作的宏愿。

之先纪念恩师的文章在“国际徐悲鸿艺术研讨会”上宣读，受到了徐悲鸿的夫人和弟子与会者的一致好评。所有参加研讨会的代表受到了国家和北京市领导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1990年，临沂举办“书圣杯”国际书画大赛，徐悲鸿夫人廖静文被邀请参加颁奖大会。能在书圣故里见到师母，之先备感亲热。他特地设宴接待了师母。又遵师母之嘱，沿着徐悲鸿先生来临沂的足迹走一走，看一看。为了实现师母的心愿，他陪着师母或乘车，或步行，沿沂沭河两岸走访了当年恩师曾经到过的地方。

现在的沂沭河已经面目全新了，河道中建起了许多处宏伟的水闸，过去的水患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治理。沂沭两河像两条巨龙从北向南，奔腾入海，造福于千百万人民。当年徐悲鸿先生所要表现的一代新愚公们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已经变成了现实。

之先和师母好不容易找到了两位当年见过徐先生在沂沭河工地作画的农民。他们听说了当年徐悲鸿院长的夫人来了，备感亲切，非常热情地带领二人走上河堤，指着一块地方说：“这儿就是30年前徐院长画过画的地方。在那棵大树底下，徐院长一直站着画场景。”他们还说：“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十几岁，经常跟着画家到处跑，看他画画，和他越来越熟，关系也处得很好。”两位农民朴实无华的话，纯真亲切的情意，深深地打动了廖师母和之先二人。

像对恩师一样，之先对师母也十分尊重、敬爱，每次去北京，都要带上土特产去看望师母。师母对徐悲鸿先生的弟子也如儿女一般关爱有加。

1999年，为庆祝澳门回归，“皮之先，皮威画展”在广东珠海市博物馆举行，廖师母委托公子徐庆平前去参加开幕式并剪彩，她特意发去贺电。随后，皮之先和王学仲两位弟子在海口市举办联合画展，廖师母不顾年老体衰，亲自飞到海口参加开幕式并讲话，表示大力支持。

1992年，《皮之先皮威画集》出版，廖师母欣然命笔，为画集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在出版《皮之先皮威画集》之际，作者让我写几句话。因为皮之先君是悲鸿的学生，他的孩子又是庆平的学生，有着两代师生的关系。皮之先于1949年至1951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得到了徐悲鸿、蒋兆和、罗工柳诸先生亲授，继承了他们的现实主义绘画传统……后来到山东临沂工作，他踏遍了蒙山沂水创作了大量作品。七十年代末他踏遍了祖国名山大川，搜尽奇峰，速写盈筐。在他的画笔之下，黄山的云海，泰山的古松，崂山之神妙，九华山之佛气，以及峨眉之秀，三峡之险，阳朔之美，无不形神各异，雄奇壮丽。他的画繁中有简，清新典雅。观其画，在有限的尺幅里，似乎有大气流动在无限的空间之中，将山岳之灵气漫游于纸上，赋予山水以生气与灵光。皮威于1988年入‘徐悲鸿画室’进修，得冯法祀、戴泽、徐庆平诸先生指导，进步很快。他的油画作品参加在加拿大、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展览，受到了好评。他也喜爱国画，在传统和西画的基础上加入了现代意识，墨色浓重，浑厚润滋，是有前途的青年画家。祝愿他们父子继续向艺术的高峰攀登，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贡献给广大观众。”

# 羽山殛鲧觅遗闻

吴成芳

羽山，是传说中远古鲧殛之处。它坐落在苏鲁交界处（临沭与东海），海拔269米，面积4.5平方公里。历经数千年的沧桑岁月，给它蒙上了一层厚重而又浑浊的阴影。而那段神奇遗闻，令无数人们前来寻觅那久远逝去的遗存。

## 殛鲧史话

千古闻名的羽山，幽静、清秀，纯朴、自然，山前山后水库环绕，沟渠、堤坝，林木葱茏，景色秀美。这里发生的一切早已成为一代一代人的传说和记忆。

当你来到羽山，看到的是“无泰岱之雄，黄山之奇”，貌不惊人，可它却是一处悠远、深邃的历史人文景观。

翻开史书，鲧是远古时五位圣君中最后的颛顼之子。鲧封于崇地，称为崇伯鲧。中国上古史籍《连山易》记载：“有崇伯鲧，伏于羽山之野者是也。”这是《周易》里记述的。《周易》是西周著名政治家周公旦（公元前1087—公元前1043）著的，它称《连山易》为上古时古易，相传由伏羲氏、神农氏所创，成书于夏朝。这是中国史书最早记载的鲧殛羽山的史实。

《史记》载：“舜代行天子之命，行视鲧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远古时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是原始社会初期首领对那些办事不力者的一次依规，公正惩戒的一种尝试，是对远古帝王权威的一次考验和树立。从这一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原始社会初期法制、法规渐趋萌芽的一种显现，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和遗产。

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尚书·禹贡》：“淮沂其乂，蒙羽其艺。”把“淮、沂、蒙、羽”列入“海岱淮惟徐州”域，明确指出了羽山更为准确的地理位置。疏曰：“羽山在东海郡祝其县南”祝其即今天的临沭县，秦置祝其县，属东海郡。

## 羽山忆昔

《山海经》《尚书·禹贡》等史书中都曾提到“殛鲧于羽山”，可见古

山之悠久。悠悠几千载，昔之羽山是一个满载人文历史的古老地方。

今天人们来到这里，是想探寻那段悠远而又在人们心目中若隐若现，久已逝去的往事。昔之羽山，远古时在海中，是一座荒凉、偏僻、渺无人迹的东海一小岛。远古帝王对治水不力的“鲧”将其流放到海中的岛山殛死。历史上先贤名士见证了这里的沧桑变迁。与远古时相去甚远的《禹贡》记载：“古徐州之界，其东境皆濒海也。”春秋战国时孔子周游列国，拜师郟子。曾到羽山西去数十公里外的郟城境内，马陵山的大尚庄东南2.5公里的山颠上登山望海，古称为望海楼。唐朝的盛唐诗人崔国辅在《石头滩作》诗中：“羽山数点青，海岸杂光碎……日暮千里帆……楚色有微霭。”它描写的羽山的此情此景，可见昔日人们在航海中远眺古山峰峦，一片朦朦胧胧，雾气腾腾，青山像淹没在茫茫大海中一样，显得更加神秘，让人“不识庐山真面目”。

沧海桑田，大海逐步东移，古海州与苍梧山（今云台山）中间隔20多里海峡。当年苏东坡第二次来到海州时，在和陶（陶渊明）诗中：“我昔登朐山，出日观沧凉。欲济东海县，恨无石桥梁。”直到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海退沙淤，渐成陆地。清嘉庆年间兵部尚书、漕运总督、名臣阮元，曾写诗：“决河曾向郁州奔，碧海洪波共吐吞。东去淮沂频夺路，西来蒙（蒙山）羽（羽山）尚连根。”

悠悠岁月见证了昔日羽山的变迁，见证了这里的历史、人文，是一道抹不掉的风光。来到羽山下，睹物怀古，宁静的山峦里，一处处殛鲧遗迹，好像在向人们娓娓诉说那久远的传说。



鲧被杀害于羽山的雕塑

## 鲧迹遗闻

整座羽山，葱郁的山峦，深邃的山谷，秀丽丰饶，静谧迷人，像一颗镶嵌在这片大地上的明珠，以其传奇的魅力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当你走近羽山，山南一座碧波荡漾的水库，吸引着游客的注意，水库中一处深潭就是传说中的羽渊。《嘉庆海州志》录《尚书》：“鲧既死，其神化为黄龙入于羽渊。”《隆庆海州志》：“羽渊在羽山下。”这是一个千古遗存。人们从山南东坡攀登。到达山顶处，放眼四顾，奇石林立，形态各异，错落重叠，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其中一块高约10米的巨石斜立陡崖上，中间有三道齐崭崭的石缝，从上延伸到根底，名叫：“三缝石”，又称为“试剑石”。《山海经》记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传说当年火神祝融，直奔羽山而来，这“三缝石”是当年试试祭刀而留下的痕迹。

在“三缝石”旁边不远处有一平坦的大石，人称“晒汗石”。据传祝融来到羽山，累得大汗淋漓，坐在大石上歇歇，晒晒汗。“晒汗石”由此而来。当你歇息在这块石头上，顿觉凉风习习，惬意舒服。今日山峦上下一片宁静，树叶在微风中摇曳，时光穿越时空默默地诉说着逝去的往事的那个场面。让你感觉到这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存，仿佛记载着远古帝王的惩罚、殛鲧的森严、恐怖的局面。

山顶处一名曰“殛鲧泉”，过去长年不涸。到了1958年，久旱无雨的季节，当地一名分管生产的干部想扩大水源，在泉眼上点炸药炸，泉眼被炸的面目全非。事与愿违，泉水从此枯竭。人们猜想，这是对无知的人们破坏生态自然的一种惩罚。

今天人们发现，传说的一些遗闻遗迹尚存。山腰间有一处平缓的台地，碎石累积，遍地碎砖瓦砾，俯拾皆是，是禹王庙遗址。《左传》载：“鲧殛而禹兴。”远古帝王并不因为鲧治水不力有罪而殛，不用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辛勤治水，让百姓安居乐业，受到百姓拥戴。当年的羽山禹王庙常年香火不断，可见为百姓做好事的定会令后人敬佩，历历而萦怀心上。

## 记中的老建筑

## 城门

本 编



东城门瓮城门

临沂城始建于春秋末期，已有2500年历史。明代以前，临沂城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土城，直到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沂州指挥周德首次主持破土城筑砖城。130年后明弘治11年，指挥张贵、李章、袁刚相继修葺。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沂州知州谢志尹又调集民工，按丈尺令乡社修筑城池，四门添建城楼，城楼上面塑有神像，四门各有一个应景响亮的名字题于门额：南门望淮门，眺望淮河之意；北为宗岱门，敬泰山；东临大海，名为镇海门；西望蒙山，名为瞻蒙门。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6月大地震，城墙多处损坏，西北南三座城楼俱毁，仅剩东门。

清康熙九年，按旧制重为修筑城池。时城墙周长4.5公里，民间传有“三里三的郯城县，九里九的沂州城”的俗语。城墙高8米，宽3米，垛口3782个，城堡50座。城外壕沟深3米，宽3米，马道宽2米，有炮台4座，城楼4座，四个城门又各建有数重门，除南门楼为大楼三层，小楼两座，城门三重，门楼最高最好处，其余东西北三门均系二层大楼一座，又小楼一座，城门二重。南门为正门，门外建有接官亭，大官进城或重要活动皆走南门。以上四门现在临沂城的位置是：西门在西关煤球厂，南门在临沂展览馆，东门在原东关蜂窝煤厂，北门在原惟一斋附近。从高处望去，整个城池仿佛一只大龟浮在水面上，又像一只凤凰飞翔在云端。所以，人们

称它为“龟驼凤凰”。老人们传说南门是龟脖，东西为龟爪，北门为龟尾。

民国年间，临沂城南大街是繁华之衢，商店户多集中于此，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拥挤不堪。因商户为遮蔽商品免受日光暴晒和装潢门面招揽顾客，都修有一条厦子，使本来不宽的街道更加狭窄。且当时的望淮门修建奇特，在第一重门和第三重门之间，还夹一横凸字形的二重门，出进重门，迂回辗转更为不便。范筑先在1933年10月到1936年6月任临沂县县长期间，决定将南门第二重门合南大街两旁商号所建厦子一律拆除，只留第一重门和第三重门。

1938年4月，日军占领临沂城后，加修城防工事，城墙加高到15米，宽12米，上面能跑汽车，还架设了铁丝网、修筑了暗堡等。1945年8月17日，八路军攻占临沂城，守敌据城死守，八路军实行坑道作业爆破，历经26天浴血奋战，终于攻克了临沂城。这次攻城，严重破坏了城墙城门。

1945年9月11日，临沂第一次解放，对城墙进行拆除，北门已不存在，尚有东西南三门。1948年10月10日，临沂城再度解放后，城门楼、碉堡全部拆除，仅存有部分城墙遗址。四门匾额“望淮门”“镇海门”现存于临沂市博物馆。“宗岱门”“瞻蒙门”据说在建东方红电影院附近的护城河桥时，已经垒在桥底，不知下落。

# “一等民兵英雄”张秀海

高雷

东河村与张秀海的名字，是从我父亲讲的故事里最先听到的。当时年幼无知没往心里去，老人去世40多年了，现今才发现抗战时期的东河村的确不寻常，一个村就出了3个闻名山东影响全国的抗日英雄，张秀海便是其中一位。抗战时期，我父亲在沂南县土山区任中共区委宣传委员，公开身份是东河村小学教员。张秀海的家就在那个村子，父亲与他非常熟悉。

张秀海世代给人种地，鬼子侵入沂蒙山区时，他父亲已经去世，母亲70多岁了，弟兄三人，他是老三，1918年出生。个儿不高，黄脸膛，浓眉毛，两只不大的眼睛挺精神，从小家境窘迫，经常遭受白眼，养成了一种反抗的性格，幼年习过武，有一定的功底。

1939年冬，八路军山东纵队八支队工作团入驻东河村，张秀海领会到了抗日救亡的真谛。1940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认为：不消灭鬼子，不但自己的性命不保，就是全村的老少爷们早晚也得叫鬼子搓揉死。所以他逢人便讲：“哎！你说怎么样？我们能这样老老实实地叫鬼子搞死吗？我们拉武装吧！组织起来和这些狗崽子拼一下。跑！还能不要家吗？跑到外地逃荒绝不是办法。”1940年冬，在土山区武装部的支持下，东河村成立了民兵游击小组，开始只有一支长枪4颗手榴弹，在张秀海的组织发动下游击小组迅速发展到12人，张秀海又跑到区里领来了9条枪，恣（方言：高兴）透了。人也有了，枪也有了，还怕什么！从此就活动开了，白天在山上，夜里到河崖头，无论风里雨里，只要敌人一过河，张秀海就领着民兵跟他们干，差不多日日夜夜都要和敌人周旋。再后来，成立民兵队，他被任命为民兵队长。1941年，鬼子大扫荡，鬼子在沂河东岸南北相隔不到一里的刘家店子、河阳两个村子安了据点，刘家店子住着鬼子，河阳住着汉奸队。日伪军经常越过沂河到根据地烧杀抢掠，有时深入河西七八里地遛遛跹跹，十分狂妄。张秀海偏不信邪，针锋相对，所以河阳安上据点后，汉奸头子徐树云扬言要抓他，日军曾悬赏300万元伪钞买他的人头。为守卫沂河这条防线，张秀海带领全村30多名民兵和附近村庄的民兵组成了联防队坚持不懈。至1944年2月，刘家店子、河阳的鬼子据点被挤走，和大大小小的鬼子汉奸作战300余次，毙伤俘日伪100多人，守住了沂蒙根据地的“南大门”，受到了山东军区、鲁中军区武委会的表彰。

1941年的一天，张秀海在自家菜园子割菜，河东涉水过来一个汉奸，踉踉跄跄，步履蹒跚，看样子是喝多了酒。见到张秀海便颐指气使，话语中充满着挑衅，他万万没有料到对方是一个抗日战士，结果被张秀海照头一刀砍死。张秀海将其拖到沟底埋了，缴获步枪一支。两天以后，又有一个汉奸前来侦探情况，同样被张秀海给做掉了。从此河东的汉奸知道东河村有“情况”，再也不敢放单到河西骚扰民众了。

1942年收麦的时节，日头刚冒红，民兵游动哨就发现了有30多个汉奸押了40多辆车子过河进了白石埠临时据点。张秀海得到了这个消息，通知民兵队：坚决打！不能让他们在河西为所欲为，抢走一粒粮食。民兵不是正规军，通知传下去，人却没集合齐，半路上又有人掉队，统共来了9个人。张秀海就带着这9个人直奔白石埠。汉奸正忙着抢麦子、装车，万万没有料到会有土八路前来奔袭，枪一响，一个冲锋，汉奸不是被打懵了，而是被吓懵了，乱作一团，和据点的几个鬼子一阵风逃出村子，场院里扔下了不少麦袋与车子。张秀海这时向同伴喊着：“伙计们，先不要管这些，快把那四头牛截下。”9支枪一齐对准了那些牵牛的汉奸追着打，牵牛的汉奸要命不要牛了，扔下缰绳，一口气跑过了河。

这次奔袭缴获了12袋麦子、8辆车子、4头牛。牛、麦送还给了原主，车子换了子弹。第二天，张秀海正和同伴们在林子里枕着枪睡觉，岗哨报告又发现大队汉奸带着车子过河来了，张秀海随即率领同伴们运动到白石埠村北岭坡下，观察动静。这时一位老乡慌里慌张跑过来告诉：住在白石埠村里的区中队还没走。张秀海抓紧派人前去联系，这边人刚走了没几步，岭头上就出现了汉奸，边打枪边扑了过来，沉不住气的民兵爬起来就跑，张秀海连开五枪，没有镇住汉奸，他的身边只剩下了两个人：张秀武和张秀太。四个汉奸直扑张秀海、张秀太，五个汉奸奔向张秀武。



1944年8月，在山东军区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大会上，受表彰的民兵英雄。

张秀海不顾个人安危，欠起身来，对准张秀武哪个方向，据枪射击，三发三中，五个敌人不是被打倒了，就是卧倒了，张秀武窜了出去。这边四个敌人已经快到跟前了，张秀海与张秀太撒腿就跑，前后距离也就是二三十多步，听着追击的步履声越来越近，张秀海一个骤停转身，与跑在最前面的汉奸几乎面对面，他开枪了，敌人像口袋一样重重地摔在地上，哎吆哎吆直叫娘，另外三个汉奸返身撒开了丫子。张秀海他们平安地回到了村子。

## 二

7月，因为雨水多，沂河涨水，水深浪大，日伪军很少过河了。张秀海想，这样闲着也不是个事，应该弄点动静，让鬼子们不得安生，于是他想出个点子向大家提出：“过河去，割刘家店子到河阳的电话线，省的河阳的汉奸队一有事就打电话告诉他们的东洋祖宗。”这天夜里，他带领6个伙伴凫水渡过沂河，在河崖头，他让同伴们躲在树丛中，自己一个人顺着林地摸到了刘家店子村跟。天上挂着月亮，据点里看得清清楚楚，围门关得紧紧的，鬼子却没有放岗，张秀海“扑刺”一声笑了，心里想：“鬼崽子，叫你们睡大觉，老子可要割你们的电线了。”他回到河边，向大家作了布置，两人警戒，五个人爬杆子割电线，一直割到刘家店子的鹿砦边，才停了手。回村过河的时候，由于张秀海带的电线特别多，还要用一只手举着枪，一不小心，张秀海的鞋子被冲走了。那时候穷人是一双鞋子穿一年，张秀海有点心痛。然而他高兴的是收获了76斤电线，24个小白瓷壶。

9月割了豆子，天气凉了，鬼子开始准备向根据地大扫荡，硬逼着河东的老百姓在沂河上给他们架桥，一座是刘家店子通西流庄村前，一座是从河阳通东河村后，要求一天完工。张秀海急了，向区里提建议：不能让鬼子的桥存在。区里批准了张秀海的建议，分派东河民兵负责毁掉河阳桥，并派了一名干部来帮助。桥是秫秸捆担起来的，张秀海与区里商议，火烧最痛快。连区里的同志7个人，3个人瞭望，4个人点火，张秀海点最东边的桥段，他从南面过河迂回到桥东头，划着了火柴，火越烧越凶，鬼子的机枪开始报丧了。

第二天天放亮，河东的百十个鬼子领着七八十个汉奸趟河报复来了。张秀海和民兵趴在河崖头，冲着鬼子打了三个排枪，鬼子躺倒了两三个，只能改道往西北，进了莪庄。张秀海留下两个岗，知道鬼子还要到东河，紧急通知乡亲们转移。一会，日伪军果然来了，先用机枪火炮轰击了一阵，然后突入村里放起了几把火来，到当天傍晚，日伪军才撤走。看着那坍塌的废墟，张秀海悲愤交加，发誓不会让鬼子建成一个桥洞。

第三天，鬼子又把桥架好了，这次是用树枝捆担成的。张秀海晚上又带领民兵把树枝掀到了河里，树枝浮力大，很快就被河水冲走了。连续搞了五次，把鬼子气青了眼。一天，百多鬼子、几十个汉奸押着六七百民伕，推着材料到桥西头来修炮楼，一天就修起一尺多高，夜里鬼子回据点，张秀海召集了附近几个村庄的民兵，将桥和炮楼地基一齐扒掉。天一亮，鬼子又来了，看着扒得一塌糊涂的地基，直接把队伍开进了东河村，抓了几个没有跑掉的老人和妇女，把他们打了一顿，气极败坏地说：“桥都是你们庄的张秀海拆掉的，回来你们告诉他，他要再拆，叫你们庄里寸草不留。”

村里的人知道了这件事，看见张秀海都说：“秀海，桥拆不得了。”张秀海不听这一套，回答说：“拆也是这样，不拆也是这样，反正是一样的罪过，看看谁能撑过了谁。”晚上，鬼子汉奸撤走，桥与炮楼地基又垮塌了，这回鬼子疯狂了，

把东河村点上了火，东河村上空浓烟蔽日，火焰翻滚，张秀海远远看着一片火海的东河村，自言自语地说：“你全给烧了，你老子张秀海也不能和你含糊。”鬼子撤走后，张秀海进村一看房屋烧了20多间，柴禾垛全烧了，连锅碗瓢盆、杈把扫帚、尿罐、咸菜缸都砸光了。村里人见了张秀海，劝他：“秀海，算了吧！你看怎么办？”背后里有人商量着要把他绑起来送鬼子。他老婆也哭爹喊娘地抱着孩子来找他：“你这样天天在外边不要家了，把孩子给你，你自己养活他吧。”这时有同伴动摇了，只剩下张秀存、李春喜跟着他。区里此时给予了张秀海坚决的支持，增强了他的信念，他坚信老百姓自己的力量，相信共产党八路军，总有一天会把鬼子赶走的。他一如既往，带着同伴，又把鬼子的便桥掀掉了20余次，11月河水开始结冰的时候，鬼子就此借坡下驴，再也不修桥了。张秀海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 三

天气转冷了，民兵的家产都被烧掉了，同伴问张秀海：“队长，天冷了，没袄怎么办？”

张秀海挠挠头：“有办法了，晚上咱们到刘家店子据点去‘借’木头。”夜晚，张秀海带着两个同伴，顶着冷风，踏着薄冰，过了河，摸到刘家店子村跟。场院里放着一大垛鬼子修碉堡的木头，张秀海指挥着同伴，每人一根，一直扛了一宿，第二天，张秀海征得区里的同意，将木头卖掉，于是大家都穿上了三表新的棉袄棉裤，都恣毁了。

在此说明，文章里经常出现的区里同志，是指区委书记李顺祥、武装部长李文欣、宣传委员高子范。初创时期区委只有这三人，辖有一个区中队。

在这期间，张秀海又联合邻村民兵成立了联防队，鬼子大扫荡，联防队与区中队被包围了，区里同志主张向西北突围，那里是根据地，有主力，而且那个方向没有枪声，寂静得很。张秀海主张过河，奔敌人据点方向。理由是：鬼子扫荡，据点里有人也不多，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趁机还可以捞他一把。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只好兵分两路。结果区中队落入伏击圈，好在本地人多，熟悉地形，大部跑了出来，可队伍垮了。张秀海的联防队，不但没有伤亡，还把刘家店子的炮楼给点着了。可见张秀海的见识高人一等。

1943年春，鲁中军区决定调沂临边联县民兵配合主力部队讨伐伪和平救国军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张秀海率民兵参战。在战斗中，张秀海部民兵作战积极勇敢，成为参战民兵的典范，战后受到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表彰。

### 四

1944年2月，河阳区汉奸乡长刘恩风，半夜突然提着一支三八大盖紧敲张秀海的门，说：鬼子明天要撤走，他是瞅空偷了一支枪来报信的。刘恩风是与张秀海联系的我方情报人员。

张秀海心里想：鬼子要走，也好，但是不能不给他送送行。天胧明，张秀海跑到区里报告了情况。区里同志告诉他土山住着一个主力连，张秀海跑到土山，主力部队教导员听取了张秀海的汇报，带领一个班，和张秀海的民兵队一起，取捷径奔向大庄，埋伏在河西。一会儿，刘家店子北门大开，鬼子出动了，接着是汉奸队、民伕、车子、挑子，驴驮马垛北行。张秀海一看就眼红，直喊打，教导员阻止他说：“敌人太多了，打不得。”

张秀海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鬼子汉奸带着掠夺的财物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头一拨走出去不到七八里，北门里又出来30多个汉奸，护卫着40多辆满载的小车，教导员对张秀海点了点头说：“这股可以打。”

张秀海带着11个民兵冲过了河，距离敌人200多米时，他指挥民兵放了一阵排枪。敌人混乱了，车子民伏像没头的苍蝇乱窜，张秀海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捉活的！”敌人卧倒后开始还击，张秀海回头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虽然不是单枪匹马，但冲进敌阵的只有5个人。恰巧这时主力部队的枪响了，特别是打了两小炮，把汉奸的斗志炸了个粉碎。汉奸知道碰上硬茬子，一哄而散。张秀海趁这个机会，追上了两个舍不得扔掉车子的汉奸，他说：“缴枪，不打死你！”两个家伙犹犹豫豫，张秀海“乒”地一枪打过去，撂倒了一个，另一个扔了枪，撒腿就跑。看着跑没影了的汉奸，张秀海指挥着民伏掉头，把小车向回推。这一仗，缴获了27辆小车，两个挑子，上面满载着衣服、银圆、麦子、大米和白面。

1944年8月，山东军区在莒南坪上镇召开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大会，会上张秀海被评为“一等民兵英雄”。同年冬，鲁中军区在南栗沟召开英雄大会，张秀海被授予“民兵英雄”。

## 五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张秀海担任了土山区武装部长兼沂河联防队长。

1946年内战爆发。12月，国民党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从峄县北犯临沂。张秀海时任沂南县子弟兵团第一连连长，随该团调至鲁南前线。12月3日，张秀海率部攻克台儿庄以北的石佛寺国民党军据点，迫其整编第二十六师五〇八团退后4公里，并逼退陶沟桥、上庄、小李庄等国民党军据点，恢复了百余村的民主政权及群众组织。12月12日，国民党军大举东犯，张秀海连随沂南县子弟兵团配合主力于正面、侧面阻击国民党军，并会同“高金大队”，扼守苍山卞庄大桥，阻挡国民党军止步于卞庄一线。23日后，他们又分头插入国民党军后方，开展游击爆炸和破袭国民党军交通，张秀海率一连一夜之间炸毁桥梁30多座，切断了国民党军退路。1947年元月1日，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机关、鲁南民众在临沂九曲店召开祝捷大会，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等亲自签署嘉奖令：“由于该团某连连长张秀海一贯表现积极勇敢，历次带头完成任务，使该连成为团的突击连，给在该团所担负的各种任务中起着重要保证作用的张秀海同志，记特等功一次，并奖给‘飞机奖章’一枚。”

在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中，张秀海带领他的连队一直配合华东野战军九纵作战，运弹药，抢救伤员，连续两次立一等功。同年夏，国民党军队占领县境沂河以东地区，在河阳建立了据点，他率民兵联防队在河西沿河布防，并经常越河袭击国民党军，不到半年的时间就作战50余次，毙伤国民党军官兵299名，俘其8名及“还乡团”90名，缴获大批物资及解救群众200余人。

1948年1月18日，沂南县独立营围攻葛沟村国民党军据点，他带领110名民兵，在葛沟北小官庄（今庙前官庄）一带阻击其增援部队。战斗中他击毙2名国民党军官兵，后在夺取国民党军的枪支时中弹，不幸牺牲。详情是，敌人诈降，扔出了一支冲锋枪，张秀海抢身捡枪时，机枪响了，这位抗日英雄没有倒在民族御侮的战场上，而是倒在了自卫战争的前沿。时年30岁。

# 山东战工会委任状

红色文献

日前在一朋友处见到两种山东党史早期重要革命文物，即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任状。两份委任状分别为1942年（民国三十三年）和1943年（民国三十四年）（见图）。当委任状中“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这几个字跳入眼帘时令笔者吃惊不小，因为非常罕见。

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产生时间，正是山东抗日军民抵御日寇最艰苦的时期。1940年7月，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联合大会在沂南青驼寺召开。大会选举成立山东省抗日民主政权——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唯一统辖全省的省级民主政权。1945年日寇投降后，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正式改为山东省人民政府。

委任状的签署者黎玉，时任山东战时推行委员会主任，后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 东汉刻石“吕义置葬地”记

叶克勤



“永建七年吕义置葬地”刻石，近年出土于山东临沂。竖排阴刻隶书两行，凡28字。文曰：“永建七年四月廿四日吕义置葬地（首行），信使长乐富贵、子孙千人、訾财百亿。”

此刻石虽表面斑驳，然字迹皆可辨，书风朴实古茂，与汉安三年宋伯望买田刻石等相类。

考其铭文，“永建”系东汉顺帝刘保第一个年号（公元126—132年），历时七年。永建七年（公元132年）三月改元阳嘉，此刻石所纪“永建七年四月”，实误。“訾”通“资”，意谓钱财。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履部》：“訾，暇借为资。”《史记·酷吏列传·杜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

《资治通鉴·汉成帝绥和二年》：“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钜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噫”，通常作动词“噫”、叹词（平声）或连词（通“抑”），此处按文意或当作“亿”解。

# 抗战歌曲选——

## 《天快明了》

本 编



胶东前锋剧团抗日战争时期前锋剧团部分同志合影前排左一为袁先，后排右一为郝光

袁先（1921—1984），原名袁兴先，笔名海潮、白枫，生于山东黄县（今龙口市）城关镇豆市村。1938年9月入胶东公学；1939年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国防剧团，从事表演和音乐工作，担任过歌队指挥、音乐教员、副队长。解放战争中历任山东军区警五旅、西海军分区宣传队长。胶东军区前线指挥部国防剧团二队队长。第三十二军文工团副团长。1951年春天以后，历任华东军区文艺科副科长、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文化科副科长、总高级步兵学校俱乐部主任。1959年调八一电影制片场任导演、故事片室副主任。导演了《劫垆沙》《碧空雄师》《岸边激浪》《风雨下钟山》等影片。

袁先在音乐方面主要作品有：《牙山颂》（1941）、《大练兵》（1941）、《仰望顶战斗》（1942）、《天快明了》（1943）、《民兵进行曲》（1943）、《打得好》（1943）、《爱兵模范于乐亭》（1944）、《悼“4·8”烈士》（1946）。

# 天快明了

马少波 词  
海潮 曲

1=D  $\frac{2}{4}$

行军速度 坚毅、希望

3·4 5 | 5 - | 6·7 i | i - | 3̣ 2̣ ị 7 6 | 2̣· ị | 7 6 | 5 - | 5 - |  
鸡在啼叫，天快明了，蛙在喧闹雨快晴了。

5 5 6 5 3 | 1 2 3 | 3 4 5 | 6 5 3 2 3 | 1 - | 1 - | 5· 1 | 3 2 1 |  
前面隐约地狗在咬，人在嘈，灯光在闪烁。快到达目的

3 4 | 5 - | i· 7 | 6 5 | 6· 5 | 4 3 | 5 5 5 | 6 6 5 |  
地了，天快明了，雨快晴了，目的地快到达

i - | i 0 | 3 3 0 | 6 6 0 | 5· 5 5 | 1· 1 1 | 1· 2 3 | 1· 7 6 |  
了。但是，看吧！风更急，雨更大，天更黑，路更滑，

6· 0 | 3· 2 | 1 - | 1 0 | 0 0 | 5· 5 | 3 3 3 | 6· 5 5 |  
人更困乏。哎！前面不远了，为什么

4 3 2 | 3· 4 | 5 5 5 | i· 7 7 | 6 2 i | 5 5· 3 3· | 6 6· | i· i |  
要睡下，眼看就来到，为什么不走了，走啊！走啊！走啊！我们

5 5 5 | 6 6 6 | 5 3 2 1 2 | 3 2 3 | 4 4· | 5 5· | 6· 6 | 3 3 3 |  
千万人一条心，脚步踏稳紧紧跟。看吧！看吧！我们昂着头，

5 5 5 | 5· 3 2 | 1 3 | 2 2 | 2· 0 | 4 4· | 5 5· | 6· 6 6 6 |  
瞪着眼，咬紧牙关握紧拳！看吧！看吧！我们冲破

5 5 | i· i i i | 5 5 | 5· 3 2 | 1 2 3 | 6 6 6 6 6 | 5· 3 | 2 - |  
黑暗，我们冒着风暴，走啊！走啊！我们的希望在燃烧。

快 ..... 渐慢  
2 - | i· i i i | 5· 4 5 5 | 6· 7 | i 3 3 | 2 - | i - | i - ||  
天快明了，雨快晴了目的地快到达了。

(作于1943年春一次雨夜行军中，发表于《大众歌曲集》第3集。)

# 立规守矩 提升素质 全面开创史志工作的新局面

刘志强

当前，我市史志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史志办的指导下，工作开展顺利，取得了较好成绩。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史志工作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特别是第二轮编修志书的工作形势严峻，要争先进位、摆脱被动，可以说任务繁重、压力巨大。我们作为全市史志工作队伍的领头雁，必须树立信心，下定决心，凝心聚力，发挥好带头作用，全力开创史志工作的新局面。俗话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做好史志工作，我们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作用至关重要，下面就如何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升干部素质，以上率下，讲几点意见：

## 一、坚定政治立场，始终保持史志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

史志工作队伍，是修志著史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是编修志书的基本要求，这就决定了这支队伍必须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习总书记指出：“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可以说讲政治是我们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坚守的从政内核和执政底线。作为从事史志工作的领导干部，讲政治尤其紧迫而重要，如果没有牢固的理想信念，坚定的政治立场，鲜明的政治观点，敏锐的政治眼光，洞察秋毫的政治鉴别力，想公道正派地把历史书写好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们作为史书的编写者，要比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更讲政治，更讲党性。必须以更强的思想自觉、更严的政治要求、更好的表率行动讲政治，切实把讲政治常态化、具体化。做到对党忠诚，忠于实践，忠于史实，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为指导，特别是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把临沂史志编修工作做好。

要坚决防止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倾向对史志编修的影响，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更不能搞假设、否定，编修史志要实事求是，这既是党和人民

交给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必须应尽的义务和坚守的岗位。要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始终保持史志工作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扎扎实实的做好史志编修工作。

## 二、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促进领导班子有序良性运行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是规范领导干部领导方式、领导行为的重要遵循。从领导班子运行来说，有两个重要原则必须认真遵守，一是“四个服从”的原则，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二是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很多干部走向领导岗位之后，对怎么做好领导工作，无从下手，其实就是没有很好地学习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如果认真学了，所有关于组织领导方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于班长来说，就是要多讲民主，多征求班子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对班子成员来说就是要多讲集中，服从班长的决策，然后根据决策分工，认真做好工作。决策一旦决定，班子成员就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并执行，有意见可以保留，但在执行上不能走样。如果决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大的问题需要纠正时，也要通过下一次党组会议集体研究，形成共识，作出新的决策，予以纠正。

作为班子成员绝不能会上不说，会后乱说，满意的执行，不满意的不执行。作为班长，决策的过程实际是一个取舍的过程，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要求，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根据事业发展方向，结合具体实际进行取舍。必须理解，任何决策都是有利有弊的，这种决策的取舍就是要争取最大利益，避免最大弊端。可能有同志提的意见和建议很好，但是从全局来看，必须舍弃，所以对待决策，大家要正确对待，认真服从，坚决执行，积极干好工作。在个人分工负责方面，领导班子成员要无条件服从并执行集体决策，按照分工，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大胆地、负责地、创造性地工作，主动克服困难，完成分担的任务，保证集体决策得到贯彻执行。每个班子成员都要自觉维护班子的团结和领导集体的权威，既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又要关心全局工作，积极参与集体领导，做到分工不分家、成事不坏事、补台不拆台。领导干部之间，要坚持有话当面讲，有意见当面提，有事依靠组织，按照原则、程序去办，不要小聪明，不使小心眼，不搞小动作，不拉小圈子。班子成员之间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把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以来形成的良好政治生活坚持下去，通过及时有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弘扬正气，积极营造和衷共济干事业、团结一心谋发展的良好氛围。所以，我们要把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领导班子共事、工作的根本，把班长的民主决策与班子成员的坚决执行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思想统一，执行有力，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精髓的体现。

## 三、坚持团结，凝心聚力干好事业

一个领导班子团结与否，事关重大。一个团结的领导班子肯定是战斗力强、凝聚力高、领导满意、群众拥护的领导班子。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出干部，这是不争的事实。一个不团结的领导班子凝聚力差、战斗力弱、领导摇头、群众不满，干不好工作、作不出样子，既毁了干部，害了自己，坑了同志，更重要的是贻误了党和国家的事业。所以，我们务必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班子的团结，时时处处讲团结，每言每行讲团结，平时讲团结，关键时刻更要讲团结。

从现实来看，搞好班子的团结并不难，只要做到“个性内敛、善于沟通、勇于妥协”，就能搞好团结。每一个人都有个性，这是人的天性，大家在一起就是不同的个性相互交融，在融和过程中难免因为性趣爱好的不同、生活阅历的差异、学历学识的高低而产

生矛盾，这是正常的现象。关键是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做到和谐共处。首要的，就是个性内敛，宽厚仁爱，包容别人。人往往只看到别人脸上的灰，而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上的不是。个性内敛就是要收起自己的“锋芒”，给自己的个性罩上安全网，不刺人、不扎人，与人为善，与人为和，多找自己的不是，多看别人的长处，持续提高自身的修养，好字当头，说人好，盼人好，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好的风尚、好的环境，讲团结就水到渠成了。其次，要善于沟通。有些领导干部不团结，究其原因不是有多大的矛盾也没有多大的仇恨，就是沟通不到位，交流不及时，因为误会而产生的，形成矛盾后又不积极疏通，久而久之，积重难返，郁滞郁阻。积极的沟通，就要摆下架子，放低身段，坚持原则，明白事理，清楚大势。对人多包容，遇事多协商，及时化解误会与误解，团结就会建立在原则基础上，这样的团结才会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检验。再次，勇于妥协是团结的精要，妥协在某些时候就是顾全大局，当然妥协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在坚持原则之下的忍辱负重，这既是讲风格，也是一个人品德的升华，是一个领导干部成熟的标志。在工作和生活中，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往往是不一致的，有些甚至南辕北辙，要达成共识，增进团结，这就需要大家在原则基础上重新审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要从大局出发，有所避让，形成交集，这样才能既解决问题，又促进团结。

团结的大敌是拉帮结伙、搞小圈子。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是我们党历来所坚持的。大家在工作生活的交往中，有投脾气的交往自然深，不投脾气的交往自然浅，这本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绝对不能因为发脾气、是老乡、是同学、是战友而搞小圈子。大家一定要明白事理，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组织按照组织程序安排的，是用来干好工作、服务大众的，绝不能把权力当作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更不能“水泼不漏、油盐不浸”。要清楚自己是组织中的一员，是组织上安排我们工作，而不是我们去安排组织。从现实看，凡是搞小圈子的人，拉帮结伙的人，往往处境艰难，进步很慢，其结局基本上都是害了自己，坑了朋友。清理拉帮结伙、搞小圈子的现象，也是近年来中央从严治党的重点，请大家务必牢记：我们来自于五湖四海，是组织上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是为党工作、为人民工作的，要紧密团结在组织的旗帜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搞“小团伙”、“小圈子”，要光明磊落，公道正派。班子团结，则队伍团结，团结则意味着有战斗力，意味着大家共同进步。时时刻刻要讲团结，维护团结，把讲团结、坚持团结放在第一位，维护好班子团结和领导权威，一心一意干好工作。

#### 四、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带好队伍

学习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学政治、学业务、学知识，常学常新，学必有进步，人人皆知。而我在这讲的学习，重点讲无形学习与感悟。领导干部组织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学习，是无形的学习，这种学习不象学历学习那样的有形学习，一个人从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习，是在学校里，有专门的教材、场所、老师，对你的学习成绩的考核通过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来体现出来。而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的学习却没有现成规范可循，既没有专门的教室，也没有专门的教材，更没有专门的辅导老师，一切学习要靠你自己的模仿、实践、感悟而来，具体工作的实践就是课堂，周围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上级领导就是老师，工作政绩就是指标，组织上的考察考核就是评价。这都要靠自己去探索和感悟，在现实中没有成型经验可循，但是有其基本的规律可借鉴。应当说不同的领导干部有不同的领导风格、领导水平、领导能力，有的雷厉风行，有的沉稳大方，有的慢条斯理，有的善于开拓，有的善守善成。我们作为领导干部就要在实践中去揣摩、去领会、去提高。假如说一个领导干部刚提拔到领导岗位时是“高三”水平，几年之后你的领导能力、领导水平按常理应该是大学水平了，但你却没有提高，只能说明你仍然是“高四”或“高五”的学生。

所以，领导干部的无形学习，对成长来说至关重要。

“梅花香自苦寒来”，不去实干，不去细细揣摩，不去感悟真谛，你的能力、水平会就一直停留在“高三”时代，别人都已经大学毕业了，你还是读“高五”、“高六”，这怎么能让组织上对你信任呢？组织上也不可能会让你去担当重任的。领导干部的进步提高，的确需要在实干中学，在学中干，反反复复，才能一点一点积累，一点一点提高，经过磨练之后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成熟的优秀领导干部。只有这样，我们史志工作队才能不断成熟成长起来，才能担当起全市编修史志的重任，让组织放心。

## 五、爱岗敬业，以上率先作出榜样

做史志工作的是从事基础性资料写作的，坐得住，写得下是基本功，没有爱岗敬业的精神，没有一股做学问的“老学究”的韧劲是干不好史志工作的。“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境界。这就意味着加班加点会成为常态，“白加黑”、“五加二”不仅仅是基层同志的专利，也是我们的专利。这需要牺牲精神，如果按照朝九晚五，我们是无法完成当前艰巨任务的。这一点，我们要以上率下，为大家作出榜样。不要讲大道理，你坐在那里，就是一个示范，就是一个标杆，就具有无形的说服力。我们要按照中指组、省史志办指示，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特别是认真贯彻执行全市科学发展总结表彰大会的要求，坚定决心，增强信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可资政、能育人的精品佳志，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干即干好。

## 六、敢于担当，开拓进取干出政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当，是检验每一个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担当是领导干部责任的体现，也是领导干部应具备的基本素养。那种遇到困难绕道走、碰到矛盾就上交，前怕狼、后怕虎的领导干部其实是自由主义者，根本不是一名真正的党的领导干部。凡事明哲保身，不讲原则，热衷于当老好人，只“栽花”不“栽刺”，不得罪人，见风使舵，左右逢源的干部；习惯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遇到难办的事，脚底抹油、推诿扯皮的干部；遇到好办的事，则争功摆好的干部；在会上，领导让提意见，总是好好好、是是是，一团和气；会后，在群众中则乱讲一气，东家长、李家短，议论这件事应该如何如何办，那件事不应该如何如何办，好似高明的干部，其实都是伪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敢担当、不称职的干部。我们作为县处级领导干部，要真正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危害，认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市委市政府让我们来做史志工作，是对我们的高度信任，我们就要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在其位，谋其政，把高标准履职尽责作为基本要求，切实做到日常工作能尽责、难题面前敢负责、出现过失敢担责。面对当前史志工作的困难，要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要独挡一面，是你的工作，就要在你的手里解决好，不要上推领导、下推别人，要养成谁的问题谁解决的良好气氛。我们一定要担当起编修好全市史志工作的大任，让市委市政府放心，让领导放心，把我们的工作干好，干出一流业绩，绝不给领导添麻烦，这就是我们的担当。

政绩看得见、摸得着的，是硬道理。政绩是靠工作干出来的，而不是靠嘴吹出来的。那种信心满满、豪言壮语，到头来一事无成的“政绩”是空的；心浮气躁，习惯于做表面文章，热衷于追求轰动效应的“政绩”是虚的。这样的政绩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做史志工作的，就要踏踏实实地秉书修志，以扎实的工作干出政绩来。今年，我们的工作目标就是“突破难点，打造亮点，开创史志工作新局面”，突破“难点”就是要力争上游，改变第

二轮修志的落后状况，奋起直追，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挤进全省工作先进行列。突出“亮点”，就是要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为史为鉴，编撰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志书，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临沂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氛围。我们绝不辜负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我们的厚望，端正态度，扎实工作，就是我们的政绩。

## 七、化解“许愿”、“怨气”、“情绪化”等矛盾， 坚定政治定力带好队伍

作为县处级领导干部，不封官许愿是良好官德，也是美德，更是处理好与领导关系的关键。现在有的干部动不动就封官许愿，说了不算还到处说。大家知道，任何人都有潜意识心理，作为领导干部为了讨好别人，到处许愿，不是一件好事。看似给了人情，实际上却惹了麻烦。当事人会把你许的愿放在心上，时时处处想这个问题，实现不了，就会怨领导、怨同志，精神萎靡，工作滑坡。许愿丝毫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加深矛盾，这是极为不负责任的表现。干部提拔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会受到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既有客观的，也有自身的。绝不是个人许愿就能解决的问题。这种做法的不道德，是把自己摆在外面，把领导和当事人摆在里面，只能说明要么是动机不纯，要么是不具备一个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现在还有的干部喜欢在经济利益、福利待遇上向别人许愿，哄下属干好工作许愿一些过头话，这也是完全错误的，是组织原则所不允许的。对能干的同志进行激励表扬是正常的，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也是必须的，但绝不能用许愿的方式去“鼓励”、“表彰”。

一个好的领导集体是没有怨气的，大家精气爽，积极上进。各种“怨气”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消除，关系顺畅、心情舒畅，有凝聚力、战斗力。如何排解怨气、疏导怨气，考验着领导班子也考验着领导干部。现在有的干部提拔了有怨气、没提拔的有怨气、提拔慢了有怨气，自己提的建议没被领导采纳有怨气，自己想干的事因各种原因没干成也有怨气，专不下心来做事，总感觉组织上、其他人有愧于自己。凡此种种表现，说明心理上有疾病，没有走出思想上的“魔咒”，没有理顺好自己与组织的关系，没有处理好顺境与逆境的关系。我们都是组织上的人，是组织目标、组织原则、组织纪律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很多事情不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怨气说明没有摆正位置，是把个人置于组织之上了，是私欲膨胀的表现。有的干部在顺境时，春风得意，在逆境时则哀声叹气、怨天尤人，说明磨练还不到位、意志还不够坚强。大家一路走来，到了县处级领导干部的位置，每一次进步都是组织上的关心、同志们支持的结果。所以，当有怨气的时候，先要在自身上找问题、找原因，这才是解决怨气的正道。“牢骚太盛防肠断”，怨言多一是心理不健康，二是人格不成熟。领导干部看人要有眼量，做事要有胸襟，要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他人、正确对待自己，要学会安于现状，干一行、爱一行，把种种怨气自我化解，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干好工作。

情绪化是领导干部成长的大敌，防止情绪化，是干部成长、成熟的重要标杆。每个人都有喜怒哀乐，领导干部一样也有情绪不稳，需要发泄的时候。但领导干部之所以成为领导干部，有其客观的因素，但更离不开自身的努力。可以说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有其成长经验可分享，走到县处级这一层次就更有其独到之处。所以，在处理情绪化上自然有别于一般同志。遇到不满意的事情、不顺心的情况，要静下心来想一想，自我消化，绝不能情绪使然，率性而为。对领导、对同事、对单位有意见，要通过组织程序，逐级反映，妥善解决，不能故意放大矛盾、放大问题，更不能以匿名的方式“贴上八毛钱，折腾大半年”，挑事找毛病，把一个好单位搞得相互猜忌，沉渣泛起，浑浊不清。这种情绪化的结果是抹黑了集体，毁坏了自己，败坏了信誉。情绪是双刃剑，情绪高涨，工作好干，情绪低落，

事业受阻。如果情绪化地对待组织、对待别人，就可能昏昏然，失去坐标，对人对己有害而无一益。所以，冷静地看问题，理智地解决问题，克服情绪化，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良好素质。

## 八、讲规矩守纪律，守住廉洁自律的底线

我们史志工作部门虽然是一个小单位，是清水衙门，但也有与人财物相关的业务工作，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廉洁自律问题。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党内监督的制度体系。《准则》和《条例》是我们领导干部的必读书，要认真研读，认真执行。

干部出问题大多是从思想上的滑坡开始的，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大家要充分认识到，组织监督和群众监督，时时在、处处有，其实是对领导干部最大的关心、最好的保护、最真诚的帮助，我们要自觉接受并正确对待党和人民的监督，要深刻感悟到“不想接受监督的人，不能自觉接受监督的人，觉得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很不舒服的人，不具备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

领导干部的自律，简单说就是把控好自己，首先要做到自警，为人处事要时刻保持自我警示、自敲警钟；其次，做到自省，就是要时刻反思，对照规定、纪律自我检查。再次做到自励，要有信心，以高尚的情操、健康的志趣和坚定的理想来鼓励自己，不断激发自身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向善的正能量。最后把好自律这个总关口，从思想、品德，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这样才能真正把控好自己。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贪腐变质是有过程的，做到防微杜渐，从小事、小节上警醒、警惕，才不会变质，不会长出恶瘤。所以，务必请大家注意从事与财务有关的工作，一定要按照程序进行，一律上会研究，决不能擅自处理，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廉政自律的最大敌人是特权思想，看看我们周围，凡是“进去”的干部，无不是从特权开始，要不就是明目张胆、吆五喝六，要不就是蝇营狗苟、偷偷摸摸，要不就是打政策的擦边球，吃拿卡要，损公肥私，利欲熏心。这样的人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事业。党章规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党员干部在平时生活和工作中自觉抵制特权，不搞特殊化，不仅是自我约束和自我修炼，而且是重大的政治责任。我们作为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守住做人、处事、用权和交友的底线，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拒腐蚀、永不沾，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不做糊涂事、不做糊涂人。

为政之要在于廉洁，廉洁之本在于自律，自律之道在于警醒内心。我们要做到内心强大，保持戒惧，时刻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坚持党性原则，守住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筑牢廉洁自律的防波堤。这是干好一切工作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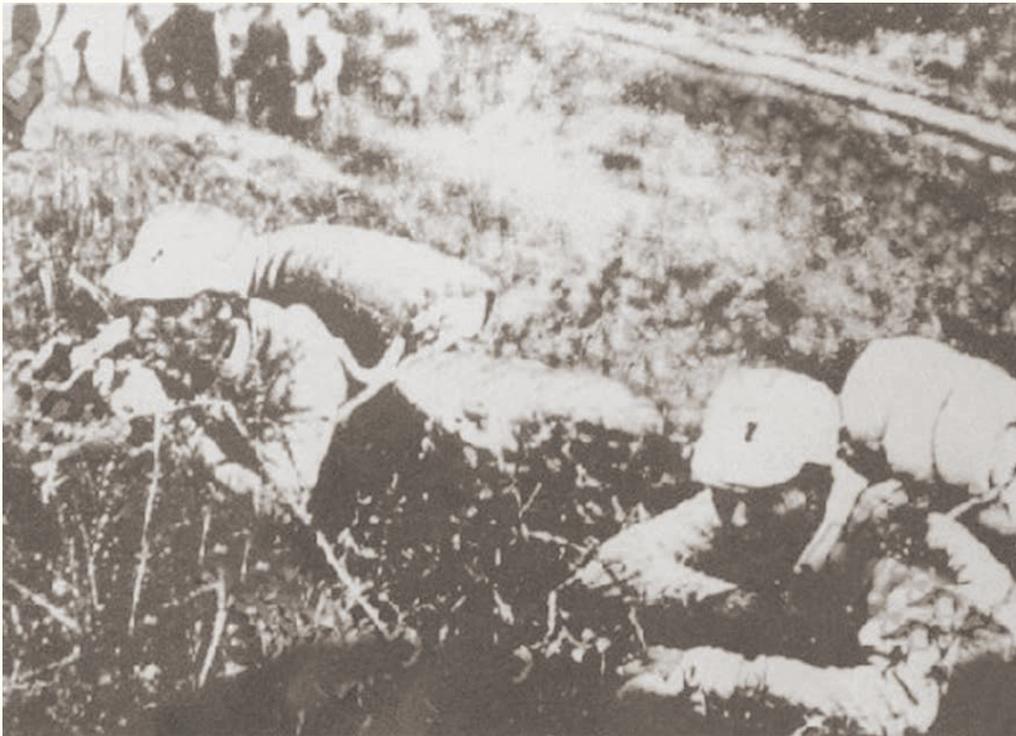
我们在一起既是工作需要，也是缘分，大家一定要相互体谅，相互支持，和衷共济，凝聚起班子的力量，理清思路，当好排头兵，铺下身子，全面开创史志工作新局面。

（作者为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本文系2017年2月在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会议上的讲话）

# 沂蒙根据地反“扫荡”<sub>(下)</sub>



来鲁南“扫荡”的日军



坚持大青山“反扫荡”的抗大一分校学员



# 姓氏百家漫谈——朱姓 (四)

赵丹峰

在经济方面，明朝伊始，面临着因长期战乱造成的经济凋敝、人口流失、田地荒芜、财政拮据的严重困难。农民出身的明太祖，为恢复经济、增强国力，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很快使新王朝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一是下令对各地户口与田土进行普遍核实，而后编成户籍册和田土册存于官府，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为摸准实情，明太祖还派出军兵，协助户部和地方政府开展普查，并明令规定，凡隐瞒谎报户口和田土者，皆以充军治罪。明初，朝廷规定，征收税粮以田亩计算，但开垦荒地则可免税。其田赋率是“官田田税五升三合，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与以前历朝相比，这是很轻的田税。轻田赋的实行，对农民休养生息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实行“两册”核编与轻薄的田赋制，是明太祖在农业政策上体恤民瘼的一大重要建树。

二是鼓励垦荒，实行屯田。由于战乱，明初大片田地荒芜的现象十分严重。为迅速解决田地抛荒现象，明太祖力倡农民垦荒。洪武元年，他即下旨规定：凡因兵燹遗抛的荒地，被他人通过垦荒耕种后又成为熟土者，所垦土地即归垦者所有；如原业主重归乡里，朝廷则在附近另行划拨给与其原先同等面积的荒地进行垦植。这一承认垦荒之后的土地所有权归垦荒者所有的新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垦荒种植的积极性。朝廷还规定：凡是流亡异地返回家乡生产者，皆免税三年。而对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等荒地较多的省份，朝廷更是明申，对农民新垦的荒地“永不起科”。在鼓励农民垦荒种植的同时，明太祖还大力推行包括民屯、军屯和商屯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屯田政策。所谓民屯，即朝廷通过强行移民，将人稠地少的老百姓有秩序地迁徙至因战乱造成的地广人稀的地区安家落户，进行屯田开发。为此，政府发给移民户路费、耕牛、农具等，并规定对屯田者免除其三年的赋税。与此同时，政府还招募无业农民开荒种地，每人给田15亩，外加两亩菜地。在笔者所接触的一批清代和民国时期所修的家谱中，每每提及的某姓某族之先祖来自山西洪洞县（当时的洪洞是中原移民代表性集散地）的记载，即是明太祖通过大移民推行屯田这一重大国策在谱牒中的真实反映。除了民屯外，还有军屯与商屯两种。军屯是由卫、所军队

开荒种地的一个重要形式。垦荒戍边是明初军队活动的一大特色。通过军屯，使由全国军队垦荒种植的土地达到89万余顷，从而使全国百余万军队的生活需求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为此，明太祖曾自豪地说道：“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商屯是军屯制度的补充和延伸。明初，为了解决边境地区的军粮，朝廷常在边疆设置军储仓，由内地盐商向边境运送军粮。朝廷则视其运粮数量发给其盐引（即贩盐执照），盐商则可持盐引到盐场领取食盐，然后将盐运至指定地区贩卖获利，以补偿其粮费，此谓之“开中法”。为免除运粮的麻烦与费用，一些机智商人便参考民屯之法在边境地区招募民众屯田垦种，将所获粮食就近输仓，遂形成商屯。此举既为朝廷节省了运输军粮的费用，又使盐商们通过屯田而获利，对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稳边固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实行屯田种粮的同时，明太祖还下令鼓励农民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使国民的吃穿问题均得到了解决。到洪武末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800余万顷，比元末增加了4倍多。仅洪武二十六年一年，全国岁征粮达3278万石，是元代岁入粮的两倍。米粟的丰盈，为大明前期的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大兴水利建设。元末动乱，水利失修，水旱濒仍，民不聊生。大明开国后，明太祖在力促农业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他多次下旨疏浚河道，开挖渠洫，明令要求：“陂塘湖堰可蓄泄以备旱潦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为见实效，他还委派朝官赴地方查勘，对那些轻视水利的地方官员予以处罚。同时，利用农闲时节，组织数万乃至几十万的夫役进行较大型的水利工程建设。至洪武二十八年，全国共开挖塘堰近4.1万处，疏浚河流4000余条，修筑陂渠河堤5000余处。这些工程，不仅较好地解决了水患，而且为永乐年间的水利兴修之举打下了基础。

四是促进工商业的繁荣发展。鉴于元代制定的手工业工匠需常年为朝廷服役，不利于手工业发展的弊端，明太祖规定，各地工匠为朝廷服役实行“轮班”制，即工匠赴京服役的时间为三年一轮班，每期仅三个月，从而使广大工匠能以绝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在鼓励农民植棉的同时，他先后在苏、浙、川、陕等地设立织染局，促进了纺织业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陶瓷业、冶金业和造船业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降低工商业的生产成本，明太祖对工商业实行了低税政策，建国前，对商人征收的“官店钱”税率系十五税一，明朝建国后便降至二十分取一，后又降至三十分取一。而对民间所需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贩卖，朝廷则一律免税。

在文化教育方面。明朝是明太祖经浴血奋战，在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后所创立的最后一个由汉人统治的封建王朝。建国伊始，明太祖从巩固大明基业、防止蒙古贵族复辟这一大局考虑，即着手从文化方面开展恢复一度被弱化了了的汉文化。他下旨禁用蒙古名字、留蒙古发式、着蒙人服饰、说蒙语和蒙古化文字的书写方式，在继承汉唐衣冠的基础上，设计了带有鲜明中华特色的明代官、民服饰，以至在当今的中国传统戏剧舞台上，剧中人物所穿戴的乌沙、官服，仍打着大明装束的印记。甚至连我们所喜欢看的古装韩剧，其人物服饰也概莫例外，大明文化对周边邻国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同时，明令确立了将唐宋散文体作为国家正式的公文样式。在思想观念方面，明太祖大力标榜传统儒学作为朝野的正统，特别是明令提倡和弘扬适应当时统治和时代要求的程朱理学，将其视为立国兴邦之本，并明确规定，凡举乡试（省级）和会试（国家级），四书义皆以朱熹集注为标准，经义以程颐、朱熹等注解为标准。明太祖针对大明开国之初的国情所采取的上述举措，对恢复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若简单以“复古论”对其评价，未免显得过于肤浅与短视。

明太祖虽因家贫入私塾时间不长，但在皇觉寺的数年间，他勤读经卷，苦练书法，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亦为他日后重视教育奠定了基础。在建国前，他便在其经营的红巾军根据地内设立国子学，作为培养人才之所。明朝开国后，便在京师设立了高等学府国子监。其生员不仅是各地考送的优秀才俊，还有部分来自琉球、日本、暹罗（今泰国）等国的留学生。到洪武二十六年，国子监在校学生已达8124人，系当时世界上规模名列前茅的国立大学。除创办国子监这一中央高等学府外，洪武二年，明太祖还下旨各府、州、县均设立学校，并从国子监选派优秀监生数百人到各地任教，以补地方师资不足。不久，连边远的卫、所及少数民族地区亦相继办起了学校。为普及教育，明太祖还下令在县以下的乡里均要开塾学，规定“乡里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学，愿读书者，尽得预焉”。为免除学生的后顾之忧，朝廷规定，凡属府州县学之生员，均免去差徭二丁，师生由政府供给月廩食米（每人六斗），另给一定鱼肉以壮身质。这样，一个覆盖从中央到乡村乃至边疆僻壤的立体教育网络体系便由明太祖建构起来。在洪武时期，无论从覆盖广度、办学质量和对生员的体贴关照等诸方面来看，均大大超过了其先前的历朝历代。

毋庸讳言，明太祖朱元璋在其坐江山的30余年中，既留下了一系列载之于史册的杰出建树，亦酿成了一些弊政、败绩，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他在登基后，为了使后世子孙能够坐稳朱氏大明江山，利用种种借口对一大批开国功臣所实施的大肆杀戮，胡惟庸案、李善长案和蓝玉案，即是洪武诛臣的三大典型案例。胡惟庸早年随朱元璋起义于和州，洪武六年任左丞相，其间，他专权树党，使相权对皇权构成了威胁。洪武十三年，明太祖以谋反罪将胡惟庸处斩，并诛其三族，受此案牵连的1.5万名官员也被一同处死，一时震动朝野。李善长是朱元璋的重要谋臣和助手，明朝开国后，共有6人被封为国公，其中李善长位列第一，太祖将其比之于汉初萧何。李善长还是明太祖的儿女亲家（其长子李祺为驸马）。洪武二十三年，明太祖以再查胡惟庸案为借口，以“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之罪，将已77岁高龄的李善长赐死，同时处死其家属70余人。在前后两次“胡狱”案中，相继有3万余人因受株连被杀。蓝玉是开国大将常遇春的内弟，在徐达、常遇春去世后，他率军南征云南、北征大漠，为大明朝立下赫赫战功，成为洪武后期最为著名的将领，太祖曾将其比之为西汉名将卫青，封其为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赐世券。蓝玉居功自傲，他蓄养了大批庄奴、义子，为害乡里。洪武二十六年，锦衣



朱元璋诛杀异己

卫告其“谋反”，明太祖遂趁机将其诛杀且灭其三族，张翼、陈桓、曹震、朱寿、何荣五位列侯和吏部尚书詹徽以下计两万余人，悉遭诛杀，史称“蓝狱”。有的史家亦将胡、蓝两案合称为“胡蓝之狱”。两案相连前后长达14年，计有近5万人被诛杀。通过上述三案，再加上其他“罪名”被杀或以赐御酒、御馔而被毒死者，明初的开国功臣宿将几被杀尽，身列公侯而得以善终者，仅有信国公汤和（系太祖发小）、凤翔侯张龙和武定侯郭英数人。所以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价道：明太祖“借助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明成祖朱棣是继明太祖之后，又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他是明太祖的第四子。洪武三年受封为燕王，十三年就藩北平（今北京）。其间，多次参与北方军事，屏镇元蒙势力，是明太祖诸子中拥兵最多，且最富作战指挥经验和胆识谋略的一位藩王。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去世，享年71岁。因太子朱标早逝，明太祖遂立朱标的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根据太祖临终遗诏，太孙朱允炆登上皇位，是为惠宗，翌年改年号为建文。鉴于诸藩王皆系建文帝之叔父，且握有兵权，客观上对其执政构成了威胁，为破此困局，他听从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言，决定通过削藩以巩固中央皇权。在此情势下，燕王朱棣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以剪除“黄、齐奸臣”为由，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悍然发动了“靖难之役”，于建文四年六月攻入南京，登上了帝位，于次年（1403年）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从此开始了其长达22年的统治。明成祖朱棣虽然采取不光彩的非常手段登基称帝，但在位期间，他励精图治，开拓进取，为巩固大明的统治、促进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重大建树主要有：

一是继续削藩和改革中央吏制，以巩固中央集权。明成祖即位后，为彻底剪除各路藩王对中央皇权的潜在威胁，遂继续推行建文帝的削藩国策，将中央大权牢牢控于皇帝手中。当年胡惟庸案发生后，明太祖废除丞相，将中央六部直属于皇帝，虽增强巩固了皇权，但亦使皇帝处于日理万机的沉重负担困境中。明成祖即位后，为使中央机构运转有序，便在太祖仿宋制设殿阁大学士以备咨询的基础上，遴选一批有作为有见地的文臣入值建于皇宫之内的文渊阁，参预机务，成为皇帝的得力参谋。因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丞相之名，便称为内阁。从此开始，阁臣的设置遂成为常制。由成祖所奠定的内阁制，标志着文官治国制度的确定，与明初奉行的重武轻文之风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

二是拓疆固边，睦邻互惠。为解除元蒙势力对明王朝的威胁，明成祖以其坚定的意志、超凡的气魄和强大的实力，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对顽固挑衅者予以沉重打击。他亲率大军，御驾远征，巩固了北部边防，留下了“五征漠北、三犁虏庭”的称誉，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可谓绝无仅有。在东北地区，他招抚东北各少数民族，自永乐元年起，相继设立了134个军政合一的卫所，继而设置的奴儿干都司，作为统辖黑龙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松花江诸流域的中央直属机构，实现了东北地区的边疆安定、民族融合与经济发展。在西南，因安南（今越南）权臣谋位且伏杀大明将领，明成祖于永乐四年发兵80万征讨黎苍（安南自立的皇帝），事后不再封新王。翌年，而依内地各省建置形式，设立交趾布政司（即交趾省），将其地分为15个府进行直接统辖（此举孰是孰非，另作别论）。同时将南沙群岛纳入了中国版图。永乐十一年，以内地形制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使中央对西南地区的管辖逐一落地生根。从



明成祖朱棣

永乐十二年始，明成祖特命陈诚等数次出使西域，与西域诸国建立起广泛密切的联系，既稳定了西部边陲，又重新开启了西域与大明的通商之路。

三是迁都北京，以固江山社稷。北平北依燕山，西傍太行，东连山海，南拥平原，其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辽、金、元三朝均将其作为国都。明成祖即位后，即决意将国都迁至北平。他深知，当时北元势力强大，迁都北平既可加强对华北地区的防御与控制，以震慑北元的侵扰，又可促进和带动与南方相比相对落后的北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更有一层意思，北平是成祖作为燕王时的长期驻地，是其苦心经营几十年、夺天下登基的“龙兴之地”，因此迁都于此，对成祖来说，是一项势在必行的国策。在其即位后，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作为明之陪都，在此建顺天府，为日后迁都作准备。永乐五年五月，明祖下旨在此兴建京城，至永乐十八年，营建工程基本完成。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明朝正式迁都北京。为了保障北京城所需的粮食供应，在此之前，成祖即下令疏浚已多处淤塞的大运河，以确保京城官民所需的粮食及日用品通过大运河运抵北京。从此，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四是注重经济发展，以强国力。明成祖即位后，继承其父明太祖对农民实行休养生息的国策，鼓励开荒屯田，注重兴修水利，他令户部尚书夏原吉组织军民疏浚吴淞江，命工部尚书宋礼督开山东境内的会通河，并修建能够调节水位的闸门，这些工程，在便利水上运输、灌溉两岸农田、消减水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农田的扩垦种植和水灌条件的改善，使永乐时期的农业经济较洪武年间又有了长足发展。以陕西为例：其间，陕西官仓积存贮粮达1098.4万余石，可供支付陕西官衙、军队10年所需的俸粮。将曾多次淤塞的大运河疏通，本为移都北京后通过水运粮米以解京师之需，其实大运河经疏浚全线通航后，不仅解决了京师及北方官、民、军的用粮之需，而且带动了南北商业的流通，地处运河沿岸的码头口岸，如扬州、淮安、济宁、东昌（聊城）、德州、直沽等，均因水而获利，很快发展成为商业和文化繁荣的城市，宛若一颗颗镶嵌于数千里运河银带上的耀眼明珠，使一度沉寂的运河文化又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五是遣郑和率船队数下西洋。明成祖即位后，为了了解与增进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并通过朝贡这一特定方式展示明朝泱泱大国的国威国力与风范，增强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从永乐三年（1405年）起，便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通使西洋，历两年而返。而后又屡次航海，至宣德八年（1433年），在28年间，先后7次出国，遍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沧溟十万余里”，最远曾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创造了中国航海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郑和所率舰队规模宏大，其中长44丈、宽18丈的大舰船即有60余艘，随行将士达2.8万人。作为大明朝奉敕的使臣和舰队的统帅，郑和每次出海，即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宣读，并持有成祖颁赐各国国王的敕诰和王印。同时携带大量金银、铜钱和大批货物作为赏赐。郑和代表大明的出使，使所到诸国，特别是南洋诸国受到极大震动，遂纷纷遣使入贡，在永乐三年当年，明成祖即封授满刺加（即马六甲）国王，并为该王撰写镇国碑铭；浚泥（即文莱）国王遣使入贡，明成祖便赐予国王印诰。翌年，该国国王又亲率妻子弟妹和陪臣150余人来明朝京师奉表朝贡。对于明成祖遣郑和率庞大舰队下西洋之举，史家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耀示国威；有的说是为了扩大对外贸易；有的说是为了促进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还有的说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以消后患，云云。笔者认为，上述说法虽均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略了成祖遣郑和数下西洋的主要意图，是从政治大视野考虑而做出的一项战略性大布局。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成祖即遣使臣分赴四方，宣告大明朝帝位的轮替，随即，日本、暹罗（今泰国）等国便陆续到中

国朝贡，与大明建立了宗藩与册封关系。郑和下西洋的当年，处于海上战略要道上的满刺加（即马六甲）随即被纳入了明王朝的朝贡体制，与大明形成了宗藩关系。为保障下西洋的物资储备与补给，明朝在马六甲这个南中国海南端联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要道关节点上，建立了庞大的航海中转站，继而形成了以马六甲为中心的朝贡圈。马六甲中转站的建立以及它与明朝确立的宗藩关系，意味着明代永乐时中国建立起了以东南亚为基础的战略缓冲区，加之当时的安南（今越南）已被明成祖征降为明朝直辖的一个省，所以明成祖时代的南中国海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内海。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永乐后不久朝廷即停止了下西洋宝船的航行，不再增加新的朝贡国并削减赏赐数量，并承认了安南的独立（其地原属唐朝管辖的一个郡府，五代后晋时独立，明成祖时又将其改为明朝直辖的一个省），继而因国力的下降式微又让葡萄牙侵占了马六甲，使中国失去了对马六甲这一重要航运命脉的实际控制权。试想，如果成祖之后的帝国君王们能继续奉行成祖确立的对外政策，保持深蓝海军的存在，重视经略好海洋这一战略资源，那么广阔的南海至今仍然是中国的安全内海，近几十年来，越南、菲律宾等国强占中国南海部分岛礁的事实也决不会发生，美国规划的“重返亚太”的战略布局，只能是一枕黄粱梦而已！“山姆大叔”的军舰和飞机还能像今天这样在中国的内海里有恃无恐的频繁挑衅吗？！环顾当下严峻的南海局势，追思已逝的历史风云，我们才能清醒地认识到明成祖当年的良苦用心，进而感念这位伟大的战略家和政治家，以宽阔的视野和雄浑的气魄，运用大手笔、大智慧，为将中国建成当时亚洲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海洋强国，所立下的丰功伟业。笔者以此认为，在建设强大的深蓝海洋舰队，注意处理好与宗藩国关系的同时，用心经略海洋战略方面，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都不能与明成祖比肩！

六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下旨组织编纂《永乐大典》。明成祖即位后，深感“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之苦，遂萌发了通过编纂一部大型类书，“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所之便，如探囊取物尔”的构想。于是令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著名学者善领其事。为确保成书质量，成祖还对编纂宗旨作了明确交代：“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修辑一书，毋厌浩繁。”翌年十一月，解缙将编成的《文献大成》一书上呈明成祖，成祖看后认为该书“所纂尚多未备”，内容过简，遂于永乐三年又下旨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和翰林学士解缙等再行重修。成祖对此书编纂极为重视，下旨编纂人员可到当时皇家图书馆——文渊阁查阅全部藏书，因南京文渊阁不能完全满足编纂所需，成祖又命郑赐到各地收购各类书籍，并明令，为完成此项文化建设工程，对需买之书可不计价钱。在成祖的全力支持和关注下，姚广孝、解缙调集2000余人文士开展了紧张有序的编辑、校订工作，于永乐六年完成纂修任务。成祖审阅后甚感满意，亲自作序，并将此书定名为《永乐大典》。这部“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大型类书，共计22937卷（仅目录即有60卷），装订为11095册，成书规模达3.7亿字，全系用毛笔工楷书写。作为世界上最早最浩繁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从先秦至明初的七八千种古代重要典籍，后人曾从中辑录佚书590种，现存的《东观汉纪》《春秋释例》《元和姓纂》《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一批重要史籍，均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 “相傅”之救危之星 (上)

——记宋文采

刘凤才



《黄帝内经》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其意为在人的全身这个复杂而严密的“机构”中，心脏如同国君，而肺之功能则如辅佐君主的宰相，因主一身之气而治理与节制、调节着全身的活动。明代名医张介宾解释说：“肺与心皆居中膈上，位高近君，犹之宰辅”“肺主气，气调则营卫脏腑无所不治”。由此可见，最早的祖国医学就已经对肺之重要作用有了明确而深刻的认识。“相傅”一旦染恙特别是患有急病重症而不能再理“朝政”，履行“治节”之职，则君主无所依，国家无所靠，问题很严重，“相傅”很痛苦。

其实“相傅大人”不必很是惊惶失措。抬眼观来，在临沂市中医医院，就有一位拯救“相傅”之危重疾患的明星级人物——宋文采。她是肺病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又是山东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山东中医药学会肺系病专业委员会委员、省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中青年医师专业委员会委员，临沂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内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市医学会结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获得山东省

“德耀齐鲁”道德公民、临沂市优秀科技工作者、临沂市结核病防治工作先进个人、临沂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出版医学专著1部，发表专业论文数篇，获临沂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

## 一、新星在曲折坎坷中划破地平线

凡一颗新星升起，都必定经历曲折磨难，诚如孟子所言“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不讲其他，就单单学习“说话”，宋文采就经历过几番艰难曲折。

宋文采原籍沂水县富民官庄乡，1971年出生于东北，在姊妹5人中行末。上世纪50年代末国家最困难时期，本来初中毕业后已经在乡里参加了工作的父亲，响应上级支援东北开发的号召，毅然打着红旗“闯关东”，千里迢迢奔赴吉林省舒兰县煤矿。父母忙着“我为祖国献黑金”，实在无暇无力照顾5个孩子。于是，在宋文采仅仅4岁、刚刚要跟着周围人学成“东北腔”的时候，便将这个“老小”送回山东老家，交由奶奶照看，祖孙两代相依为伴，一晃就是3年。身体中继承着沂蒙人的DNA，血管里流淌着沂蒙山的血液，嘴里吃的是家乡的煎饼，宋文采很快就忘掉了“东北腔”，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沂蒙话”，成了一个标准的沂蒙妮。

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父母又把宋文采接到东北，参加入学考试。一张口就是“俺这疙瘩”的东北小朋友们，对这个一张口就是“俺是沂蒙山那埝地”的小朋友的一口临沂话，反而很是讥笑起哄：“真土呀，俺们听不懂！”把腼腆的宋文采闹腾得差点流下泪来。老师没有笑，望着这个虽然害羞但一脸聪颖之相的沂蒙小姑娘，很是喜欢与疼爱地问：“你会写什么字呀？”这下宋文采来了精神，抬起头来大声回答：“我会写‘毛主席万岁’！”于是，她接过老师的粉笔，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这5个大字，监考老师一下给她打了120分。“这疙瘩”的小朋友们一下傻了眼，而“那埝儿”来的宋文采则高高兴兴地上了学。由于德智体美劳门门俱佳，不仅老师、全班同学都喜欢上了这个沂蒙山来的优秀女生，一致推选她担任了班长、少先大队长，她还多次被评为“五美”少年。顺利升入初中后，她的学习更是脱颖而出，一直名列前茅，担任班级学习委员，多次代表学校参加了英语、数学、物理等竞赛，都获得了一等奖。



初中三年级下半学期，因为父母调动工作，宋文采又跟随老人回到了山东沂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东北数年下来，宋文采的东北话说得很地道很标准了；但是“少小离家老大归”，因为她原来家乡话学得就不多，这次回来反而更听不懂纯粹正宗的沂蒙山方言了。一次，老师用教鞭敲点着写在黑板上的一道公式，极为严肃地提示同学们：“这个‘窝’，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宋文采立即瞪大了眼睛，在黑板上到处找有没有陷下去的坑坑洼洼，半天没有发现，弄得一头雾水。回头问老师和同学们“窝”在哪里，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语言上的障碍已经严重影响了听课学习，最为要命的，是东北的中学课进程与山东有很大差距。在同年级中，山东中学生已经学习过的理化等课程，在东北尚未接触。这种基础文化知识上的断档，成了宋文采学业中面临的巨大“断崖”。当她用尽全力跨过一道道断崖时，别人又一步步向前进，她很难追得上。“无可奈何花落去，满眼垂泪落孙山。”第一次高考，她榜上无名，打击不小。但宋文采虽然是个外表清秀、身体纤弱的女生，骨子里却透着一股顽强坚韧与永不服输的志气。她潜心立志，倍加刻苦，认真复读，决心再考。

然而就是这一年复读，让宋文采第一次明确与树立了学习与事业志向。期间，她的一个姑表妹不幸得了白血病，多方求医，终不治而逝。她与表妹时常相处，情如同胞。表妹一向健康，突然罹患。就是这样一个花季少女，竟然瞬间毁在残酷无情的病魔手中。想起表妹离世时那双充满绝望而又渴求得救的目光，宋文采十分悲伤又苦于无助。但是她不相信人类就战胜不了病魔，自己何不做一个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自己一定要拼命学习，将来就当能治好病特别是重危患者的好医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0年，宋文采如愿以偿，顺利考入潍坊医学院。大学期间，她脑海中仍然不时浮现出表妹那双充满期待的眼光，成为她学习的强大动力。她不仅学习刻苦优秀，而且关心集体，帮助同学，政治进步，思想积极，被选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大学二年级时，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95年，宋文采以优异成绩毕业，一颗经过许多曲折坎坷的新星终于划破了地平线。此时，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她将来必定是个有用之材，必定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但是，就连她自己可能也没想到，她不仅能够成材，而且还成为沂蒙山区医疗战线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

## 二、明星在勇于担当中熠熠闪光

毕业后，宋文采被分配到临沂市中医医院内二科。当时，内二科主要承担着危重病与疑难病的诊治任务。而在诊断治疗中，穿刺技术是最常用、最基本的操作之一，又是较难准确熟练地掌握的基本功。它要求医生必须全面熟知人的生理解剖，又要有敏锐细腻的手感，精确精准的判断，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很难做到。但是，宋文采凭借着在校学习时掌握的扎实基础理论，更加上对病人极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精巧到位的操作，很快便掌握了胸穿、腰穿、髂穿等操作技术，即便是很难部位的穿刺，她也常常是“一箭中的”，为日后掌握各种穿刺技术奠定了基础，也赢得了大家和患者的信赖。有一次，宋文采正在家休息，突然接到科里电话：有一位患者需要做髂穿，几个人都上了阵，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不成功，最后还得请她赶紧前去。此时她已经怀孕在身，行动不便，但她毫不迟疑，拖着沉重的身子，风风火火地赶到科里，几个熟练的动作，便一举“拿下”，得到大家的啧啧称赞。

为培养提高年轻骨干的水平与能力，适应患者诊治与医院发展的急需，2001年，

医院领导选派宋文采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进修呼吸系统内科。正所谓登高方知天高，临大海方知海大。来到全国一流的医学高等学府，宋文采眼界大开，深感差距。虽然有了较为扎实的基础理论，也有了数年的临床经验，但是她仍然突然感到自己原来是“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会”，似乎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干起。她以强烈的求知欲和紧迫感，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学习钻研，但是仍然感觉有用不完的精力，学不尽的知识。当时，我们的医院连电脑都没配备，整理记录病历，完全靠手写笔记，而在人家这里，电脑应用已经相当普及。开始时，她在电脑上整理一份病历往往需要七八个小时，把等着用电脑的同事们急得像“逼债人”，让她感到很尴尬和歉意。为了不耽误别人使用，她只好在别人下班后，利用晚上10点以后的时间，加班加点，上机学习。为了学会拼音输入法，她在逛街走路的时候，眼睛都盯着广告、门头上的拼音，一个字一个字地熟悉与牢记，简直到了痴迷程度。后来，她在电脑上整理一份病历缩短到了不用半小时。同事们都惊奇地说：“文采，这还是你吗？怎么一下飞起来了！”整整一年时间，她不分黑白昼夜，抢抓分分秒秒，每天只睡眠三四个小时。她常常根本不回宿舍休息，而是在住院部睡眠室中帮助老师做课题或者自学补课。人的意志可以胜似钢铁，但身体毕竟是肉身。久而久之，本来身体纤巧、体重只有100斤的宋文采，一天天消瘦。进修结束时，她的体重竟然下降到了只有80多斤，却获得了大家一致公认的优秀进修医师称号，为自己、也为沂蒙医生争得了光荣与自豪。

2004年，宋文采又参加了山东中医药大学课程班，以自己的优异表现，担任了班长。这次学习，让她系统地了解与认识了祖国医学的博大精深、无穷奥妙。她认为中、西医在治疗不同疾病上，各有自身的长处与优势，尤其作为一位在中医为主的医院，走中西医结合的路子，更有良好的环境与条件。她悉心学习，逐渐掌握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中医治疗方策与方法，如用穴位贴敷法、埋线法等治疗肺气肿、肺心病、哮喘、慢咳等疾病，并在临床实践中坚持中西互补，取得了可观的疗效，成为一名中西兼优的全才医生。

在孜孜以求、永不知足的学习进取中，宋文采不断提升着自身医术的含金量；而更值得称道的，是她在临床实践的“试金石”上，敢于测验自己的含金量。她们科室，主要诊断治疗呼吸系统危重病人，而危重病情往往被人们视为医生面临的“雷区”，风险极高，责任极重，要求极严，考验极大。但她一心一意，责无旁贷，急病



人之所急，解危重于倒悬，敢于挑战，勇于担当，不计得失，从不退缩。也正是在一次次救危重、挽生命的考验中，她把自己历练打造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熠熠生辉、令人瞩目的明星。

2005年的一天早上，宋文采早早送儿子上学后，就提前赶到医院上班，这也是她多年养成的习惯。就在她路过推拿科时，突然听到屋内正传出医生们的紧急呼叫声：“赶快抢救，赶快抢救！”宋文采如同听到了紧急战斗命令，几步箭步直奔屋里，只见一个30岁左右的女性患者已经休克在病床上。患者是在推拿结束后突然发生呼吸心跳骤停的，此时牙关紧闭，面色苍白，情况十分凶险。宋文采毫不犹豫，只说了一句“我来！”立即抢上前去，为患者实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同时实行胸部按压。病人紧咬着的牙齿把宋文采的嘴唇都咬破了，殷红的鲜血从嘴唇上流出来，她全然不顾。一直做到手术室大夫赶来，对患者实行气管插管、皮球辅助通气，她才得以松了一口气。在大家努力下，患者终于转危为安，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渐渐睁开了双眼。患者被转入监护中心治疗后，宋文采又主动请缨，白天在科里上班，夜间放弃休息，到监护室照料病人，直到患者一周后康复出院。这个患者成为市中医医院成功抢救呼吸心跳停止的第一例病例。当医院上上下下都在称赞宋文采时，她却谦虚地说：“这是全院同事们团结战斗的结果，当时凡是有关的科室与大夫，都是招之即来，全部上场了！”

有一次，宋文采带着一名肺栓塞患者做肺动脉血管重建。就在手术顺利结束时，旁边一位老年女性患者所做的CT片引起了她的重视。多年的职业养成和对患者的关注，使她形成了只要发现有问题的检查结果就特别留意的习惯。这位老年患者得的是重症肺炎，如不及时抢救，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病人的状况已经刻不容缓，救命要紧。于是，她赶紧招呼同事们，立即把患者送入病房，实施紧急抢救。由于她发现及时、措施果断，使患者没有错失最佳抢救时机，挽救了老人一条性命。

还有一位很倒霉的清洁工，在工作时一不留意，掉进了又深又脏的化粪池，肺里呛进了满满的污水便汤，送到医院时，已经快窒息。宋文采与同事们全然不顾患者秽物满身、恶臭难闻，立即对其采取抢救措施，整整一个多小时，终于把其满腑的污水脏物全部吸取导引出来，使其转危为安。

2012年，费县一名女患者产后半个月突然出现严重咯血，经县医院治疗效果不佳，投医到市里另一家医院，因病情较重而没有接治，遂到市中医医院求治。经宋文采检查诊断，患者是肺栓塞，右下肺动脉完全堵塞。宋文采没有因其病情严重而拒治，而是毅然予以收治。经过10多天治疗，患者又出现右侧胸腔积液，右肺仅剩下了四分之一。她又对其采取胸腔抽液及抗凝治疗等，一直忙忙碌碌抢救治疗了半年时间，患者终于痊愈出院。

同年，市中医医院接治了一名近40岁的大龄孕妇，并实施了剖腹产手术。患者分娩前有咳嗽病史，术后突然出现喘憋，不能平卧，大汗淋漓，情况十分紧急，遂约呼吸科宋文采主任前来会诊。根据患者症状，当时考虑可能是肺栓塞，但是也不排除是重度肺炎。为查明病因，在病人状况已经十分危重的情况下，她冒着极大风险，亲自带着病人去放射科做了CT，结果证实为重症肺炎。宋文采立即给予抗生素等治疗，以控制感染，止咳化痰。但是，患者疾病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呈进行性加重，出现了周身紫绀，血氧饱和度只有50%左右。她又决定紧急给予无创伤呼吸机辅助通气，并亲自守候在患者身边，随时调整呼吸机的各种参数，观察病人反应。一连数天，她顾不上吃饭休息，随时观察着患者病情。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患者终于脱离了危险，撤掉了呼吸机，实现了自主呼吸，症状也逐渐好转。治疗一个半月后，患者出院，约3个月月后，完全实现了康复。



宋文采及同事们成功抢救的另一名危重患者，同样是一位中年孕妇。患者既往有先天性佝偻病，遗留胸廓畸形，脊柱向右侧偏曲。入院时口唇紫绀，喘憋严重，呼吸困难，神志恍惚。在实行急救措施并行剖腹产后，呼吸症状没有缓解，由宋文采参与会诊并转入呼吸科，经确诊病人患有重症肺炎。但是对症治疗后，效果不佳，其病情反而逐渐加重，出现呼吸微弱，曾一度停止，周身紫绀。宋文采带领全科同事，紧急、连续采取综合抢救措施，但由于患者气管向右侧偏曲，插管后其血氧饱和度曾一度持续为0达10分钟之久。“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这是宋文采对危重患者坚守的信条。她和同事们没有放弃，又对患者采用呼吸机辅助通气等措施。整整一个夜晚，她盯着患者的反应，眼睛都没有闭一下；她亲自用手捂着患者面部的呼吸机面罩，手始终没有一点儿松懈。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过去，患者的血氧饱和度终于由不到30上升到了80。宋文采这才喘了一口气，对患者的丈夫说：“命总算保住了！”然而，后来患者的病情又时有反复。宋文采又在电话上反复细致地请教了北京的专家，不断调整完善了治疗方案。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努力，患者终于完全脱离了险境。她眼含热泪，紧紧拉着宋文采的手，无限感激地喊了一声：“宋姐！”差点把宋文采的眼泪也给叫下来。宋文采信心满满地对她说：“只要你坚持配合治疗，我不仅要救回你的命，还要还你一个健康的肺！”患者喜出望外，对宋文采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宋文采说到做到，3个月后，患者完全康复出院。自此，她真正把宋文采当成了救命恩人和亲生姊妹，有事无事，总是抽出时间来看望宋文采和同事们。

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的高度责任心、强烈职业感，加上高超的医术、丰富的临床经验，使宋文采每每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化险为夷，使患者起死回生。看着枯木回春的病人，宋文采心中充满了自豪自信的成就感。而凡是得到宋文采抢救治疗的危重病患者，对她及同事们的信任度与依从度又是最高最强的。久而久之，宋文采越来越深深地热爱与执着于抢救危重病人的工作。在医疗这个行业中，在动辄发生医患矛盾的形势下，宋文采这种心态与精神，实属难能可贵，大期弘扬。

# 王文兴：让雨滴来讲述“降魔”故事

王延斌

王文兴，环境化学家。出生于安徽萧县，祖籍山东临沂。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顾问。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系（青岛）。近20多年来主要从事环境化学研究，为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六五”至“九五”历届负责人，在大气环境容量、煤烟型城市大气污染、降水化学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现场观测和模拟实验，建立了各种室内、室外光化学反应模拟装置，得到了一些重要的光化学反应和煤烟型污染的规律。近年来开展了环境物理化学研究。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也能揭示出某些领域的蛛丝马迹。63年来，在显微镜下坚守，王文兴从一滴酸雨中，发现了“另一个世界”。

从四川峨眉山到辽宁凤凰山，在广阔土地上选取271个站点，采下一滴滴降水，日复一日地摸索。这位为环保奉献了一生的老人说：“观滴水可知沧海，懂得见微知著，才能拿到打败‘空中恶魔’的钥匙。”

踏遍山川江河，揭开躲在大气光化学污染、煤烟型污染、大气酸沉降背后的运行秘密；年逾古稀，筹建山东大学环境研究院，首次将量子化学引入环境领域。在漫长而专注的科研生涯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学术顾问、山东大学终身教授王文兴，拿下了多把解决污染问题的“钥匙”。

88岁的先生，拒绝“卸甲归田”。他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但我还想再干几件事。”

## 57岁转行成为酸雨治理的拓荒者

“这些pH值甚小于5.6的降水，能毒死树根，酸化水体，腐蚀金属和建筑。它们是‘空中恶魔’。”

先生老了，但壮志不减。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自己，也提醒新一代科研人，打败酸雨。

57岁那年，王文兴转行了。之前，他历时26载写就的《工业催化》是我国在该领域第一部专著，启迪了一批批“催化人”。但1973年一次赴英国考察，成为他转向环境化学的“催化剂”。老牌工业国家英国，两次工业革命带来了GDP，但“清澈的河水被染成灰色，白色的房屋被熏成灰色，漂浮的空气充斥着灰色”。

王文兴说，选择酸雨作为研究方向，是因为在当时我国的大气污染中，酸雨和浮尘是最主要的污染。中国成为仅次于欧洲和北美的第三大酸雨区。

1980年代早期的中国，老百姓并不了解酸雨为何物，但它对水体的侵蚀直观地反映到民间的“顺口溜”里：“七十年代农田灌溉，八十年代水质变坏，九十年代鱼虾绝代。”

治理酸雨，拓荒者没有先例可循。1985年，王文兴背起设备，和同事们爬上了秀美的峨眉山。

在垂直陡峭的山体上爬上探下，王文兴希望拿到解决国家酸雨研究课题的“倚天剑”。在海拔500米、900米、1914米、金顶3078米四个不同高度布点，反复观测，反复计算，几年间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在甚高于大气边界层的金顶，大气化学反应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

在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监测酸雨动向非常困难。第一难，在如此大的地区，如何设计监测网，真实反映酸雨状况？第二难，动辄十年八年深山大川艰苦环境的考验，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坚守，并不能换来世俗的“颜如玉”和“黄金屋”——在这里摸索，只有一眼望不到头的苦。

自1986年开始，王文兴先后担任“七五”“八五”“九五”酸雨科技攻关项目组长，领导、组织、实施，并亲自参与现场观测和实验研究工作，在风餐雨宿中慢慢摸索，直至搞清楚我国东部地区降水酸度和化学组成的时空分布。

天道酬勤，他们的系列成果，成为我国出台应对酸雨政策和措施的“奠基之作”。

## 72岁拿到环境科技领域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大部分时候，城市是温柔的；风生水起的工业却让城市变得狂躁——工厂和汽车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在空气中尘埃的催化作用和阳光照射下转变为臭氧和细颗粒，原有的化学链遭到破坏，形成煤烟型污染、光化学烟雾和霾。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们并不富裕。如何花最小的经济代价，寻求空气中容许存在的污染物的最大浓度，成为先生和同事们的目标。但大气防治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工程，里面涉及污染监测、大气化学、区域传输、生态影响、治理对策等方面，非单枪匹马可以应对。王文兴的对策是以项目为载体，调集国内最专业的人才，组织“联合舰队”攻关。

“每一个项目，我负责组织整个计划，也负责自己的专业，然后从北京大学、

中科院等科研机构协调来对口的科学家联合攻关。”王文兴说。

中国环科院承担的国家“六五”攻关项目《大气环境容量》研究中，中国环科院的25名专家，联合北京大学、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山西省环保所、山西环境监测总站组成四五十人的“豪华团队”所向披靡。

“联合舰队”运转了近20年，见证了王文兴和同事们拿下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二等奖直至一等奖。同事们说，作为我国环境科研开拓者之一，先生的爱国之心就包含在这一项项国家需要的成果之中。

1999年，王文兴和同事们拿下我国环境科技领域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有朋友记得，评奖要求这个项目单位第一和个人第一不能归属同一个单位。王文兴的选择是“单位一定要排前面”。“他作为第一负责人，在至高荣耀面前选择‘退让’，这要多大的胸怀啊。”

“学校每顿饭给他提供自助餐，但他嫌贵，每天与学生一起排队打饭，就喜欢一元钱一份的素炒豆芽。”山东大学环境研究院胡敬田说，学校设有院士专项科研活动费，先生不让动用，积攒下来购买仪器设备。有些制度内许可的事情，别人“规劝”，先生却撂下“狠话”：“我清清白白一辈子，你可不能让我犯错误。”

认真，让王文兴的一项项科研成果“开了花”“结了果”——作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区，我国至今没有发生像欧美那样大规模的酸雨危害事件。

## 77岁把量子化学理论与方法引入环境化学

“许多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变化，很难用传统实验方法研究。比如，有的毒性很强，不便操作。用纯理论化学的方法研究环境有害物质，这是一个交叉边缘学科，在环境领域国内没有人做，更需要我带着年轻人去做。”

以77岁“高龄”创建山东大学环境研究院之后，王文兴将量子化学理论与方法引入环境化学领域。

“一般化学反应装置和光化学烟雾箱很难得到化学反应基元过程的细节，特别是在实际环境开放系统中，现有的技术条件往往难以实现。”王文兴留意到了量子化学，随着新理论、新方法的出现，特别是超级计算机的开发和应用，量子化学计算显示出巨大潜力，“它可以解决传统实验方法‘想到却做不到’的细节，还可以解决前者想不到的问题。”

他请来在环境科学领域的拔尖人物张庆竹，连同山大化学院“协同作战”。十年下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学科发展态势评估系列研究报告《化学十年：中国与世界》中，山东大学列为量子化学密度泛函领域论文发表总量排名中国第二位，世界第四位。

1927年出生的王文兴，成长于那个动荡复杂的时代。读书不多的父亲，教会了他“穷人家的孩子唯有读书，方能有所作为”“人要知恩图报，大了要报效祖国”的朴素道理。枪林弹雨没有阻断他的学业，他从未在士大夫经世济国的理想面前停下脚步。

从工业催化到环境化学，再到教育，在人生的三个阶段里，“环保”二字贯穿始终。王文兴说，工业催化为他进入环境科学做了铺垫，而教育延续着他的“环保梦”，自己可以老去，但年轻人才成长起来。王文兴相信，环境化学通过一滴水、一缕烟见微知著，这些年轻人一定会发现更大的世界。

与时间赛跑，王文兴不服老。老去的只是往事。

🔴 《临沂年鉴》2017卷组稿方案印发。1月23日，中共临沂市委办公室、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沂年鉴〉2017卷组稿方案的通知》。在对各有关单位供稿内容、供稿标准、供稿质量等做出明确要求的同时，结合《临沂年鉴》2017卷年鉴框架结构的有关调整规划，对篇目设置及撰稿分工做了同步调整。为进一步提升编辑效率、保证编辑质量，延续了为有关单位提供年鉴内容撰写参考条目及对县区供稿内容明确统一格式的做法。随着组稿方案的印发，《临沂年鉴》2017卷的各项编辑工作也同步启动。

🔴 市史志办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市委书记林峰海重要批示精神。2月21日，中共临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林峰海在市史志办呈阅件上作出重要批示：“史志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搞好史志工作的标志，一是为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二是为将来留下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望你们本着对现实和历史负责的态度，努力进取、扎实工作，把各方面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加快社会主义大美新临沂建设做出应有贡献”。接到林峰海书记重要批示后，市史志办立即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对林峰海书记重要批示全文进行认真学习，并就贯彻落实批示精神作出部署。

会议认为，贯彻落实好林峰海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是市史志办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做好批示精神与史志工作的结合文章，深入发掘沂蒙文化底蕴，加快推进二轮志书编修工作，争取二轮修志走在全省前列。要立足实际，服务大局，以更加团结、务实、创新的精神状态，全力做好各项工作，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大美新临沂做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 市史志办传达学习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2月16日下午，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主持召开市史志办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林峰海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临沂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会上，刘志强主任领学了市委林峰海书记报告，要求全办办要把学习贯彻市党代会精神与推进全市史志事业科学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认真落实“一纳入、八到位”总体要求，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着力推进全市史志工作协调健康发展。一是要突破难点，加快推进二轮志书编修工作，迎难而上，扭转被动局面，争取二轮修志工作走在全省前列。二是深入发掘沂蒙文化底蕴，弘扬沂蒙精神实质，着手编写《大美新临沂》和《沂蒙精神志》，为加快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信息服务和智力支持。三是切实加强史志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修志人员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修志队伍。

🔴 市史志办传达学习市第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2月27日上午，市史志办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传达了张术平市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报告中我市过去五年工作回顾、今后五年目标任务、2017年工作安插和政府自身建设等内容进行了原文学习，对报告重点内容进行了详细解读，统一了思想，鼓舞了斗志，并对如何深入贯彻会议要求进行了部署。

🔴 各县区史志办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市史志办刘志强主任讲话。近日，各县区史志办纷纷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学习传达市史志办党组书记、

主任刘志强在市史志办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围绕讲政治、民主集中制、团结、学习、协调、爱岗敬业、担当、政绩、化解“许愿”“怨气”“情绪化”等问题、廉洁自律十个方面的重点论述，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并结合工作实际，研究贯彻落实措施，扎实推进县区志编修、年鉴编纂、方志馆建设等工作。

🔴 《临沭年鉴（2016）》出版发行。1月，《临沭年鉴（2016）》出版发行。全书共64.2万字，分设24个部类，采用条目体编写，收录图片30余张，表格50余个，全面反映2015年临沭县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基本情况。

🔴 郯城县史志办到东海县考察交流史志工作。1月，郯城县史志办一行11人到江苏省东海县考察交流史志工作，并交换了史志成果。

🔴 《兰山区半程镇志》编修工作全面启动。1月，兰山区半程镇召开镇志编修工作会议，部署安排首部镇志编修任务，培训业务人员，提出具体工作要求，标志着兰山区第一部镇志编修工作正式启动。

🔴 《夏家沟村志》出版。2月，由莒南县中学高级教师夏培迎历经数年编纂的莒南县《夏家沟村志》出版。